5061/5600.1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57

中國語文

总第62期

8

1957

中 国 語 文

1957年8月号(总第62期)目录

积極参加反右派的斗爭,堅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社論)……………(1)

章伯鈞等右派分子反对文字改革的眞正意圖……………韋 慤(2)
我对汉字改革的一些粗淺的看法……………魏建功(4)
評关錫和陈夢家对文字改革問題的态度……………潘 山(12)
反对歪曲和污蔑文字改革……………毛西旁(14)

汉語中处所詞做主語的存在句……………陈庭珍(15)
汉語复句新体系的理論……………黎錦熙、刘世儒(20)
关于动詞作定語帶"的"字的問題……………溫永祿(25)
动詞作定語要帶"的"字……………邢福义(26)
贛榆方言的人称代詞……………蔣希文(27)

关于結構主义的几点意見……………M. И. 斯鉄布林-卡勉斯基(28)

反义詞及其在構詞上和修辞上的作用……………張拱貴(32)

关于中国民族語文工作中的某些問題……………謝尔久琴珂(37)

語文短評……………(41)

書刊評介

孙常叙:《汉語詞彙》……………劳君方(43)
吳朗:《普通話語音基本知識》……………王士襄(43)
王力:《广州話淺說》……………力 山(44)
余心乐:《汉字改革講話》,郑林曦:《汉字改革》,周鉄錚:《汉字和汉字改革》,
張世祿:《汉字改革的理論和实踐》……………張朝炳(45)
郎峻章:《汉語語法》……………徐 远(46)
欢迎《西方語文》創刊……………余也牧(11)

信箱

对《苗語的社会方言》一文的意見……………竹 亭(36)
对《海南島通訊》的意見……………广东省教育厅(48)
广东省方言試点調查經驗点滴……………林运来(49)

动态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派出工作組了解各省市方言普查工作……………吳 芬(31)
湖北省方言普查工作近況……………李仲英(31)
陕西省方言普查工作近況……………李平、陈鈞(31)

編者的話……………(47)

社論

积極参加反右派的斗爭，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領导下，展开了反右派的斗爭，到現在不过兩个多月，已經取得了偉大的胜利。現在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向党、人民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已經被打垮了，他們已紛紛向人民低头認罪，在不同程度上作了交代并表示悔改。为了繼續揭露他們的陰謀和同謀者，清除他們所散布的毒害，我們必須把反右派的斗爭进行到底。

1957年7月26日国务院全体会議第五十五次会議所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員参加整風运动和反对資产阶級右派斗爭的决定”指出：反右派的斗爭是保衞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我国国家基本制度的斗爭，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員都应該积極地参加这一运动和斗爭。在国家机关的語文工作者当然也应該参加这一运动和斗爭。

反右派的斗爭給我們語文工作者以严重的考驗和深刻的教育。这个考驗是立場的考驗，这种教育是無产阶級思想政治教育。我們語文工作者是来自各阶級的知識分子，經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运动，以及农業、手工業和資本主义工商業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我們的政治觉悟大大地提高了，我們的思想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我們的社会主义立場是否已經很稳，我們的思想是否已經改造得很好，还要看我們在这次反右派的斗爭中是否經得起考驗。

在反右派的斗爭中，我們首先要好好地檢查自己，特别是自己的关于共产党領导、社会主义制度、肃反問題和中苏友好的思想、言論和行动。我們可以提出下列問題来檢查自己：

1. 我是否認为民主党派可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輪流执政？

2. 我是否認为在国家机关、工矿、企業、学校等等，可以不要共产党的領导？

3. 我是否誠心誠意拥护共产党的領导？我是否对共产党的領导有抵触情緒，甚至对抗情緒？

4. 我是否同意人民民主專政？我是否認为社会主义民主不如資产阶級民主？

5. 我是否深切認識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6. 我是否贊同过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

7. 我是否贊同过儲安平的“党天下”的謬論？

8. 我是否贊同过章乃器的謬論？

9. 我是否贊同过罗隆基的“平反委員会”？

10. 我是否認深切識到肃反是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和保衞社会主义建設的必要措施，并且有巨大的成就？

11. 我是否因为自己在肃反运动当中被斗过，或者因为亲屬、朋友被鎮压就認为肃反搞糟了？

12. 我是否深切認識到中苏兩国的团結合作以及巩固、發展中苏友誼是我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有力的保証？

13. 我是否深切認識到苏联的援助和学習苏联的先进經驗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有重大的意义？

章伯鈞等右派分子
反对文字改革的眞正意圖

韋 慤

在5月21日中央統战部的座談会上，章伯鈞除了提出所謂“政治設計院”来篡夺共产党的領导权并破坏人民民主制度外，还对文字改革問題作了汚蔑性的發言。他惡意地把文字改革說成是几个人关起門来搞的，沒有經过研究討論的。

对章伯鈞的汚蔑性發言，邵力子先生已經当場予以駁斥。邵先生說：“我是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員会工作的。伯鈞先生說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門来搞的，这样說是太冤枉了。事实上，每个方案提出时，文字改革委員会都征求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見，出版、印刷界的人士都曾举行过多次的座談会。全国政协也討論过兩三次，并且交地方政协討論过。說政协沒有討論，不好这样講。文字改革工作有缺点，当然可以批評，但是，放箭要放准，要有的放矢，不要乱放。說文字改革問題沒有征求群众意見，是乱箭。”

經过駁斥后，章伯鈞的同盟者罗隆基也承認文字改革問題是討論过的，但是他把事实加以歪曲說：“当时討論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討論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說到汉字簡化，也沒有討論汉字簡化的方向問題，拿出来討論的是簡化字。而且拿出来討論时，說是党已經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討論，就会說是反对党的政策。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說話的。”

虽然罗隆基替章伯鈞加以解釋，但是章伯鈞也不得不說：“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批評是对的。”他繼續說：“將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討論时，陈毅叫我講話，我不講話。但是大家贊成通过，我也不反对。現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討論，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問題提出来討論。”

接着，罗隆基說：“毛主席是贊成拼音化的，这样讓大家討論就很难發表意見了。”

邵力子先生反問：“旣然你有意見，当时为什么不講？現在把事情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太冤枉人。”

从上面人民日报所报导的那天开会情形看来，章伯鈞和罗隆基用文字改革这个題目来汚

---

14. 我是否曾經在反右派的斗爭中認識模糊，甚至有錯誤的看法？

15. 我是否曾經有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論和行动？

如果經过檢查，自己是右派分子，那就应該深入檢討，徹底交代，低头認罪，認眞悔改，重新做人。

在反右派的斗爭中，我們还要揭發所有右派分子，暴露他們的眞面目，駁斥和批判他們的謬論和罪行。我們特別要防止对右派分子的溫情主义，同时要避免急躁粗暴的态度，用簡單的方法，企圖速战速决。对右派分子的斗爭，我們“旣要堅决勇敢，又要認眞調查研究，严格分淸是非輕重，采取正确的說理的方法，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錯誤。只有这样，才能够眞正达到团結和教育最大多数而击敗少数右派分子的目的”。（引自1957年7月8日人民日报社論）

讓我們大家积極参加反右派的斗爭，徹底粉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陰謀，堅决地在共产党的領导下，为把祖国建設成为一个富强的、繁荣的、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蔑共产党和文字改革委員会，是十分明显的。邵力子先生兩次指出，章伯鈞和罗隆基太冤枉人。其实，章伯鈞、罗隆基等右派分子不只是冤枉人，还有更惡毒的陰謀。他們这样做是他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陰謀的一部分。为了使讀者在文字改革問題上認識他們的陰謀，我們有必要再补充一些事实，并进一步揭露他們的陰謀。

第一，汉字簡化方案、拼音方向和汉語拼音方案草案都是經过社会各方面人士和群众的广泛討論的。早在1950年，中央教育部就开始研究簡化字。从1952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員会成立到1954年年底，为了汉字簡化，曾經开过很多次討論会，并作了多次修改，才編成了"汉字簡化方案草案"。1955年1月，文字改革委員会为了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見，除了在报紙、杂志上發表了这个草案外，还印刷了三十多万分，由文字改革委員会和教育部联合發出，責成各省市教育厅、局組織当地文教界人士和政协委員进行討論，提出修改意見。在这个草案里还附着兩个問題：(1)文字改革要走拼音文字的方向，你是不是同意？(2)你对于本方案草案所建議的汉字簡化方針和办法是不是同意？政协全国委員会特别組織了多次报告会、座談会。文改会参考了全国二十多万人参加討論所提出的意見，对草案作了修改，提交1955年10月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議修正通过，再提請国务院汉字簡化方案审訂委員会审訂。1956年1月，国务院关于汉字簡化方案的决議說："現在为愼重起見，特先公布試用，并責成各省市人民委員会負責邀集本省市政协委員征求意見，在三月底以前报告国务院，以便根据多数意見再做某些必要的修正，然后正式分批推行。"

从上述的事实看来，文字改革不是几个人关起門来搞的，汉字簡化的方針、原則和簡化办法以及文字改革的拼音方向都是經过广泛的討論的。章伯鈞和罗隆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汚蔑是毫無根据的。

第二，汉語拼音方案草案曾經在报上發表过，以便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見。政协全国委員会也曾經分組座談过。在提出討論的时候，文改会負責人从来沒有說过是党已經决定了的。汉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各种修訂式也曾經征求过意見并在座談会討論过。現在拼音方案草案还在修訂的过程中，談不到把汉字改为拼音文字。即使拼音方案正式公布后，也不过用来給汉字注音，作为推广普通話的正音工具，并用来研究和实驗拼音文字。章伯鈞毫無根据地指摘党和政府未經过討論便把汉字改为拼音文字。他的用心是鼓动那些对文字改革有抵触情緒的人們来反对党和政府。

事实上，章伯鈞和他的同謀者是用文字改革这个題目来点火，煽动那些对汉字有特別感情的知識分子反对党和政府。当光明日报和文匯报被右派分子盤据的时候，这兩張报紙特別組織了好几篇反对文字改革的文章在报上發表。光明日报并且專門写了一篇反对文字改革的报道(見該报1957年5月17日2版«"一位生物学家对文字改革的意見"發表以后»；同版所报道的文改会召开的文字改革座談会的發言也被該报記者上下其手，竄改內容，例如对翦伯贊先生的發言就故意歪曲)。同时要停印《文字改革》双周刊。后来儲安平被迫辞去光明日报总編輯后，《文字改革》双周刊才能繼續出版。又据文匯报报道，右派分子顧执中企圖动員沈尹默先生起来反对文字改革(見該报1957年7月2日4版)。从这些事实看来，章伯鈞和他的同謀者鼓动知識分子反对文字改革，是他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陰謀的一部分。

文字改革是中国人民多年的願望，拼音化运动已經有六十多年的历史。毛主席指示我們：文字必須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并且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的指示是六十多年来我国文字改革运动的經驗总結。我們認为文字改革問題虽然在長时期內，經过很多討論，还可以再展开討論，以明是非，但是这跟章伯鈞等右派分子用文字改革題目来实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陰謀是完全兩回事。我們必須徹底粉碎他們的陰謀，在共产党的領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把我們祖国建設成为一个富强的、繁荣的、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完成文字改革的历史性任务。

我对汉字改革的一些粗淺的看法

——1957年4月27日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的講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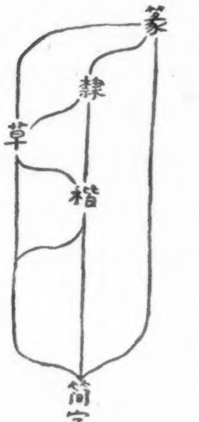
魏建功

一　汉字改革的历史基础

1. 汉字本身發展的傾向　汉字本身發展的傾向就說明了汉字本身要改革的理由。許多学者談汉字改革都接触到这个問題。汉字改革的历史，說得远点有三百年，說得近点也有六十年。一談到改革，首先是碰到这个問題。

我們先說說什么是汉字？簡單的說，汉字就是汉族人民用来表达語言的一种工具。要注意这里提的“汉族”的內容含义和習慣上用法的差别，并且还要注意“汉字”的实际存在的意义，——就是它表示的民族間和国际上的意义。在历史上，汉族名称是有了汉朝以后才有的，而汉字早在汉朝以前就已經产生了。汉字并且是东方好几个国家共同使用的。因此，非汉族也用汉字；并且也創造过汉字，如“歹”字，据說是蒙古人傳下来的。日本还在用汉字，朝鮮、越南曾經用过。他們也仿造过汉字，如日本“近衛文麿”的“麿”就是个日本汉字。越南的“字喃”是越南人按“形声”方法造的越南汉字，例如“一二三”的“三”，越南語讀“巴”，“字喃”就写成“𠀧”。可見汉字这种形式的字并不是汉族人所可私有的．更不能是为某些个人所私有。

按照汉字發展的历史，汉字形体的分类应該是这样一个排列关系：我們現在用的書写体——楷書是由隶書变化来的，最初都是篆文。草書起于汉初，也有些跟篆文有关系，例如“失”字草写作“乞”就是篆文从“手”“乙”声的来源，下半写成“乙”；楷書都变成了“乀”。各种字体之間是互相交錯的。許多草書也有变成楷書的，現在的“尽”、“刘”就是由草書楷化成的。汉字分类应当从它的历史發展来分。有人把汉字分为四大类：一、死了的文字，就是我們不用的。这是对的；但是既然被人們使用的字，就沒有死的。二、官書經典文字。这是汉朝以后才有的名目，那么在官書經典以前早已有了的字像《論語》中的“人”字怎么标法呢？算进官書經典里去？其实早就有了！三、一般通用的文字。四、民間俗字。这是从使用上来分类，从这种提法可以理解到文字不断在变。但是汉字是交叉使用着的，單純从使用上来分类，很难交代清楚，因此这样分类是有問題的。我們覚得向来文字学者按着字体变迁来分，可以从汉字發展的輪廓上看它的趋势。汉字是向簡易这方面走，这表現了它所要求改革的方向。“篆”本意是“引書”，說它的写法的。它写起来的笔画是圓博的，如把人字按篆文写成𠤎，就比較慢些。楷書写起来比較快，但是还是慢，例如“學”字，篆文写作“𦥯”，固然慢極了，楷書作“學”，还不簡單，草書运用“使轉”，以簡代繁，写作“学”。这样，汉字形体的变迁就是向簡的方向走。現在要进行改革的第一个基础就是这种历史發展事实所显示的傾向。这种發展，用术語性的話說，就是“形体变迁的趋势”。



文字学上对汉字結構分析，用“象形…形声”之类的“六書条例”。要知道这种六書条例并不是所有汉字都用得上的，应該理解它只限于研究从古代傳到汉朝的篆文，就是研究古代文字結構規律的。錢玄同、魯迅諸先生早已說过“不象形的象形字”等等，就是指現在的汉字并不能完全講六書了。有人說改革汉字不能打乱六書規律。現代文字楷書、草書，怎样講六書規律？六書条例是否还完全合用？例如現在的“大、月”等字，照說是象形字，又从何知道？有些專家把六書拿出来作为反对文字改革的論据，是模糊籠統的。我們应該实事求是。六書問題很多可以發揚丰富的地方，还有待于專家研究，但是并不可以一概用旧的模糊影响之談来作根据。文字学家老輩如楊树达先生在1952年从甲骨文的研究發見“文字中的加旁字”，就把向来的形声字的構成深入地說明了①。我在1935年写出的《古音系研究》一書里，也提到从甲骨文見到“假借”早于“形声”，形声有一部分是“注形作用”。楊老先生的“加旁字”跟我說的“注形作用”意义相同。研究古文字的專家往往在六書的基础上自己搞一套，是有道理的。例如唐蘭先生的《古文字学导論》里就有了唐氏三書，而不是六書。一般的文字学者还沒有能客观、平等看待秦汉以后新發生出来的形体，加以科学整理。

从汉字形体的变迁可以看出文字时时在变，也就是随时在改革。变迁的大势有兩种趋向：一个是簡化，一个是表音。像“我、你、他”这三个字，根本上是無法象形的，只有用表音等其他办法。甲骨文里就有了“我”

① 見楊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五。

字，字形作巫，那时候应該是同音假借的字。这表音的問題另說，这里說一說簡化。一、在同一种字体里分出繁簡。从最早起，甲骨文中間就有繁体和簡体同时出現。例如"羊"字有最完整的象形，也有相当簡略的象形。二、在几种字体之間先后变替，完全从写法上簡化。例如从篆文变成隶書，或者变成草書，等等。

这里先附帶談一个問題：文字和語言的关系究竟怎样？这也就連系到"文字学和語言学的关系怎样"的問題。最近从报上看到陈夢家、唐蘭等先生談到这些問題的文章，說是文字学要跟語言学对等。可是我們知道，現在的文字学的概念与过去的大不相同，把文字包括在語言学中，这是科学新發展的表現。三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讀書的时候，中文系根本沒有語言学課程的名目，只有文字学，包括形义学和音韵学。現在語言学中包括語音学、詞彙学、正字法等，性質还相同。其实过去叫"文字学"，是个簡称，章太炎先生在日本講学，曾經早說过全称应該叫做"語言文字之学"，也可以仍旧簡称叫"小学"。最近按照語言学科学体系，我們以"語言"标名，这应說是我国科学上的一个进步表現。可知唐、陈兩先生的說法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可能因为他們是古文字学家，看到現在語言学中講古文字的不多才这样說；古文字的研究当然是文字学中間的一大部門，这样說是对的。可是唐蘭先生說文字学在中国有兩千年的历史，好像和十九世紀新發展的語言学絕不相容似的。其实"文字学"作为語言文字学来正式提出不过五十年光景，从所謂兩千年学术傳統来說，本只有以語言文字为对象的"小学"，"小学"的內容就很难說完全跟十九世紀以来的語言科学內容絕对不相关。就像旧有的音韵学，我們的历代前輩就吸收了外来語言，主要是梵語的知識，逐步精密丰富，最近更进一步吸收十九世紀以来語言科学的理論加以闡發。不能像某些專家的想法，把我們的学术体系膠固起来，应該明白承認我們要实事求是地發揚祖国文化遺产，提高科学水平。我們認識到文字学的重要，但是把它放在語言学之中并不意味着是輕視它，更說不上什么"宗派"的表現。

前面說过，汉字改革的历史，說得远些已有三百年，說得近些也有六十年。这是由許多爱国的語言文字学者先后相繼努力的革命工作。（現在的文字改革工作也并沒有不找文字学家来商量。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議，代表里就有不少文字学專家，如容庚、商承祚、馬宗霍諸位先生。）在文字改革工作上，許多專家对汉字对象發展的傾向，認識是一致的，可能对改革的理論認識上，有些不同。例如魯迅是从阶級論認識的，而錢玄同就是从反对封建主义認識的。（这問題后面談）这是我們要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理解的問題，同时也不必隐諱，这个工作是帶有革命的性質的。下面再来談汉字所以要改革的其他理由。

2. 中国人民的生活需要　上一节說到汉字本身的历史發展傾向就要求改革。这里談談运用它的人的要求，也就是从文字改革的社会意义来說明。

語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文字是記录語言的工具。不管汉字和汉語的关系在理論上有什么特殊情形，二者同是工具是不可改变或否認的。有的人强調汉字有其特色，那只是在字的形体上有些区別；可是文字与語言的关系还是一样。人类自从用自己的劳动創造了异于其他动物的生活以来，最突出的特点是能制造工具，进行劳动，而相应地是运用口舌發出代表思想感情的語音，建立詞彙，采取一定的規律組織語句（即創造了語法）来互相傳达思想，进行交际，进行共同的斗爭。外国有的字母学，相当于我們的文字学。值得驕傲的是我們文字的內容丰富。因而有人覺得要跟語言分开。我以为除了形体一部分，关于意义和声音，怎么能跟語言分开？分不开！

任何学者都知道：1）先有語言，后有文字；2）思想、感情、意志有时候非語言所能形容的，同样文字也不能表达出来。（文学家就在于能精巧地运用語言，所以人們称他們做"語言巨匠"。）这就簡要地說明了在統一表达思想、感情、意志的要求上，如果語言和文字是一致（就是所謂"言文一致"）的話，就至少可以解决了矛盾的一大半。拼音方向就是言文一致的道路。文字發展的本身傾向表音就是滿足这一需要的表現。这是我的粗糙的看法。汉字表意的習慣最深，例如"醜"字除表示"壞"、"不好看"（"醜惡"、"醜陋"）外，还有一个表示"相等"（"地醜德齊"）的意思。这样就形成一詞多义的事实。如改用拼音，只須記音不必記这个音是哪个字，更不必記这一个字是表示的哪許多意义了。这是一个汉字單字作为意义独立的詞的例子。意义有的現代語里用得很广，有的古代語里才用。又如"坚"与"固"、"持"与"执"，从字面上看，意思是一样的，所謂同义；但是作为構詞的詞素写出不同的复合詞"坚持"与"固执"，便成为兩个相反意义的詞。这样記住單字許多的意义，到了复合的詞里又不能相应，必須从整个詞的意义来掌握。还有些詞根本不能从字义上了解，例如"工夫"，曾經有人鬧过"工人的丈夫"的笑話。汉字这样就难学些，如果只記音，学詞不再牽涉字义，是比較方便的。

由此看来，我們可以懂得，汉字改革在人民整个文化生活上是有迫切需要的。有許多意見虽然前人說得很詳尽，人們不从事这个运动还有所不知，是可以理解的。諸位，"百聞不如一見"，可以到文字改革委員会办的关于文字改革运动的文献展覽室（在北京西單南大街）去看一看，我不想多說。这里只談一个問題：汉字的优点、缺点跟汉字改革的关系。有的人談汉字改革，总是从优点、缺点的比較上談。我覺得这并不足以說明問題，也不能解决問題。这一問題最容易强調主观，我

不主張死板地討論它。我談这一問題預备从較广远的方面来說，預先声明：希望是力求客观，避免主观，更要实事求是，自己警惕避免陷入“唯心”的泥坑，还請大家帮助！

我追随前輩之后，参加文字改革运动已經三十年。三十年来参加这一工作的經驗，我發現对文字改革有兩种态度的人。用普通成語来叫他們：一种是“飽汉不知餓汉飢”，一种是“兒子是自己的好”。“兒子是自己的好”，就是說有一些人認为只有他自己拟定的文字改革或拼音方案好，今天不談他們，今天專說“飽汉不知餓汉飢”的这种态度。强調汉字优点而下結論說毋庸改革的大約是我所說的“飽汉”！我們所說的中国人民需要改革汉字，并不是指五百万知識分子来說的，而是指除去这五百万知識分子的五亿汉族人民；他們是在历史上失去学習权利的人，学汉字是不容易的。能掌握汉字的知識分子，不成問題，是文字的“飽汉”。对汉字还不能掌握的老百姓(人民)，他們是“餓汉”。請注意，他們现在是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翁，他們要文字！这里可以举一个历史上的故事做比喻。三世紀末到四世紀初，晋朝有个皇帝(司馬衷)听說老百姓遭灾荒沒有飯吃，他說：“他們为什么不吃‘肉糜’(肉醬)呢？”过去他們荒年时候連草根树皮都吃不着，哪兒吃得上肉醬？如果不从如何解决具体的粮食問題下手，只对餓汉說：“你們吃肉醬吧！”只有司馬衷之流的昏君才会这么想，这么說。如今对广大劳动人民掌握文字的問題，如果也用司馬衷“何不食肉糜？”的腔調，这只是开頑笑，不能解决問題。也許有人用“飢不擇食”的方法来对付这問題，例如說：“吃面包，吃饃饃，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能飽。”我想这也不对头。問題还在这样比拟并不恰当。这种缺乏精神食粮的“餓汉”不仅是有什么吃什么的問題。我想他們正是历史上許多“飽汉”所不关心、同情，飢餓成了病的人，他們“消化不良”，他們甚至于連怎么“吃法”都不会。汉字改革运动不是憑空發瘋的工作，它是有一定目标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解决精神粮食的“餓汉”的問題。

以上說的是文字改革在扫除文盲問題上必須进行。这是人民的首要的生活需要。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首先要使人民掌握文字这一学習文化的工具。所以毛主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我很兴奋，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設事業中間，文字改革的工作落在我們的肩上，是多么光荣！請不要从知識分子的角度看問題，或者說請知識分子从人民全体考虑問題。五百万知識分子比起五万万多汉族人民来，数目大小如何？利益关系如何？文字怎么改革？当然不能鹵莽灭裂，專家們应該是了解問題的全面的。这不是像有人說的吃饃饃吃面包怎么都行的問題。例如唐蘭先生同意文字改革，并且他拟定了一套“綜合文字”的方案(虽然現在他已經放弃了)。这就說明吃什么要有选擇，不能“这样也好，那样也好”。

“文盲”的产生是汉字应用的历史事实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現象：創造文字的人民不能普遍享用文字，却被統治阶級的一部分人所壟断。所以魯迅說得好：“把文字交給一切人！”这是魯迅先生在《門外文談》中提出的一个口号。要把文字交給一切人，汉字的优点、缺点和汉字改革問題就不是憑主观出發来詭辯的問題。事实不容抹煞。为什么生活中最普通的話，用汉字写起来那么繁复？例如“骯髒”，还可写作“腌臢”，照前一写法应該念“ang tsang”，照后一写法应該念“an tsan”，結果从文字上反而看不出究竟念什么音，写起来又复杂，这就是汉字的难处。老百姓要写自己的話就得想办法：一条路是跟着老爷們走，学会用古典文，等到自己掌握了文字后也变成老爷，另一条路是自己另謀出路。前一种就是“五四”以前的情况，后一种就是“五四”以来的情况，就是新文化运动中間的一个組成部分。这个运动包括从文学思想內容到文字工具形式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字工具改革問題并且有更長久的發展历史。我們不是前無古人后無来者的瘋狂者，我們是繼承三百年或者六十年間若干前輩先后的努力而工作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的道路是按历史發展規律来走的。一个專家学者，尤其是在从前旧社会里，对于文字的改革能有深刻坚决的認識，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他們抛开自己的喜好，而体貼到不識字的人的苦处，为大多数人服务，这是文字工作者的总的精神。(就拿我的姓“魏”字来說，写起来虽复杂，但我会写草書，不怕复杂，改革不改革对我本来不成問題。)我的老师錢玄同先生曾經引过清初刘献廷說过的一句話，表示这种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精神。刘献廷他主張統一全国語言，研究方言，改革文字。錢玄同先生說：“刘繼庄(献廷的号)曰：‘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吾当以此語为座右銘。”刘献廷說的話大意是：知識分子要“斡旋气运”(轉移改革社会的意思)，假若只拿自己一点知識能力为一个人的身家打算，算不得是个人！我深受錢先生的教育感动，我作文字改革工作就是从飽汉要知餓汉飢这方面想的。从刘献廷、錢玄同的这种精神，可以理解热心文字改革搞文字改革工作的人都有一个具体理想，理想全中国人民都能掌握文化武器，要把每个人变成一个知識分子。这也是一个通向共产主义的工作。我深深覚得我們对于这种精神宣傳得不够。为了扩大宣傳，我向文字改革委員会建議，应該把《全国文字改革会議文件匯編》大量印行，向全国关心文字改革問題的人們發布。大会代表們反映各方面意見的發言，就可以讓人們了解文改工作，讓不了解情况的、善良的、爱国的有心人明白具体現实的情况。从具体現实情况把人民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認識清楚了，汉字的优点、缺点和汉字改革的关系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我介紹这本《匯編》里几

位代表的發言，供大家参考。这几段發言（原文从略）計有：陈望道代表(115 頁)說明了文字改革运动的历史發展意义，操震球代表(95 頁)反映农民需要文字改革的情况，彭允中代表（140 頁）反映兵士們热烈拥护文字改革，王茂業代表（111 頁）介紹拼音化教学的經驗，耿長寅代表(168 頁)从自己学習汉字和回文（阿拉伯文）的經驗比較說明拼音化的效率。这些都足够說明汉字改革的社会意义，就是它的历史基础之一。我的馬列主义水平低，不能肯断，还請諸位考虑一下：这些是不是现实的存在？跟上面說的第一点汉字本身的發展是不是一样的存在？兩者中間是不是矛盾？"飽汉"先生們知道不知道？

汉字繁难和人民的需要这是实际存在的矛盾，这就需要改革。我們不能拘泥地單从汉字优点有几，缺点有几，兩相对比，从計較点数多寡来說明这个問題，这并不足以解决問題。像 4 月 18 日《人民日报》第七版發表的唐蘭先生的《行政命令不能解决学术問題》里說："从中国文字發展的历史来說，我始終坚持中国文字有很大优点，它的繁复难学等缺点是可以逐渐克服的。"这对于上面介紹的各位代表所說的事实，諸位想想，豈不成了"驢唇不对馬嘴"？唐先生又說："中国文字改革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是正确的，但应根据中国文字的發展規律，有它自己的民族形式，保留它的一切优点，不去驟然改变它的体系。"唐先生所說的中国文字"有它自己的民族形式"和他認为正确的中国文字改革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实际上是互相抵消的；明白人懂得一点邏輯和知道一些文字改革运动历史的，都不能同意，都觉得唐先生所謂"正确"是老子之道所謂"將欲取之，必故与之"的話头。前面我們提过文字改革运动有三百年（从刘献廷或更早的方以智算起）或者說六十年的历史(参考陈望道先生的發言)。唐蘭先生說"驟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唐先生說："中国过去的文化遺产是十分輝煌的，可惜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的打击，人們几乎'数典忘祖'了。有些国粹主义者看不見事物的發展，不肯承認一切現代的进步的东西，固然是錯誤的。但为什么不要我們祖先的优秀遺产呢？有些文学家不承認我国有偉大的文学作品；有了十九世紀外国新兴的語言学，就不要中国独立發展了兩千年的文字学；改革中国文字，处心积虑要推翻有几千年历史經驗的通用文字而創造拉丁化新文字。"这些話是有問題的：我們全国中学現在"文学"和"語言"課并重，大学从来沒有不講偉大文学作品的。哪一个文学家是否定《詩經》《楚辞》的？現在哪一部文学史是不講杜甫、李白、白居易、关汉卿、曹雪芹的？誰也沒有否定祖国文化遺产。至于語言学、文字学的問題，一开头我就談过。圖穷匕首現，画龙点睛，"將欲取之"的焦点还是根本反对三百年（或六十年）来的拼音文字运动！人們的确"处心积虑要推翻有几千年历史經驗的通用文字而創造拉丁化新文字"，处心积虑的人們正是受了帝国主义的打击而觉醒了的人們！处心积虑要改革文字的是三百年来的一些悲天憫人的仁人志士！唐先生这样的專家热爱他的研究对象中国古文字，是值得欽佩的，但是他讚美祖国文字所有的"几千年历史經驗"，从文字改革会議代表們的發言里理解，反觉得經驗有些慘痛，不大妙！如果我們尊重事实的話，下面的情况就不容否認：在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产生以前，清末王照官話字母（注音字母体系的前身）曾經在河北、河南、山东、辽宁一些地区推行过，現在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还有能运用的。在閩南教会里傳播的一种"白話字"(一种方言拼音字)，一直通行，有几百万人用着，听說現在有的老太太运用这种文字作街道工作。这些都并沒有發生"民族形式"的問題，反而使不識汉字的老人得了求知識的机会，得了从事社会主义建設的工具。我們也可以从高玉宝自傳中看出，只有在人民掌握了政权之后，劳动人民才有使用文字的要求，否則他們根本是跟汉字沒有緣分的。这些都不是唐先生說的什么"可怕的是'月亮也是外国好'的信徒們有些往往还处于領导地位，他們一家独鳴，群众的意見只好'万籟俱寂'。"也不是唐先生說的什么"可怕的是重要問題只用行政命令来解决。"我們不能抹煞事实，拼音文字早已有过了，天下也沒有大乱，足見汉字还不是"每个人民習惯了的形式"，就因为人民慘痛生活了几千年，并沒有把汉字当做"是日常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工具"。在中国土地上有一部分人倒也能用非汉字的拼音文字或标音文字。只有人民掌握了政权以后，才眞正有日常生活里必不可少地应用文字工具的可能。我觉得虽然不能用行政命令解决学术問題，可是問題在于学术如何結合政治，这是一些知識"飽汉"們应当三思的。例如这一个問題，單强調第一点，形成一种表面紛歧的現象，当然只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要注意效果，另一方面可能成为敌人引为口实的把柄。問題在于"如何眞心为工农兵大众着想"。为他們服务是最重要的問題。所以談改革汉字問題，从汉字的优缺点的一方面說来說去，并非問題的本質，本質在这些优缺点与应用实踐上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直接跟工农兵广大群众利益有关的。

3 中国革命的血肉关連 上面說了兩点汉字改革的历史基础。我們不能單看第一点。如果只强調汉字本身的發展傾向，就会成了一部分文字学家的主張："汉字很好不必改革"了！文字学家作为文字学家就好比一个資本雄厚的資产阶級人士。資产阶級人士他可以自我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設者，还可以自觉地背叛自己的阶級投入無产阶級先鋒队成为共产党人，也可能死硬到底成为無产阶級的敌对者。为什么有些資产阶級的人士要做共产党人？当然是因为他为了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利益要革命，就是刘献廷所謂

"斡旋气运"，不是为一己的身家謀的。中国共产党所領导的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自我解放斗爭的历史过程上的一个阶段。文字改革运动又是中国革命中間文化革命的一个組成部分。① 文字改革工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国就注意的文化建設事業。这一点，我們只須指出，不多占时間說了，所有的历史文献都可以作为注解。絕对不容許抹煞历史事实：文字改革工作是許許多多懂得中国文字学和熟習汉字的人民（專家不应算在人民之外）長时期努力的工作。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史和中国革命的發展消息相关，所以我說它的历史基础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与中国革命血肉关連。（后面会談到。）

汉字改革的历史基础除了第一点汉字本身問題可以糾纏什么优缺点問題外，它的第二点社会意义和第三点与革命血肉关連，是不可忽視而又無可爭辯的。

自从"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关于問題爭辯和工作实踐的环境情况，我想談兩件事，做一个今昔比較。这都是我們亲身經历的，同志們年青的朋友可以参考体驗一下。1)一件是錢同玄和刘复演唱"双簧"式的批判封建保守的"文学語言"思想。当初«新青年»提倡新文学，沒有什么反对派爭論的意見，于是由錢玄同执笔拟了一篇反对白話文（包括形式和內容）的信，用"王敬軒"的化名登出，同时由刘复执笔写了一封回信加以痛駁。这一个有名的辯論打破了当时冷靜空气，可是也显得学术論壇（主要語文方面）的实际的銷沈。2)又一件事是戴傳賢反动阻撓文字改革。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前南京政府时期，曾經受群众（当时党在上海所領导）的压力推行簡体字和注音字母。戴傳賢在政府里竭力阻撓，在什么会議上做出当众下跪"为汉字請命"的丑态。国民党政府流亡在重庆，当时有热心推行注音字母的小学校長，被戴傳賢勒令伪教育部撤职。文字改革工作在国民党統治区就这样受摧殘！

前一件事快四十年，后一件事也快二十年了。現在人民掌握政权，情况完全不同。我們不需要煞費苦心唱双簧来展开爭論，党号召了"百家爭鳴"，有的是專家作学术性的正面討論了；——不过作为專家来說，也宜乎承認历史，实事求是，对人民和事業負責，才真有益。政府对文字改革工作有專設机構从事推进，沒有任何私人可以阻撓，工作的人得到絕对的支持。工作上有缺点是难免的，但是不斷在吸取群众的意見。同志們都在文字改革委員会里工作，可以相信我的話。最大的不同是有思想領导，几年来的工作方針上就已經貫串着馬列主义的精神。因此我們必須进一步了解这一个事实，来談一談下面一个大題目：汉字改革的理論認識。

二、汉字改革的理論認識

1 关于汉字存廢的理論問題 这是文字改革問題里的老問題，也是一个根本理論認識的問題。同时也还是文字改革运动历史現实的反映。

文字改革并不是廢除汉字。这我們要追溯一下簡單的历史。文字改革的主張最早是起源于十六世紀末中西文化的接触（利瑪竇来中国）。西洋耶穌会士到中国来，帶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外，中国人也因之接触到近代科学以及拼音文字。中国的知識分子見到拼音文字的方便，首先有人想利用来改革字典。（見«西儒耳目資»書中陝西人王徵写的«釋疑»。）1636年耶穌会士金尼閣用拼音編排汉字写成的«西儒耳目資»，影响了十七世紀以来的学者，先后有許多主張文字改革的人。像1639年方以智«通雅»，1659年楊选杞«声韵同然集»，1692年刘献廷«新韵譜»，1703年熊士伯«等切元声»，都注意了拼音方法的运用和叙述。直到1842年雅片战爭以后，帝国主义大肆压迫，尤其是1894年中日战爭，刺激起爱国志士民族解放斗爭的热情，大家無不認識必須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共同奋起。一时如盧戇章、蔡錫勇、王炳耀、沈学等人都各自設計文字改革的方案。这样，文字改革与普及国民教育（就是扫盲）、民族解放問題就成了血肉关連的了。扫盲——救亡——文字改革，成为一个連鎖关系。这时期無所謂"廢汉字"的問題。1919年"五四"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起来，才有了"廢除汉字"的說法。首先是錢玄同先生發表«中国今后之文字問題»，登在«新青年»上。他反对封建主义，批評儒家和道教的思想，認为这一切都是用汉字写出来的，因而汉字是要不得的，就提出"廢汉字"的主張。这一时期文化革命理論上显得有些卞急，現在看来，他簡直是"睡不着，怪床帮"的思想。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議前后，在党的領导下，文字改革工作者对这个問題認識明确了，批判了"廢汉字"的提法。«新建設»1955年12月号上，我發表过«对文字改革的提法和看法的問題»，說明了这一个事实：三十多年来形成一种習慣，一提到"文字改革"就联想到"廢汉字"。現在关于这一問題的爭論是無意义的。这是一种誤解。吳老（玉章）在文字改革会議上的报告曾經否定了"廢除汉字"的提法。我們不是"廢除"，而是"改革"，不要諱言"改革"，不必用"改进"这类詞来自我陶醉！文字改革也是个革命，可并不要流血，是文化上的革命。党和毛主席一直关怀注意这个工作。1940年毛主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众"。我覚得毛主席这話正是对知識分子說的，正是对一些"飽汉"說的，同时也是对一些工作幹部說的。当然今天民众要文化，民众学文化的工具我們就必須为他們搞好。要把文字从壟断者手里交給大多数人！汉字并不廢除，它是存在的，誰可以把圖書館的書全毀弃掉？学好了文化的人并且可以自由学習运用。

① 参考«新民主主义論»。

改革文字是为了讓大家都能讀古書，为了更加容易掌握汉字。人类文明是不断地进步的，为了适应进步，对語言文字的工具、人們也会要求、也应該要求有所改革。我們逐步可以看出理論認識有些落后于現实。所謂"廢除汉字"的提法，只是中国革命历史發展中間某一阶段的理論。这种理論是不合于馬列主义的。

2 对于汉字改革的理論問題 汉字改革是包括好几个方面的事業。从这个精神来理解，提出所謂汉字存廢問題，显然可以看出不恰当。因为我們所作的"改革"工作內容有一系列的問題，不能拿"廢除"一点来概括。它的內容是：汉字整理、推广普通話、建立字母、过渡到拼音。汉字整理問題下面另談。这里單說一說推广普通話。談到推广普通話，就联帶到讀音問題和全部規范化。規范化的概念完全与"廢除汉字"合不上。順便提醒一句：推广普通話跟發北京音并不完全相等。不能准确地發北京音，还是可以說普通話。有人把許多語文工作者（例如我和其他一些非北京人的朋友們）說的不是地道的北京話，引以为反对推广普通話的理由，甚至于因为自己不懂語音而断言大家都不必学，我看这种人不免是"妄"而又"懶"！我們遇見不少福建、广东人說的普通話都很好。正因为認眞学語言的空气薄弱，我們过去学的不好，学得差不多就算了，今后应該努力加强学習。我們的学習成果反映了一定的現实存在，不应作为借口！还有一种社会風气，反对講普通話，是由于有地方主义思想的障碍。若干地方的人習慣"打乡談"，把方言作为秘密語来使用。追溯历史根源，又有一种偏見，由于过去的官僚們通用北京話引起一般人民反感，因此也普遍拒絕說普通話，并且譏諷做"撇京腔"。中国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了，有些过去不合理、落后的現象，人民自己有力量有組織有領导地改变它，例如这个推广普通話的問題。四十年来这个运动沒有成功，人民政权成立了才七年，文改工作收获就有这样大，否定我們的努力目标的話是沒有什么力量的。二十年前也曾經有过一位專家"客观地"——实际上是很主观地——講文字改革一下不能成功。事实胜于雄辯，我們不必跟向后看的人爭口舌！

3 汉字整理 这是汉字改革工作中間的一个大方面，跟拼音化并行的，包括对于汉字字数（如拟訂通用字表）、字序（如研究一种較好的排檢法）字形（簡化等）的整理。理論認識上我們要說并不是"廢除汉字"，就因为整理工作內容有这么多，而汉字基本上是沒有动的。誰能否認这个事实？要是廢除汉字，为什么还忙着干这些事呢？廢除异体字倒是千眞万确的廢除，但这只是在整理中淘汰一部分不需要的异体字。等到將来，就是采用拼音文字后，汉字还是在用。

汉字整理工作是順着汉字發展的兩个傾向里的"簡化"方向进行的。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議上确定了改革工作的方針方法。簡化工作的方針方法是"約定俗成，穩步前进"。这些情况都可以从会議文件匯編里看到。

簡化汉字工作是順着汉字的历史發展傾向加以組織引导的。我曾經指出它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基础。我們把向来專家学者看不起的老百姓通用的"俗体字"正式承認为合法的正体字。这是冒大不韙的。有些人对簡化字看不慣，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字从来就是"私"的、偸着写的。在推行簡化字上是采取逐步施行的方法，先用試行来推广經驗。試行分了几批，所以大多数人都習慣了，不會有多大的反感。但是交代不明，也造成了一些誤会混乱，模糊不知底細的人就以为有許多批簡化字了！試行在前，后来又公布，教人分不清楚。国务院發布的簡化汉字第一表是已肯定行用的，第二表是試行，听取意見的。有些人不理解分批是怎么回事，就說是老改不完。我們工作在这方面無可諱言有毛病，沒有把"公布"和"試行"分开說清楚。

簡化字是以"約定俗成"为原則。所謂"約定俗成"的精神，有些人还不懂这个意思。既然是約定俗成，就不可能成大套的改。例如"鄧"字，我們从兩个約定俗成的写法（邜邓）里最后决定了"邓"。我們不可能用"又"来把一大套从"登"的字都类推来改成"訍"、"汉"、"权"、"趿"。如果要这样办，"漢"、"權"就簡化不成了。因为"漢""權"簡化为"汉"、"权"，也已經約定俗成了。成大套地改必然是用"类推法"，在使用簡化字时，虽不能成套的造，但是人类智慧高明，还是可以适当地类推的。簡化規律，据我們的体会，基本上就是旣"約定俗成"又"适当类推"；如果有了偏畸，就会出笑話。这里举兩个类推成問題的例子。1956年4月《时事手冊》封里照片說明有一句"采括冬瓜"，我看了很奇怪，难道冬瓜还有一种特殊采法要"括"（刮）嗎？后来我想出大約是編輯同志由"适""敌"类推把"摘"字簡成了"括"。（提起"适"字，很多人反对，大可不必，像这样的例子有的是，例如"体"字原是"笨"字，为什么就沒有人反对了？这因为人們不知道"体"原是"笨"字了。其实只要不發生矛盾，一字兩用本是汉字允許的。）还有一个例，是在今年四月政协全国委員会上發言中出現的，就是赵朴初委員的發言里有"力刃"一語，我以为他是引用佛經，不敢断定是錯字，后来按上下文研究才知道是"力量"的錯誤。原来也許把"量"字用同音的"兩"代替了，在稿子上"兩"可能写成了草体"刃"，排鉛字的工人同志以及校对同志看做是"刃"，我想这个推測是合理的。諸如此类，都不是簡化方案和方法的問題，問題存在于掌握方案和方法原則的人。我們不能把一点扩大为全面，認为这会引起天下大乱；也不能把許多个別方面的責任都归到文字改革工作上来。文字本不是同一个时期按例类推造的，现在要集中来解决，有些矛盾也就聚結突出了。例如"李"、"杍"、"架"、"枷"，我們就不能改动。我們不是不知道按笔形結構类推。由于

我們知道更多一点，汉字并不能簡單地大量类推。有一位青年文字学家(梁东汉)研究分析得很好，他科学地說明了汉字內在的矛盾。(見«人民日报»1957 年1月26 日)我們了解了汉字內在矛盾，进行簡化沒有大量用类推法。这就引起一种責备，認为我們的工作不科学。政协全国委員会議發言中周亞衞委員就是这种主張，他責备了我們簡化工作不科学。可是整齐画一倒并不一定是科学的絕对标准。照上面的分析，汉字要是一定整齐画一，就会出問題。問題在于如何能概括現象，就要很好地运用主观，和如何适应对象，就要善于运用客观。人們常說笑話："麤(粗)、犇(奔)，射、矮，兩对字义应該顚倒过来用。"說笑話可以，当眞那么做，倒又成了笑話了！虽然你想着很"科学"，做了就不"科学"！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意义，字早已那么定了，不能憑你所想的系統随便改过来。

四月二十六日«文匯报»笔会版、施蟄存先生發表«倒翻孩兒»一文，对簡化工作提出了意見，最后說："如果絲毫不顧六書旧傳統，任意無規則地創造簡笔字，恐怕終不是个好办法。"我說过这是因为"俗字"冒大不韙取得了正式地位。对施先生說，这是一个大矛盾，大众是沒有这些問題的。如何能使得人人皆大欢喜呢！那就是一个如何正确处理內部矛盾的問題了。施先生提的問題是可以如此解答的。簡化字本身就是革命办法，六書旧傳統不能适用于我們現在的文字里面，用于篆文的条例不能用于現代俗字，沒办法根据条例系統化。施先生的話等于說"你們不要动汉字！"他是不要改革罢了。他說："宋元俗字，簡笔甚多，但是我讀元刊«古今杂剧»和繆刻«京本通俗小說»，并不困难，倒是讀我自己文章的校样，几乎每頁都有怔住的地方，这是什么道理，我請求文化領导同志再考慮一下。"这是施先生自己的态度問題。簡化方案并沒有多少离奇的地方。也有人說过"劝、难，鸡，叹"等字太不系統化了。这是典型的簡化办法，用一个簡單的符号代替原字的一部分。上面說过，这都是个別地約定俗成的，是不可能有条例系統化的。就我所知道的，文改会对簡化这一工作，先后稿子改了七次，中間普遍征求意見，吸收好多群众的智慧，反复地修改。簡化方法方面我不絮說，只談一下遭遇矛盾的地方，惟一是"同音代替"法。同音代替的办法是很古的，«易經»里就用"乾"当"干燥"字了，汉朝又用它代替"榦枝"(干支)字了。方案里"干"代"乾"，公布文件里把草案里的注解删除了，沒有交代"乾(kian)坤"字照旧不改，引起了混乱。同音代替法不是絕对不可以用，要用得有原則。这原則就是不發生語文規律上的錯誤。这种語文規律簡直是常識，也不能完全說是文改会才得負責任，作为文字編輯的人員不能絲毫不用腦筋。因为汉字本是代表汉語里的單詞和复詞的詞素而由形別义的，应用的时候，作者編者都要自己决定的，正是許多不主張拼音化的人所注意的汉字"优点"。如今出問題就是这些优点的矛盾，倒值得"优点"論者注意注意！我們簡化的是汉字，是汉語的單詞或是复詞的一个詞素。我們有一个原則：圍繞着現代汉語規范化(書面語)的中心按着詞的观点进行分析。从这一个原則来看施蟄存的話吧！他說："…現在的簡字方案已越出了簡'笔'的范圍，而成为归并同音字了，这却造成了許多不便。"前面我們講了簡化方案的內容，就是汉字整理的各方面。我們公布的是"簡化方案"，施蟄存說的是"簡字方案"。同音代替是我們簡化范圍里的事，施蟄存說"越出了簡'笔'的范圍"，不是我們的范圍。归并同音字是施蟄存不承認的簡化方法。我們用同音代替方法时有矛盾發生錯誤，但是并不是越出范圍。我們的錯誤就是沒有严格掌握1)圍繞現代汉語規范化的中心，2)按着詞的观点进行分析。例如我們把"隻""只"兩字合并了，單詞量詞無問題，复詞名詞"船隻"改作"船只"、容易發生歧义成为"船""只"如何如何("只"是副詞了)。施蟄存举的例子里，像这一类的不多，只見"儘"、"尽"，"併"、"并"兩組。其他就成了他的"倒翻孩兒"問題了！先把一个"嚇"、"吓"問題說掉。他說："…'嚇'字，本来是从口，赫音。北方人原来也讀作赫，不过在'嚇了我一跳'之类的場合，由于方言音轉，变成为'下'音。現在簡笔成'吓'字，由于是大家势必一律讀成'下'音，凡'恐嚇'，'惊嚇'的'嚇'都成为'吓'。其实这等場合北方人亦并不說成'恐吓'，'惊吓'也。"从这一段話里，我們知道了施先生还是在分"南方人"、"北方人"的阶段，跟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推广普通話进行民族語規范化运动相距不知道有多远了！这个"嚇"字該怎么認識它，有«新华字典»和«同音字典»可証。剩下一条最重要的是他"連自己写的文字，一經排成鉛字，也往往看不懂了"的問題。請看他举的例：

> 最近我校閱一本自己的譯稿，校样上有一句"那面包房里"。原稿不在手头，就怔住了，我記不起"包房"是什么地方。从上下文仔細一看，才知道应讀作"面包房"，即"麵包房"。看过几十頁，又遇到一句"那面包廂里"我又怔住了，这"面包廂"是什么？恐怕是"面包箱"之誤吧！再一研究，才知此处应讀作"那面——包廂——里"。原来这是戏院里的事情，而不是"面包房"里的事情了。这一事，使我深深感到同音归并的精簡法甚不妥当，中国字因为是單音字，所以同音者甚多，全靠异形来作区別，現在同音而又同形，势必弄得語文非常貧乏。…(以上引文的着重点是我加的——魏)

这一段話只能叫人感覺施蟄存的語文知識有限，自己不会念自己的文章，把詞兒分割开来，故意把"面包房"拆散来做批評文字改革的把柄。他自己就說明了解决問題在"从上下文仔細一看"，并不見得是不見"麵"字的过錯。因为下面一句"那面包廂里"，本应不見"麵"字，他反故意拿来要花招否定簡化工作！原文既不是"面包箱"，以施先生的文化水平，腦筋里会有一个

“麵包廂”嗎？这显然是故意揑凑的例子，給一般反对文字改革的人張目罢了！如果从語言出發，說話的时候“面包”和“麵包”有什么理由要加分別？多一个“麵包”就算語文非常不貧乏？全民語言的丰富多采，詞匯方面还是概念的丰富多采，同音不能是消極因素。接着他說：

> 江南老一輩妇人把修臉說“做面” 现在这一名詞却与“煮面条”沒有差別，豈不滑稽。

規范化范圍里沒有“修臉”意思的“做面”一詞，是不成問題的。江南老一輩妇人的話，旣是方言，并且也將归淘汰消磨掉的，提出来跟普通話“煮面条”相比，是不相称的，眞是“豈不滑稽”！最后他說：

> 至于一个普通人，我以为“面”和“麵”也应該讓他分开認識和使用，如果教給他“面”就是“麵”，“麵”就是“面”，他反而会弄糊塗了的。

我們正是施先生說的“普通人”，滿街看見“麪餅麪面”，（北京飲食業論斤卖烙餅和面条），倒并不会糊塗。糊塗的倒是施先生。这正表現了文字宜及早改革，假使詞兒連写起来了的話，想来像施先生就不至于怔住了。須知施先生自己写的“那面——包廂——里”，就是詞兒連写。按詞發音，一定有它的念法的，这就是規范化的內容。虽然施先生說：“我的文字生涯，也該有三四十年了，对于祖国的語言文字，虽不能深入鑽研，成为語文專家，一般的使用閱讀，一向都还对付得过去。”現在整个社会都变动了，我們稍一停頓，就会“倒綳孩兒”。連語言也会跟大众脫节，何况文字！

附帶解答有人提出的一个問題：社会上还有些通用的簡化字，我們沒全收入簡化方案，怎么处理？我个人的意見以为：写簡化字是人人所有的自由，当然不能用命令禁止人家用；但是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用，应該共同維持互相了解的原則。許多不在方案里的簡化字，如果約定俗成眞正好的話，將来可能收进来。原則上要說服大家遵守規范，拥护方案。

以上三点包含了一些原則性的問題。第一是文字改革基本方針。第二是文字改革工作范圍和步驟。第三是簡化的原則。我的看法不一定对，还請大家指正！

三 小結——汉字整理工作中的一些体会

我参加汉字整理工作，体会上面兩大問題，得出文字改革工作上的三点意思来。

1）文字是全民所有的工具，人人可以發表意見。發表意見要有原則。有人对文字改革有意見，我們应該考虑；尤其是專家的意見，这些意見，我們要尊重。考虑这些意見的时候也要有原則。例如有人提了这么一个意見，說毛主席指示“文字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实际是为了符合群众的意見而說此話，…何况毛主席不是語言文字学專家，对此不可能一点不中肯的地方也沒有”。①提意見的这人的意思也許是善良的，但是这肯定地是忽視了党和毛主席的領导意义，我們就不必考虑他的意見了。

2）人民自己处理文字不是無能为力的，是很有办法的，有好的处理經驗。例如区別“王”和“玉”，汉时还是同样用三横一直，用中横位置上下分別，后来才有“王”字加一点的这个“玉”字，减少麻煩了。唐朝时“士”“士”都写作“土”，为了区別把“土”写作“圡”，后来改用末笔長短来区別。这些合六書条例嗎？不合的。可是都很精巧的。現在街上又有些創造，像以“迠”、“卤”、“攴”作“鞋”、“赛”、“衾”等。

3）文字学家和一切語文工作者对文改工作所能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必需而不可缺少的。有时在这样大的問題上，專家不过是有一些并不全面的專門知識，能正确發揮力量就有好处。一不小心，会把事办糟的！我們需要很多具有專門知識的人来規規矩矩踏踏实实做好这一工作。

最要緊的，我們的文改工作是学术結合政治，在党的領导下做的人民文化历史上的偉大事業。

---

① 編者按：这是过后發表在《中国語文》1957年6月号上的关錫信里的話。

欢迎《西方語文》創刊

今年六月，中国語言学界又出現了一支生力軍——《西方語文》季刊創刊号出版了。这是一种研究各种西語、交流西語教学經驗、討論西語教学問題的綜合性学术刊物。編委会設在北京外国語学院內，出版者是时代出版社（定价0.76元）。它的对象是大学西語專業高年級生、研究生、大学和中学的西語教員以及社会上的語文工作者——就是說，一切研究、使用和喜爱西語的人。

这个杂志目前把西方語文的范圍限制在英、德、法、西班牙、意大利、罗馬尼亞等語言里，但是也可能涉及拉丁語族、日耳曼語族以至整个印欧語系。“語文”的涵义在这里包括語言和文学，从目录上看，語言的分量也許要多一些。除教学問題外，翻譯問題也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創刊号有下列几篇論文是語言研究者可能感到兴趣的：岑麒祥的《印欧系語言历史比較語言学的历史和發展》，相当詳尽地介紹了历史比較法产生和發展的过程。李賦宁的《英国民族标准語的形式和發展》，对于一般研究标准語問題的讀者有参考价值。范存忠的《关于西方語文的研究工作》談到在語文科学方面向科学进軍的一些問題。

在《創刊詞》中說：“西方語言的研究不仅可以充实本門科学，而且有助于祖国語言、普通語言学和比較語言学的研究”。我們热誠地欢迎《西方語文》的創刊。（余也牧）

評关錫和陈夢家对文字改革問題的态度

潘　山

文字改革的問題，是科学問題。对科学問題，党从去年就提出了百家爭鳴的方針；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这篇偉大的文件里也作了明确的指示："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爭論"，"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問題，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討論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踐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决。"

根据党所提出的方針和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許多在文字改革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紛紛發表了，就說明了目前对文字改革是在大"放"大"鳴"了。这样大"放"大"鳴"的結果，对于文字应否改革以及如何改革等重大問題的解决，我想将会給人們帶来喜訊的。

可是，在文字改革的爭論当中，文字学家陈夢家反对文字改革的言論，据我个人看来，却不是屬于贊成或反对文字改革的問題，而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而又不难理解的"精神"！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只要看看他托人轉交《中国語文》6月号上發表的关錫写給他的信和他写在信后的"附記"里面的話——"我自己是一个群众，十分贊成这篇通信中的精神。这就是我对于写信人的答复。"——就可以明白了。

大家看过关錫那篇通信，就会知道它的精神不外乎是：1)說文字改革使祖国文化走向黑暗之途；2)謾罵积極主張文字改革的同志"把毛主席也迷惑了"，并污蔑毛主席是随声"符合"者；3)謾罵贊成文字改革的人是"順大坡"，是"一种市儈行为"；4)說"汉字簡化后造成文字混乱"。

以上四点，就是关錫那篇通信的"精神"，严格說来，也就是文字学家陈夢家的"精神"。——其所以要这样肯定說，是因为：1)关錫写給陈的信上說："您在2月4日光明日报上發表的《略論文字学》一篇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我很同意你的看法。"2) 5月19日光明日报《文字改革》所發表的陈的演講稿《关于汉字的前途》所作的"补記"里也說到："东北四平街一位养病的青年，写了十几頁長的信給我，反对現在的簡字方案，反对拼音文字，理由也十分充足。"这位养病的青年，从許多方面印証，**就是关錫**。（文字下的重点，是我打上的。——山注。）3)关錫說过，"簡化汉字后造成文字混乱"，"关心祖国文化教育的人們，应該积極提出久郁未發的意見，以使祖国文化能够避免走向黑暗之途"，而陈夢家在《关于汉字的前途》里也說过，"若要廢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不免会引起天下大乱。"4)陈夢家始則說关錫的"理由也十分充足"，接着說"十分贊成它这篇通信的精神"。由此可見，关錫那篇通信的精神，也就是陈夢家的"精神"。

关于汉字簡化問題，最近几期的《文字改革》已經有人駁斥陈的謬論，这里就不去談它了。关于文字改革的問題，我在5月31日写过一篇《評陈夢家的汉字改革談》寄投《文字改革》了。（在我执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尙未見到發表。）在这里，我只想辨明一下以下的几个問題：

1）毛主席对"文字必須改革"的指示，是不是由于积極主張文字改革的同志"把毛主席也迷惑了"呢？而毛主席是否又是"为了符合群众的意見而說此話"呢？（从文意看，关錫所謂"符合"的意思大約是随声"附和"，而不是"符合"。——山注。）

关錫的信中說到：

> 积極主張文字改革的一些同志，大力宣傳工农兵群众都贊成文字改革，实际并非这样，只要相近的朋友同志之間說起来时，几乎是人人反对。可是大力宣傳說是群众一致拥护文字改革的結果，把毛主席也迷惑了，所以毛主席在1951年对馬叙倫先生談話时曾說过："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有人借此更大事宣傳起来，实际毛主席是为了符合群众的意見而說此話，但群众并不是贊成文字改革。何况毛主席不是語言文字学專家，对此不可能一点不中肯的地方也沒有。

可是，事实上是不是那样呢？我認为这完全是蓄意歪曲。因为第一，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員会在1952年成立的时候，馬叙倫先生所作的开会辞中就曾經說得很清楚；毛主席之所以作了这样的指示，是"因为文字改革是我国文化建設上的大事，我們去年曾向毛主席請示，主席給了我們指示，要我們研究这个問題。三、四个月以前，主席又指示我們：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我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成立本会进行研究。其次鑒于汉字書写困难，主席指示必須加以整理簡化，并指出印刷体当用楷書，手写体可用草書。"（見《中国語文》創刊号）馬先生这段談話是淸淸楚楚的，关錫有什么根据說积極主張文字改革的一些同志"把毛主席也迷惑了"？第二，就是远在1951年的十一年以前，毛主席为在延安創刊的《中国文化》那个杂志所写的名文《新民主主义論》里就提出了这样的指示："文字必須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这一指示是为了更好地实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針，亦即新文化的方針提出来的。用毛主席的話来說，那就是："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这个目的，以及在政治领域中的和經济領域中的目的，都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多年奋斗以求实現的。从这里，关錫又有什么根据說“积極主張文字改革的一些同志把毛主席也迷惑了”？有什么根据說“实际毛主席是为了符合群众的意見而說此話”呢？第三，誰都知道毛主席是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最杰出的代表，他“对于中国革命的最偉大的功劳，便是他正确地和生动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眞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踐結合起来，解决了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的問題”（見陈伯达同志：《論毛澤东思想》第1頁），其中，当然也解决了文化革命方面一系列的問題。同时，誰也都知道：“…使中国無产阶級，使中国广大的人民，使我們的党，…不至迷失自己的方向，毛澤东同志于是写了一本重要的战斗著作，即《新民主主义論》”（見同上書，第12頁）；使我們“不至迷失自己的方向”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文化领域中的“文字必須改革”的方向。这样，关錫又有什么根据說积極主張文字改革的一些同志“把毛主席也迷惑了”？又有什么根据說“实际毛主席是为了符合群众的意見而說此話”呢？第四，就是退一万步来說，毛主席說的“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是“符合群众的意見而說此話”的，那又有什么不可？难道發表这样議論的人不知道毛主席是最善于把群众的意見集中起来而又最善于把集中起来的群众意見見之于言論和行动的能手？有什么根据說积極主張文字改革的一些同志居然“把毛主席也迷惑了”？第五，說毛主席“不是語言文字学家，对此不可能一点不中肯的地方也沒有”。是的，毛主席自己沒有自封过是語言文字学家，但是，难道不是語言文字学家，就不可能提出完全中肯的文字改革的意見嗎？大家知道，毛主席不是專搞文学的，可是他写的文章是我們文学語言的典范，而且他提出过为作家們所遵循的正确的文艺方針。斯大林同志不是語言学家，可是他写了《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对語言学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如果說毛主席对“文字必須改革”的指示“不中肯”，那就試問“不中肯”在什么地方？就算毛主席不是語言文字学家，“对此不可能一点不中肯的地方也沒有”罢，那么，“对語言沒有什么研究”的关錫在通信中提出的反对文字改革的意見，陈夢家为什么倒說是“理由也是十分充足”，并且还說“我自己也是一个群众，十分贊成这篇通信的精神”呢？大概在陈夢家的眼睛里关錫比毛主席在这問題上更高明得多吧！

从上面所說的几方面看来，我認为关錫的說法是荒謬到了極点，而且蓄意是非常惡劣的。而身为文字学家的陈夢家居然說关錫的通信“理由十分充足”，他“十分贊成这篇通信的精神”，請問陈夢家有什么根据說这样的話？說这話用意是什么？我所以說关錫的話是荒謬到了極点，那是因为他混淆黑白，顚倒是非；我所以說他蓄意非常惡劣，那是因为他在肆意謾罵、汚蔑广大人民热爱的毛主席以及在共产党領导下的許許多多为文字改革辛勤工作的同志。虽然在他的謾罵和汚蔑的字句中，沒有像儲安平之流那样扣上“大和尙”和“小和尙”的帽子，然而其毒辣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

如果說沒有扣上帽子准不得数，指出他的毒辣是寃枉了他，那么，对于另外的許許多多贊成文字改革的人，他又为什么說“至于‘順大坡’也跟着贊成文字改革，也可以說是一种市儈行为”呢？难道这还不是謾罵嗎？老实說，連远在南方僻省一个小县的中学里当人民教师的我以及許許多多在广大地区从事文教工作的同志都被罵到了，因为我和文教界中許多同志也是贊成文字改革的。你有什么理由說我們是“市儈行为”？其次，你說我們贊成文字改革是“順大坡”，究竟我們“順”什么“大坡”呢？难道不是“順”着毛主席指示的“文字必須改革”这个“大坡”嗎？难道这不是毛主席說的“中国革命的万里長征”途程中的一个“大坡”嗎？难道这不是毛主席說的“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的一个“大坡”嗎？难道这不也是毛主席說的“随着經济建設的高潮，必不可避免的要到来文化的高潮”中的一个“大坡”嗎？我們“順”着毛主席的指示走过了一个“大坡”又一个“大坡”，現在我們又“順”着毛主席的指示走向这个“文字必須改革”的“大坡”，而你譏諷我們是“順大坡”。这里姑且不再追問你說这話的意圖是什么，只請你指示我們应該“順”哪一个“小坡”走才不会有“市儈行为”不会成为“市儈”呢？

陈夢家在《文字改革》所發表的講稿里，旣然說“不知道《中国語文》是搞什么的”，“不願往那里投稿”，却又为什么要把关錫的通信托人轉交《中国語文》？而且說关錫信里的“理由也十分充足”、“十分贊成这篇通信中的精神”，难道不是甘願为关錫的“理由”和“精神”所驅使嗎？我們这里要問的倒不是这是不是“市儈”行为，而是要問这种行为的用心何在？

（接14頁）

定俗成”呢？这种前后矛盾的說法眞使人莫名其妙。我認为按照“約定俗成”的原則来决定簡体字的取舍的做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有特殊情况，那可以另行处理。

另外，关錫还批評許多簡化汉字的音符被破坏了。这种說法也是很保守的。事实上，方塊汉字發展到現在，眞正能按照原来的所謂音符来讀音的字并不多。向来流行在人民群众中的簡体字有音符的也并不多。我們为什么一定要求每个簡化汉字都有音符呢？这是合乎实际的嗎？

关錫的文章中，还有許多小地方值得商榷，这里不一一提出我的看法了。

反对歪曲和汚蔑文字改革

毛西旁

讀了《中国語文》1957年6月号关錫的《一封討論文字改革的信》和陈夢家的《附記》之后，我对信中的許多說法感到非常气憤。

关錫說："汉字并不是象有些人宣傳的那样难学，誰沒从学字的阶段經过呢？我們并沒受到那些'苦头'。再看看小学生，每天可以說淨玩，看不出他們因学汉字而費了額外的时間和腦力而苦惱。"我認为这种說法是不合乎事实的。我承認，过去在文字改革宣傳工作中，有过于夸大汉字缺点的地方，这应該糾正。但汉字的确是很难学的，比拼音文字难得多。小学生在学習方塊汉字上的困难，关錫根本沒有看到。学習拼音文字的效果比学習方塊汉字的效果大，这早就有人作过科学实驗和科学比較的，我这里不囉嗦。旣然拼音文字比方塊汉字容易学、容易写、容易認，为什么我們不采用它呢？为什么不采用它而減少学習上的苦惱呢？至于我們現在初步制定的《汉語拼音方案》是否周密完善，那是另外的問題。我們不能因为現在制定的《汉語拼音方案》还存在缺点就否認了走拼音化道路的正确性。我們可以多方征求意見，吸取外国拼音文字的优点，結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一套比較完美的拼音文字，这是完全可能的。無論哪一国的拼音文字，都是从不完美發展到比較完美的。我們为什么就不能呢？任何事物都是發展的，拼音文字也不例外，它在实驗和推行中是可以逐步变得完美起来的。

关錫說："大力宣傳說是群众一致拥护文字改革的結果，把毛主席也迷惑了，所以毛主席在1951年对馬叙倫談話时曾說过：'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有人借此更大事宣傳起来，实际毛主席是为了符合群众的意見而說此話，但群众并不是贊成文字改革。何况毛主席不是語言文字学專家，对此不可能一点不中肯的地方也沒有。"我認为这种說法是不正确的，是对毛主席的汚蔑。毛主席虽然不是"語言文字学專家"，但他老人家的指示是正确的。他不是被大家"迷惑"了才作出那样的指示的，而是經过他老人家研究过的。毛主席的指示不仅符合方塊汉字發展的規律——方塊汉字將来必然走向拼音化，而且也符合广大人民和后代子孙的利益的。又說"至于'順大坡'也跟着贊成文字改革，也可以說是一种市儈行为。"如果我們沒有領会錯的話，这就很难不使人感觉到关錫也把毛主席看成了"順大坡"，看成了"市儈"。这不仅是对毛主席的汚蔑，而且也是对广大贊成文字改革的人的汚蔑。对于关錫这种汚蔑，我提出严重的抗議。

奇怪！为什么贊成文字改革就是"順大坡"，就是"市儈"呢？难道只有关錫这种反对文字改革的人才是"正人君子"嗎？关錫还說他提出反对意見是"使祖国的文化能够避免走向黑暗之途"。这話也是很悪毒的，它歪曲了文字改革工作的严肃的政治意义。按照关錫的說法，就很难不使人發問：难道主張文字改革的人是要使祖国的文化走向黑暗的罪人嗎？难道实行拼音文字就会使我們祖国的文化"走向黑暗之途"嗎？肯定地說，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領导我們結束了这几千年黑暗的时代，使我們祖国的文化有了光輝燦爛的前途。几千年来，在封建統治的压迫下，广大的人民不識字（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那才是"黑暗"哩！关錫为什么不相信、不承認我們主張和实行文字改革正是为了促进祖国文化的發展呢？为什么要閉着眼睛瞎說呢？

关錫又說："汉字簡化是为了初学字的人而簡化，至于已經掌握了汉字的人，不用文改会頒布簡化汉字，他們在写字时，根本就写簡体字甚至行書、草書。所以汉字簡化对已掌握汉字的人們来說意义是不大的。"我認为这种說法也是很片面的。我承認，文改会沒有頒布簡化汉字以前，許多人确实是在使用簡体字。但那是处在"自流"的狀态中，很混乱。現在旣然要在全国实行簡化汉字，就应該有个共同的一致的写法才行。如果各显神通，各自使用自己的簡体字，那怎么行得通呢？为什么頒布統一的簡化汉字沒有用处呢？我認为，应該頒布統一的簡化汉字，这样做法的意义不是"不大"，而是"很大"。頒布統一的簡化汉字，使得会与不会的人都有个書写的标准，这意义难道不大嗎？至于頒布的簡化汉字中，如有簡化不妥当的，那可以向文改会提出来，加以改进。大家商量，大家想办法，这才是正确的解决問題的途徑。为什么一口否定了頒布簡化汉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呢？簡化汉字中是有缺点的，有些字簡化得不妥当。但总的来說，在使用上，簡化汉字是比原来的繁体字容易得多了，这是事实。而关錫不顧事实，硬說"比原来汉字难学难認"。就拿关錫的"关"字来說，原来有19画，簡化后只有6画，这难道还"难学难認"嗎？

关錫前面說"不用文改会頒布簡化汉字，他們在写字时，根本就写簡体字"，后面又說"根据'約定俗成'的簡字作正式文字是不恰当的"。旣然承認人民群众在广泛地使用簡体字，照理說就应該以人民群众慣用的簡体字为取舍的标准，为什么关錫又反对"約

（下轉13頁）

汉語中处所詞做主語的存在句

陈庭珍

一 汉語中处所詞的特性

汉語中有一类詞叫方位詞，如"上、下、里、外"，它可以單独运用，也可以与普通名詞結合構成处所詞(或詞組)，如"桌子上、屋子里"。方位詞、处所詞，一般語法学家都承認它們是实体詞，通常把它們列为名詞的附类。处所詞代表具体的空間概念，可以作为陈述描写的对象，可以做句子中的主語或宾語。汉語表达具体的空間概念，一般是用处所詞(或詞組)；表达行为与空間的关系，一般是用介詞和处所詞組合而成的介詞結構，如"在桌子上、在屋子里"。

印欧語系語言如英語、俄語，沒有与汉語方位詞相当的这一詞类，因而也沒有与汉語处所詞相当的这一詞类。英語、俄語表达空間的概念，一般是用前置詞。前置詞与名詞組合而成前置詞詞組，表达出各种空間关系，例如：英語 on the desk, in the room; 俄語 в комнате, на столе。

on、in, в、на, 这些前置詞是表达空間关系的虚詞，它們本身沒有实在的意义。这些前置詞詞組一般不做主語或一般性宾語，而做副詞性附加語 (adverbials)、形容詞性附加語 (attributes) 或表語 (predicative)。这些前置詞詞組譯成汉語有兩种譯法，一是譯成处所詞(或詞組)，一是譯成介詞結構，要根据具体的句子来决定。这种互譯是根据意义，至于从語法結構的角度来看，它們是很不相同的。①

下面我們举出一个句子做例子来看看汉語中的处所詞和英語俄語中的前置詞詞組的区别。

屋子里黑漆漆的。

这是汉語中一个普通的处所詞做主語的句子。根据汉語一般的語法規律来分析，这是具备主語、謂語兩部分的描写句。"屋子里"是主語，是描写的对象；"黑漆漆的"是謂語，是描写的內容。这个句子譯成英語是——

In the room it is dark.

譯成俄語是——

В комнате темно.

在英語里"in the room"是前置詞詞組，不能做主語，于是在句子的主語位置上安上一个假主語"it"。英語語法上称"it"做"expletive"，它本身沒有实际意义，只是做形式上的主語。在俄語里"в комнате"是前置詞詞組，不能做主語，于是这个句子就屬于無人称句。

这个表达相同意思的句子在三种語言中就有三种不同的分析方法，这充分說明了語法的民族特征。各种分析方法都是根据各民族語言的內在規律来决定的。如果有人認为英語、俄語中这类句子表达空間关系的前置詞詞組不是主語，因此汉語中这类句子句首的处所詞也不能做主語，这种句子也应該分析为無主句或省略了主語的句子，那显然是削足适履，不符合汉語的实际。

由于处所詞(或詞組)的实体詞性質，汉語中有大量的以处所詞(或詞組)做主語的句子。这些句子并不限于形容詞謂語句，它还包括了名詞謂語句、动詞謂語句、主謂謂語句。举例如下：

甲、以处所詞做主語的名詞謂語句：

(1) 不用判断詞(即系詞)"是"的：

1. 林子里白茫茫的一片，积雪有膝盖深…（在战斗中成長的女英雄）
2. 眼前一片大森林，灰色的云層压在上面…（大森林的主人）

(2) 用判断詞"是"的：

3. 楼上是給皇帝、皇后、太子、公主們預备的房間。（在雅尔达）
4. 云層下边是一片濃霧。（在北極）
5. 淀里也是一片銀白世界。（荷花淀）
6. 穷人的門前却是垃圾堆。（我热爱新北京）

乙、以处所詞做主語的形容詞謂語句：

7. 村子里就混乱起来，鬧鬧嚷嚷的。（二虎子）
8. 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凈得很。（荷花淀）
9. 人們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靜。（祝福）
10. 战地上沉默、紧張，令人喘不过气。（紅旗）

丙、以处所詞做主語的动詞謂語句：

(1) 以准系詞做謂語的：

11. 村前才真的变得厉害呢。（故乡紀行）

(2) 以他动詞(即外动詞)做謂語的：

12. 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凈。（語法講話例句）
13. 江面照得通紅。（三渡天險）
14. 皇宮里面裝修得非常富丽。（在雅尔达）

(3) 以自动詞(即內动詞)做謂語的：

15. 演講厅里坐得滿滿的。（自动工場）
16. 坑北住得滿滿的，坑南也盖起了成片的新屋。（故乡紀行）

---

① 高名凱：《汉語語法論》193頁："当然'在桌子上'的意义和'sur la table'或'on the table'相去不远，但就語法結構来說，兩者确是不同的。总之，西洋語言中一切表示空間关系的前置詞，在中国語里是由'在'或'于'这个准动詞和表示具体的空間观念的名詞的結合来表示的。"

丁、以处所詞做主語的主謂謂語句:

17. 窗外風景很好。(在雅尔达)

18. 一座楼房的門口却人山人海…(自由幸福之邦捷克)

二 处所詞做主語的存在句

上节所举用处所詞做主語的句子，因为句首处所詞的主語性質十分明显，一般人在析句时不会有多少紛歧的看法。另外，我們語言中还有一类用处所詞做主語的存在句，語法学家們的看法就很不一致了。現在我們專就这一类句子来研究。

汉語中叙述事物的存在有兩种方法。一种是以事物做主体，用动詞“在”。这种表現方法的格式是: 代表事物的名詞做主語，“在”做謂語，处所詞(或詞組)做宾語(处所性宾語)。这种句式与一般叙述句的格式基本相同，我們称它为甲式。如:

一本書在桌子上。

另外一种表現方法是以处所做主体，用动詞“有”。这种表現方法的格式是: 处所詞做主語，“有”做謂語，代表事物的名詞做宾語。这种格式我們称之为乙式。如:

桌子上有一本書。

这兩种格式形式上的区别是动詞不同，詞序顚倒，主宾互換; 意念上的区别是甲式以存在的事物为陈述对象，乙式以处所为陈述对象。也就是說，說話的人对所叙述的那件客观事实的認識过程、叙述重点是有区别的。

英語、俄語叙述事物存在的句子的格式与汉語不同。英語中表示存在的动詞用 verb to be，俄語中表示存在的动詞用 есть (但經常省略)。例如:

英語: The book is on the desk.
On the desk, there is a book.

俄語: На столе книга.
Книга на столе.

英語的第一种格式，“book”一般是有定的。这个句子“book”是主語，“on the desk”是表語(predicative or subject complement)。第二种格式“on the desk”虽然到了句子的最前头，但仍然不能做主語，因为它是前置詞詞組。“book”虽然放到句尾去了，根据英語語法是后出現的主語，因为句子中只有“book”是实体詞，而且句子中动詞的数变是根据“book”的数来决定的。为了使这个句子和英語中一般句子的格式一致，在正常的主語位置上就安上了一个引导詞“there”。

俄語因为是具备完备格变的語言，詞序就更不重要了。上列兩种格式尽管詞序顚倒了，但因为“книга”在兩种格式中都是第一格，所以它們都是主語，“на столе”是狀語，兩种詞序不同的句式分析方法沒有任何区别。

这类句子在三种語言中不同的分析方法，也是这三种語言的民族特征所决定的。因为俄語是有完备格变的語言，主語宾語的决定完全依賴格变。英語是失去了一部分格变的語言，詞序比較固定，主宾語的决定常常是依賴格变、动詞的形态和詞序三方面来决定的。汉語沒有像印欧語系那样的形态变化，实体詞沒有格变，动詞沒有身、数、时的变化，因此汉語中主語宾語的决定应主要地根据詞序，这是民族語言本身的規律所决定的。

汉語中“桌子上有一本書”这种类型的句子应分析为“主—动—宾”，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証明:

(1) “一本書”是宾語，从古代汉語中可以得到証明。古代汉語中，代詞“之”只用做宾語，不用做主語，而古文中“有”字后面經常跟“之”字。

(2) 处所詞做主語，在古代汉語中也是存在的。例如:

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孟子)

这是四个駢立的分句構成的复合句，如果說“庖、廐、野”不是主語，而“民”是主語，显然是說不通的。①

三 存在句的变化和分析

“在、有”是兩个單純地表示存在的动詞。假如我們不仅要說明事物的存在，而且要說明它怎样存在，那就要添上其他的詞語，使这个句子复杂化。

一本書在桌子上放着。

这个句子不仅說明了書的存在，而且說明了書怎样存在。因为“放着”这个詞的含义比較具体，而且也可以包括“在”的意义，所以“在”在这个句子中就虚化而成为介詞，不再做謂語了，“放着”成了这个句子的謂語。

这个句子还可以簡化成下面的样子:

一本書放在桌子上。

乙式也可以照这样变化:

桌子上有一本書放着。

桌子上放着一本書。

于是，叙述事物存在的句式可以有下列六种变化格式:

(1) 一本書在桌子上。………… (2) 一本書在桌子上放着。…… (3) 一本書放在桌子上。………	甲式
(4) 桌子上有一本書。………… (5) 桌子上有一本書放着。…… (6) 桌子上放着一本書。………	乙式

这六种格式發生变化的是謂語部分，处所詞的主

① 呂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修訂本)67頁說这四个小句“联立得很調和，可以推見他們确是同一模型”。

賓語性質并沒有發生变化［仅仅在(2)(3)格式中因为"在"的虛化，处所詞成了介詞的賓語］。

当然存在的事物并不限于無生物，有生物或人都可以作为存在的事物来陈述。假如我們所要叙述的事物是"人"，那么，只要把表达陈述的对象和存在的姿态的詞語加以掉換，就可以照上列六种格式造成下列六个句子：

(1) 一个人在屋子里。

(2) 一个人在屋子里坐着。

(3) 一个人坐在屋子里。

(4) 屋子里有一个人。

(5) 屋子里有一个人坐着。

(6) 屋子里坐着一个人。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桌子上放着一本書"和"屋子里坐着一个人"这兩个句子在結構形式上是相同的，所表达的意思也是类似的。所以我們認为"屋子里坐着一个人"也应該分析为"主—动—宾"。

四 几种不同的看法

目前語法学界和語文工作者对"屋子里坐着一个人"这种句式的分析方法，是很不一致的。大致有下列四种看法：

1) 認为这类句子是附加語提前主語退后的倒装句，应該分析成"附—动—主"。

2) 認为这类句子是無主句，应該分析成"附—动—宾"。

3) 認为这类句子是处所詞(詞組)做主語的主謂謂語句，謂語部分的主謂結構主退謂后，因此应該分析成"主—謂(动—主)"。

4) 認为这类句子是处所詞(詞組)做主語的句子，应該分析为"主—动—宾"。

我認为第四种分析方法是比較符合汉語語法的民族特征和語言实际的。从上面几节的分析中已能得出这个結論。下面我再把不同意其他各种分析方法的理由作进一步的說明。

(1) 这类句子动詞后面的名詞不是主語是宾語。

1. 这类句式是表現事物存在的句子，不是叙述行为动作的句子。动詞后面的名詞不是以行为的施动者或受动者的身份出現的，而是以存在的事物的身份出現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書"和"屋子里坐着一个人"这兩种句子，动詞和后置成分之間的关系，如果从动作行为和施事受事的角度来看，当然大不相同，但是如果从存在的姿态和存在的事物这一角度来看，就可以是同一格式。这正說明为什么在我們的語言中，常常把这兩种句子駢立起来，絲毫也觉察不出它們的区别。例如：

到处生長着肥碩的谷物，奔馳着無数的牛羊，兴建起新的城鎮和乡村。（通北农場）

这是因为动詞后面的名詞在这类句子中对于說話的人来說，都代表存在的事物，不过某些是無生物，某些是有生物罢了。如果这兩个句子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就会造成混乱，也不符合語言实际。

为了使这种賓語有利于一般性宾語，張志公先生主張分别采用存現宾語和行动宾語的名称，这种主張是可以考虑的。①

2. 这种句子不是叙述行为动作的，还可以从这种句子中动詞的特征来說明。这类句子的动詞一般可以不表示眞正的动作而表示事物的靜态，在这类句子中动詞后面的詞尾"着"正是表示靜态的标志。如：

桌子上放着一本書。

牆上挂着一幅画。

"着"在一般的叙述句中是表示行为动作正在进行的情貌詞尾。在这兩个句子中"放、挂"所代表的动作早已完成并不在进行，为什么后面还加上"着"呢？这正是因为"放、挂"在这里并不表示眞正的行为动作而只表示存在的姿态，这个"着"是表示狀态的持續，并不是表示行为的进行。②这是与一般叙述句中"着"字的用法不相同的。从这里也可以說明这类句子的动詞不是表示眞正的行为动作的而是表示存在的姿态的。因此在叙述句中很重要的施受关系，在这类句子中也就沒有什么重要意义了；而且这些动詞后的名詞也从行动宾語变成存現宾語了。正因为如此，"放、挂"等他动詞和"坐、站"等自动詞尽管詞法本不相同，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在这种特殊格式的句子結構中)它們的詞法特征却統一起来了。所以"屋子里坐着一个人"和"桌子上放着一本書"应同样分析为"主—动—宾"。

(2) 这类句子句首的处所詞是主語不是附加語。

1. 处所詞是实体詞，汉語中以处所詞做主語的句子是常見的。这些句子包括了名詞謂語句、形容詞謂語句、动詞謂語句和主謂謂語句。可見处所詞做句子中的主語是它的普遍功能。根据前节的分析，这类句子中的处所詞正是以陈述对象的身份而充当句子中的主語的。如果我們否認这种句子中处所詞的主語性質，那就必然要否定汉語中处所詞做主語的普遍功能，否則就会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但是，否定处所詞做主語的普遍功能显然是不可能的。

2. 有人認为汉語中处所詞可以做动詞的附加語，这也是处所詞的固有功能，这种句式是用处所詞做附加語的句子。

汉語中处所詞有时候可以放在动詞的前面做动詞的附加語，說明行为动作發生的处所，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例如：

---

① 張志公：《汉語語法常識》，102頁。

② 《語文学習》1954年11月号53頁王了一《語文知識》講"着"的用法："因为它表示經常性的事情，所以它也能表示一种靜态"。举例中有"桌子上放着意見簿"。

炕上坐吧。

他前边去了。

咱們屋里談吧。

但是，我們还不能据此証明我們所討論的这类句子句首的处所詞一定是附加語。因为尽管汉語中的处所詞有做动詞的附加語的功能，我們也不能因此否定汉語中处所詞有做主語的普遍功能。那么这类句子句首的处所詞究竟是主語还是謂語的附加語呢？这就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我們認为这一点不能單憑意义来臆断，必須从句子結構关系上来寻找根据，也就是說，应該找到形式上的根据。

我們認为可以从这类句子句首的处所詞与后面动詞的結合情况来研究。

一般的句子，主語和謂語之間是可以插进任何种类的謂語附加語的，副詞是最普通的一种謂語附加語，当然也就可以放在主語謂語之間。例如：

他們走了。

他們已經走了。

他們都走了。

一般的句子，处所性附加語与动詞之間就不能随便插入副詞。如果謂語同时有副詞附加語和处所性附加語，那么，副詞一定放在处所性附加語的前面。例如：

他前边去了。	他已經前边去了。
炕上坐吧。	就炕上坐吧。
他們在屋子里看書。	他們都在屋子里看書。

我們不能說"他前边已經去了"，"炕上就坐吧"，"他們在屋子里都看書"。

这就說明根据汉語句子的結構規律，主語和謂語之間，处所性附加語和动詞之間的結合关系是不相同的，前者結合得較松，后者結合得較紧。

回头来看看我們所討論的这类句子：

每节車里都裝着广播器。（群众号列車）

空气中还夾杂着火藥的气味。（为了祖国）

小河边上和稻場上又聚着女人和孩子們。（春蚕）

他的园子里却站滿了这么多人。（果树园）

这些句子中处所詞和动詞之間都有副詞，这些副詞如果移到处所詞的前面，句子反而不通了。这就說明这类句子句首处所詞和后面动詞的結合关系和通常句子中主語和謂語的結合关系完全相同，而与处所性附加語与动詞的結合关系大不相同。所以我們說这类句子句首的处所詞是主語，不是附加語。

3. 另外有一部分人主張用处所詞前面能不能加介詞来决定处所詞在句子中的地位。不能加介詞的就是主語，能加的就是附加語，例如"屋子里黑漆漆的"这个句子，"屋子里"前面不能加"在"，所以"屋子里"就是主語。又如："屋子里坐着几个人"这个句子，"屋子里"前面能加"在"，"屋子里"就是附加語。不仅这种說法的理論根据不充足，而且在运用这个方法来分析实际語言中的句子的时候，我們就会遇到困难，这种理論本身的矛盾在实踐过程中就暴露出来了。例如：

教室里靜悄悄的，沒有一点兒声音。

屋子里白亮白亮的，坐着十来个人。

兩旁是光滑的笔直的柏油路，走着各式各样的車輛。

对这类句子，語法学界一般有兩种看法：一种是把它們看成具有复謂語的簡單句；一种是把它們看成后一分句主語承前省的复合句。照第一种看法，句首的处所詞，就前一謂語說不能加"在"，就后一謂語說能加"在"，那么这个处所詞究竟是主語，还是附加語呢？照第二种看法，句首的处所詞就前一分句說能加"在"，就后一分句說不能加"在"，如果說这个处所詞在前一分句是主語，在后一分句是謂語的附加語，这是与一般复合句后一分句成分的省略規律不相符合的。这种說法只能造成語法規律方面的混乱現象。

从以上各方面的分析看来，这类句子句首的处所詞分析为全句的主語，就形式和意念兩方面說都是合理的。

五 句首是介詞結構的存在句

汉語中也的确存在着一部分句首是介詞結構的存在句。不过数量远較以处所詞（詞組）做主語的存在句为少。例如：

在我們后面的观礼台上，站着許多外国来宾。

在斜对門的豆腐店里，确乎終日坐着一个楊二嫂。

在这些句子中，处所詞前既然加上了一个介詞，处所詞变成介詞的宾語了，当然就丧失了主語的資格。介詞結構一般是不做主語的，所以这类句子应該分析为"附——动——宾"，屬于無主句的一类。

但是这类句子，句首的介詞結構，与一般句子的謂語的处所性附加語还是有不同的，它和謂語之間結合得松，常常可以用副詞隔开，所以把它看成全句的附加語比較恰当。这种介詞結構在句首的存在句可作为存在句的一个別类。

有人認为句首是介詞結構的存在句和句首是处所詞的存在句意思上几乎沒有差別，分析成兩种句子是不恰当的。我們認为这兩种句子形式上有明显的不同，意义上也不是沒有区別。如果說二者意义完全相同，那豈不是否認了"在"这个介詞在汉語中存在的价値了嗎？这兩种句子意义上的不同主要是表达的重点不同。当我們用处所詞做主語的时候，我們是以事物的存在来說明某一特定空間的情况的。当我們用介詞結構做附加語的时候，我們是着重表达事物存在与某一特定空間的关系的。在有些句子中，这种区別是可以看出来的。例如：

对面碉堡上，却从槍眼里透出了明灯亮燭，不时傳出了日本人的狂笑声。（呂梁英雄傳）

这个句子，“对面碉堡上”是作为陈述的对象作句子的主語。而“从槍眼里”显然是說明“透出明灯亮燭”的处所，因此是謂語的附加語。

六 “出現”和“消失”的句子

和存在句屬于同一类型的还有叙述事物的出現和消失的句子。例如：

校長办公桌上出現一本厚厚的美丽的簿子。（年代記）
我的腦子里忽然閃出一幅神异的圖画来。（故乡）
山脚下突然鑽出五个人来。（渡天險）
水面上露出个小腦袋来。（雨来沒有死）
东隔壁店里走了一帮客。（語法講話例句）

这一类句子，从結構上說，和处所詞做主語的存在句很相似；从意念上看，对說話的人来說，“出現”是“存在”的开始，“消失”是“存在”的終結，所以它們可以归入存在句一个类型。①

* * *

［附記］初級中学課本《汉語》第三册（5.2、65.27）中，对于方位詞構成的处所名詞和方位結構在句首时的功能交代得很不清楚，教师講授这一节时感到非常困难，同学也很难接受。因为課本肯定了方位处所詞和方位結構在句首可以做主語，也可以做狀語。而对什么条件下是主語，什么条件下是狀語，就沒有明确的交代。課本上对“長江以南是人口稠密的地方”和“校門外边有兩棵大树”这兩个例句中的方位結構作不了同的分析：前句的方位結構分析为主語，后句的方位結構分析为狀語。要同学們区别这兩个句子中方位結構功能上的不同是很困难的；要教师把它們的区别解釋清楚也是困难的。一般同学只要是沒有学过外国語的，都認为上面兩个句子中句首的方位結構一律分析为主語容易理解得多。課本第三册的《教学参考資料》上对这个問題有一段說明，指出这种句子句首的方位处所詞和方位結構“有可能被誤認为主語”，要求教师“着重解釋，以便学生能获得明确的認識”。参考資料上提出了三个辨别的方法：（1）从形式上看，帶方位詞的經常都是狀語，不是主語，只有專名不帶方位詞的才有作狀語、主語的兩种可能性；（2）从意义关系上看，謂語和主語之間是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狀語和謂語动詞之間是修飾和被修飾的关系；（3）从造句的其他可能性看，表处所或时間的狀語，前边大都可以加上介詞“在”等，主語前边不能加。这三个辨别的方法不仅掌握起来不容易，而且在理論上缺乏說服力。第一条否定了方位处所詞做主語的可能性，是与課本所說的自相矛盾的。第二条所謂意义关系是很不可靠的，因为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第三条比較具体，但是它的缺点，我們在上文已經討論过。何况能不能加介詞“在”等，实在沒有絕对的标准。例如用判斷詞和名詞構成的合成謂語句通常被認为是不能在句首的处所詞前加“在”的，但我們也能找到加“在”的例子：

在那树林边，是个山谷，被水冲成很深的一个峽。
（缺席者的故事）

如上所述，又怎么能够要求教师給同学一个明确的認識呢？所以課本上的这种处理方法还是值得商榷的。

---

① 参看呂叔湘《汉語語法論文集》，107頁。

（上接27頁）

屬称謂的，表示單数时也都具有一种客气的意味。例如：

ʿŋ̍ 的床都拾掇好了。
ʿŋ̍ 的飯都盛来了。

表示多数的就沒有这种客气的意味了。例如：

这都是我的，那一些才是 ʿŋ̍ 的。
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 ʿŋ̍ 的想法是不是也都是这样？

（四）他們（ˌtʻam，不讀 tʻa mən）

贛榆方言里表示第三身多数的用“他們”。例如：

他們都是这样說的。
他們都来，我也来。

但是“他們”并不完全等于北京話的“他們”。在贛榆方言里“他們”除了表示第三身多数外还可以作第三身單数的不定代詞来用。例如：

我听他們說的。
他們告訴我的。

在上面的例子里“他們”相当于北京話的“別人”。不一定是多数，可以是指的某一个个別的人来說的。

“他們”也可以用来表示領屬关系。但同“俺”、和 ʿŋ̍ 情形不同。用于亲屬称謂的可以加“的”字，也可以不加“的”字。例如：

一、他們孩子
二、他們的孩子
三、他們亲戚
四、他們的亲戚

一和二，三和四意义上是沒有什么区别的。加“的”或不加“的”只是語气的緩急不同而已。

汉語复句新体系的理論

黎錦熙　刘世儒

复句和單句的区分标准

复句和單句区分的标准，簡單地說，就是"成分划定法"。所謂"成分划定法"，主要是看某一語言單位能不能被划定为另一語言單位的成分。能，就是單句；不能，就是复句。比較：

他不来是一件怪事。（可划定为主語）

我知道他是王福荣。（可划定为宾語）

他們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爱正义。（可划定为謂語）

他走过去，把門开开。（可划定为謂語）

以上应归單句，因为都可以划定为單句中的成分；以下应归复句，因为都不能被划定为其中那一个語言單位的內部構造上的成分：

風住了，雨也停了。

假如他要去，我一定去。

关于这个問題，已有專文討論，这里只提总綱，不必多說了。①

复句的定义

我們曾在《汉語复句学說的源流和解决問題的方法》②一文里談到一些关于复句的定义。这些定义都有一定的參考价值，但是也有一定的缺点，所以就不便照抄了。現在仅以刘复的复句定义为例来談一下。

刘复說："凡以兩个或兩个以上的子句合成的文句，叫作复句。"照着这个"定义"来归类，那就势須承認：

(A)包孕句归入复句；

(B)連环句归入复句，如：

你請他来。

(C)帶有独立成分的句子归入复句，如：

啊！你眞行呀！

老李，我也可以去么？

(D)嘆詞連用的句子归入复句，如：

哼，哼…（病人呻吟）

喂，喂…（打电話）

如此等等。在我們看来，这些句型是都不能成其为复句的。(A)型之所以不能是复句，理由已見前；(B)型的理由同(A)；(C)型有特定的語音形式为标帜，就是說，它对"本句"只能有联接性的休止，不能有隔离性的休止。象：

啊。你来了。

老王。他来了么？

这样的句子就是不可理解的。况且"呼語与句子联系的主要手段"还有"特殊的呼喚音調（звательная интонация）"，怎能截在兩起呢？尤其是(D)型，它之不能成为复句，更是显然可見，因为如果承認这是由一連串的"独詞句"③構成的多元的"混合复句"，那"病人"倒要成为"健談家"了！打电話的都要成为"饒舌者"了！

我們的初步意見，复句的定义应該是这样：

凡句子和句子，以一定的邏輯关系，用（或者可能用）和邏輯关系相适应的連詞或关联詞語联接起来，因而具有巨大的（或可能是巨大的）意义容量的語言單位叫复句。

这句話是需要說明的：

(a)說"句子和句子"，这就是說一个句子是不能構成为"复句"的。当然这兒所說的句子和句子中的"句子"有时也可以是不完整的。如：

如果有人，我就不去了。

这里从句显然是缺少主語的，然而一样可作为复句中的从句。因为这只是單句中的句型（單部句和双部句等）問題，对于复句是根本不会發生什么影响的。

(b)說"以一定的邏輯关系"，这就是說那些"烏合之众"的句子是不能作为复句看待的。如：

啊！你眞行啊！

这"啊"就只能是單句中的独立成分，它沒有資格和"你眞行啊"構成复合句。

哼，哼…

这一連串的"哼"，就只能是"独詞句"（如果独詞句这种說法可以成立的話）的簡單的重复，更沒資格作混合复句了。

---

① 參看刘世儒的《試論汉語單句复句的区分标准》，見《中国語文》1957年5月号。

② 見《中国語文》1957年6月号。

③ 刘复氏認为"例如噫！嘻！唉！等字""可叫作独字句(one-word-sentences)"或"句詞(sentence-words)"。他認为"这几种字，虽然不合于理論的句，而依着他的現象說，却不能不承認他是句；若在言語史上去寻求他的位置，他还是語言最初的老祖宗咧"（中国文法通論，69頁）。苏联科学院《俄語語法》也把这种語言現象列为"嘆詞句"（見第二編第二册，86頁）。我們認为这种說法也不是沒有理由，只是不应該和一般句子混为一談。否則，"不如归去"果成杜鵑之語，而"鈎輈格磔"也眞是鷓鴣之言了。并且这种說法也还不能成为定論。卽使承認它具有句子資格，但仍然不能就証明"哼，哼，哼"或"喂，喂，喂"之类就是"混合的复句"。

(c)說"用或可能用""連詞或关联詞語"，这就是說：一方面，凡不可能用上这路虛字眼的就都不是复句。如：

我看見他笑。

我請他來。

另一方面，凡复句都是可以用上連詞的①：

假如他去，我一定去。

或关联詞語的：

風也住了，雨也停了。

船头坐着刘二虎，船尾坐着小張三。

或虽然不用但是可能用上的：

[假如]他去，我一定去。

風[也]住了，雨[也]停了。

(d)說"具有巨大的(或可能是巨大的)意义容量"，这就等于說复句的意义容量是比單句的意义容量是巨大的或可能是巨大的。如：

花紅。柳綠。

花紅柳綠。

显然地，下一句比上兩句中的任何一句在意义上要丰富多了。然而所謂意义的丰富，实不应仅限于字数，因为"复合句的內容，比那些在語源学上看作为它的來源的簡單句的具体意义的总和要丰富得多，因为复合句不仅是表达一定的思想判断，同时也表現它們之間發生的多种多样的关系"。②如上例"花紅柳綠"，多出來的意义，和它的來源上的任何一个分句比較，就不仅仅是兩个字的意义，由于它們的結合还产生了新的意义，如并列的关系意义、对比的修辞意义，等等，这就不是兩个單句意义的簡單加合所能具有的了。

当然，單句的意义容量，也有超过复句的。比較：

那朵花紅得人人爱看。

花紅柳綠。

前者是扩展了的單句，后者却是个沒有扩展的复句。扩展的类型只能和扩展的类型比較，不能和沒有扩展的比較。如果都用扩展的句型來比較：

那朵花紅得人人爱看。(單)

那朵花紅得人人爱看，这棵柳綠得家家喜欢。(复)

这就显然前句不如后句的意义丰富了。

复句所以能比單句的意义容量大，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为"复合句比起任何的簡單句來都可以有更多的…組織中心"，"因此，复合句就能把更多的詞按意义及語法关系联并于自己的結構之中"(烏，94頁)。如花紅，就只有兩个組織中心；而花紅柳綠就有四个組織中心。依次扩展起來，就能把更多的詞按意义和語法关系联并到自己的結構中來。例如：

那一枝剛剛开了的桃花，紅得就比剛剛出爐的火炭儿还要紅；这一棵新吐芽的倒垂柳，綠得比海里边的水还要綠一些吶！

总之，复合句是較复杂的句法單位。它"其实只有从語源学观点，即从句子發生的观点來看"才可以被視为"若干簡單句的联合或銜接"(烏，94頁)。要是从它的現实价值看，它就应当作为一个复杂的完整的句法單位來看待，不能認为还是兩个或兩个以上的語意上、語法形式上絲毫也沒有改变的單句的簡單的"湊合"。因为"复合句的組成部分，不是在較大的程度上就是在較小的程度上失去了独立的句子的最本質的屬性——即作为交际的最簡單的單位的能力"(烏，94頁)。

复句內部再分类的标准和主要类型

复句的分类标准应該以"語法·邏輯范疇"为依据。所謂"邏輯范疇"，就是說要看复句內部各分句間所存在的是什么意义上的关系，即它們是按照什么意义关系复合起來的。所謂"語法范疇"，就是說要看复句內部各分句在結合上具有哪些相同的或不相同的語法上的特征。按照这个标准，汉語复句是有类可分的。首先它們可以分成等立、主从兩大类。下边分别來說明一下：

(A)**等立复句**——在邏輯上，各分句間的关系是"等立"的，誰也不依靠誰，即誰也不修飾誰的。所以各叫"分句"，不分"主"、"从"。在語法上：

(甲)从語序上看，等立句的特点是：

1) 一般可以互易位置。比較：

風也住了，雨也停了。

雨也停了，風也住了。

2) 一般不能嵌入另一分句。比較：

風也住了，雨也停了。

風，雨也停了，也住了。(×)

(乙)从連詞上看，这类复句有一套專門为它們服务的連詞。这可約为兩点：

1) 來源上大都是副詞、名詞、代詞、数詞等活用成的。这时这些实詞就都已語法化，由句中的成分轉化成虛字眼了。看例子：

副 { 他又來了(副)
火又大，烟又盛。(連)

名 { 他站在一边。(名)
他一边說，我一边听。(連)(語法教材，865頁)

代 { 他們或者是資产阶級的子女，或者是个别的天才。(代)(教材871頁)
或者他來，或者我去，不一定。(連)

2) 組織上，有种种和邏輯上"等立关系"相适应的固定格式，如"不但…而且…""与其…不如"，等等，参加鑄造这种句型的語法形式的工作。例如：

不但人好，而且手也巧。

与其他來，不如我去。

---

① 但不能反过來說：凡存有連詞范疇的就都是复句，如："我和他都來了"。这就不能說是复句。

② 参看烏汉諾夫的《論复合句的語法形式》，見《俄語复合句論文集》，93頁。以下凡注有"烏"字的，都見此。

尤其是迭用的連詞或关联詞，更能从語法形式上突出地揭露出这类复句的邏輯上的等立关系。例如:

風也停了，雨也住了。

他一边走，我一边說。

(丙)从發生学上看，复合句形成的道路有兩条，这等立句是通过第一条道路形成的。"第一条道路的特征是:兩个或数个簡單句并合为一个复合句"(烏，93頁)。就是說，这一类复句是由兩个或兩个以上的句子拼合成的，是从外部加合进来的，是外来的联合，如下式:

| 風也住了， | + | 雨也停了。 |

还有第二条道路，請看下(B)項之(丙)。

(B)**主从复句**——邏輯上，各分句間的关系是"主从"的，即一个是主要的(在"詞組"中就是"中心詞")，就叫"主句"(正句)，其余是从屬于它，从种种邏輯关系上去限制它、說明它、为它服务的(在單句中就是"附加成分")，所以就叫"从句"(偏句)。在語法上:

(甲)从語序上看，主从句的特点是:

1) 一般不能互換位置，要是改变常序，一定另别說(如修辞上的講究，欧化的句法等等)。比較:

如果天下雨，我就不去了。

如果你要迎合我的心意，那么我們的談話就沒有什么好处。

这兩句如果說成:

我不去了，如果天下雨。

那么我們的談話就沒有什么好处，如果你要迎合我的心意。

显然地，第一句帶有倒裝、补說的口气；第二句根本就不合汉語的習慣了。

2) 一般能把从句嵌入主句中，位置倒是又活动多了。比較:

他，如果天下雨，明天就不来了。

他明天，如果天下雨，就不来了。

(乙)从連詞上看，这类复句也有一套專門为它們服务的連詞。也可約为兩点:

1) 来源上大都就是"介詞的广用"，在句法組織上，就它的功能看，已起了本質的变化，获得了新的語法意义、新的机能。例如:

介{他当天就报了名。
他每逢假日一定要来的。

連{当凉水噴到我身上，我感到特別爽快。
每逢队伍过，她就站在大門上。

2) 組織上，也有种种和邏輯上的主从关系相适应的固定格式，如"如果…那么…""就是…也…"等等，参加鑄造这种主从复句的語法形式的工作。例如:

如果他来，那么这事就好办了。

就是他來，我也不去。

作为和等立句在語法形式上不同的重要的标帜，是主从句的連詞絕不迭用。試比較下兩句:

他一边說，我一边听。

如果他来，如果我也去。(若都是从句，就轉入等立型的从句，下边另有主句了。)

(丙)从發生学上看，这类复句是通过"第二条道路"形成的。"第二条道路的特征是:复合句是由于一个簡單句的分裂而产生的。这时簡單句的一个成分不只获得了从屬句的意义，同时也获得了从屬句的結構"(烏，93頁)。这就是說，主从句，是由一个單句派生而成的，即一个大句子被分裂成兩个小句子了。派生的，原本是包孕句中的母句，这时成了主句了；被派生的，原本是子句，这时成了从句了。如下式:

| 他因为天下雨这么一点小事就不来了。 |

↓

| 因为天下雨了，所以他不来了。 |

大类旣明，細目就不难分配了。要說明的是:細目的归类，当然也是不能脫离上述的"标准"的。不过有些細目本身可能不具备合乎标准的所有特点，然而只要它具有其中任何一个特点，那就有理由把它归入該特点所应归入的类。另一方面，有些細目也可能具有不同"标准"的兩个特点，那么，把它归入主要特点的类，同时也有理由讓它作部分的交叉。①

試拟的复句类型表

依上文所定的兩个主要类型为綱，我們可以分列細目，并簡举例句②:

第一綱:**等立句型(联合結構的复句)**共分五类:

(1)并列的复句，可分兩种:

(A)平行句

对待式{他一边說，我一边听。
我是先生，你是学生。(李班長学文化)

加合式{火又盛，烟又大。(誰是最可爱的人)
你学習跑在头里，我也不甘心落后。(三千里江山)

(B)分割句

他有兩个孩子: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学生。

旁边站着很多人:有的鼓掌，有的叫好。

(2)进層的复句，可分三种:

(A)突进句

学校好，这里更好!

后面还有簽名的，而且人数很多。(保价邮包)

(B)推宕句　即(A)种的前一分句用上"推宕連詞"，加强后句語势；因此前句不能独立，似从句。更分二式:

1)兩面襯托式(前句推宕，后句突进):

他既然不說，我更不便說了。

他固然不行，你恐怕更差!

不但他不会，而且我也不会。

---

① 最突出的是"等立复句"中的"推宕句"和"讓步句"，詳下节。

② 詳可参看《中国語法教材》第六册，858頁。

不止大家都还做得不太够，連我們党內也做得不够。(三里灣)

2)前后反逼式(前句推宕，后句逼进)：

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非攻)

他都搬不动，更不說你了。

(C)轉进句

推动式：
- 水越淺水車越輕。(三里灣)
- 你愈讓他愈来了。(在其香居茶館)

互竞式：
- 我越笑，她越气；她越气，我越笑。
- 啊呀阿呀，眞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放松，便愈有錢。(故乡)

(3)选擇的复句，可分三种：

(A)商选句

叙說式：
- 或者我去，或者他来。
- 他們忽然羞澀起来——或者是我看来以为如此。(我們落手越来越重了)

疑問式：
- 还是他来，还是我去？
- 这样花好，还是那样花好？(宋老大进城)

(B)限选句 限定选擇其一，非彼即此。更分兩式：

1)交替式

不是別人請他吃飯，就是他請人吃飯。(华威先生)

2)虛拟式(插进一个虛拟的否定詞語，表示非彼即此。这否定詞語实由"假設从句"节縮而成。)

我实在沒法子，不然，我决不再找到这兒来麻煩您。(日出)

幸而車夫早有点停步，"否則"伊一定要栽个大筋斗。(一件小事)

(C)特选句

1)突出式——又分兩小組：

(甲)从中提出

青年們是敏感的，特別是搞文学的青年更加敏感。

(乙)排斥其他

三百来戶都欢天喜地，只有老王太太不乐意。(分馬)

2)举例式

他提出了很多問題，例如現代的猴子为什么就不能变成人。

个別同志的資本主义思想还很严重，象范登高和袁天成兩位老同志，就还有严重的資本主义思想。(三里灣)

(D)决选句，再分兩式：

1)先审后决式

与其我去找他，不如他到我这兒来。

2)已决对举式

宁可这会不开，我也不能讓他参加。

(4)轉折的复句，可分三种：

(A)相反句(重轉)——更分兩式：

1)对立式

他的歌声消逝了，但是歌兒还活着。(美妙的小提琴)

当鋪的門还沒有开，然而守在門外的人可已經不少。(当鋪前)

2)讓步式(即"对立式"的前一分句用上"讓步連詞"，表示承認事实，或容許理由，預示下文轉折；因此前句不能独立。又新型句法，讓步后补，幷無轉折，因此划入从句，这里只是互見一下。)

石得富虽然脚拐伤痛，但他总是走在前头。(銅牆鉄壁)

烏蓬船里的那些土財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們也不在乎看戏。(社戏)

(B)修补句(輕折)

她的回答还是不，我不知道，不过声音比以前嘶啞了。(丹娘)

这傢伙是行，就是老百姓沒注意。(拖拉机开进商家村)

(C)意外句

一般的意外：
- 我正要去找他，不料他早已走了。
- 大家好意帮助他，他反到認为是打击。

巧幸的意外：
- 那輛車不希罕，幸亏那头老牛归了他。(牛郎織女)
-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故乡)

失望的意外：
- 我很想認識認識張多年，不巧，他…学習去了。(石油城)
- 我活着，可惜石永公沒下落。(銅牆鉄壁)

(5)承接的复句，可分四种：

(A)順承句

單純承接式：
- 酒到了肚里，話就多起来。(多收了三五斗)
- 他深深地抽了一口气，接着他点了一支香烟。(病后)

事效相因式：
- 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为了忘却的紀念)
- 你来了好，省得我去找你！(小二黑結婚)

(B)类提句

圖还是我画的不錯，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記得的。(藤野先生)

他講了很多道理，另外，張先生还作了补充。

(C)解証句

1)闡解式

我們在和你們竞賽呀，这就是說，我們应該帮助你們。他說好，我說坏，总而言之，大家的意見还很不一致。

2)例証式(和前(三)类"特选句"的"举例式"所用連詞可相通，但內容关系不同；这是举例証明，那是从上文挑出事例。)

最难相处的是李三春，比方有点什么事兒，他总爱往別人身上推。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这話确实說得不錯，譬如你沒有吃过黃連，你就不知道黃連苦。

(D)推断句

推理式：
- 現在大家都紀念他，可見他的精神感人之深。(白求恩大夫)
- 他倒考上了，不用說，这当然是他的勛章帮了他的忙。

探原式：
- 这队伍可眞好，怪不得大家喜欢他們。(战斗中成長的女英雄)
- 他滿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孔乙己)
- 苏联的报紙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苏联，人民就是报紙的老板。(报紙)

第二綱：主从句型（偏正句） 就从句共分六类：

(1)时間从句，再分四种：

(A)从句表同时

逢当我問到这，他只紅着臉笑。（我的兩家房东）

天麻麻黑，战斗在馬村打响了。（这样的战士）

(B)主句在从句的前时

等人們赶到，他已經停止呼吸了。（模范团員）

水还沒有到嘴，烽火台上的箭就飞来了。（玄奘的西游）

(C)主句在从句的后时

自从共产党来了，俺才翻了身。

毛主席走了以后，工人們开了座談会。（毛主席和工人）

(D)从句表永久时

每逢队伍过，我就站在大門上。（大娘）

他又考問听众，直到他确信听众已完全懂得为止。（馬克思之为人）

(2)因果从句，再分兩种：

(A)从句表因，更分兩式：

1)一面声述

因为天下雨，他不来了。（从句在前）

周师傅应当得紅旗，因为他改造了工具。（兩面紅旗；从句在后：若語意重在追溯原因，则可屬等立（5）类"推断句"的"探原式"。）

2)兩面呼应（若从句無"表因的連詞"，即可以屬等立(5)类"順承句"的"事效相因式"。）

因为馬克思有了广博的多种知識作基础，所以他能够建筑起他的学术的高塔。（馬克思之为人）

(B)从句表果 若是个同动"是"字作謂語的"單句"，这从句就可作为"主語子句"。

他所以沒有来，因为他的父亲病了。

馬克思在学术上之所以能有惊人的空前的成就，他的博学是主要条件之一。（馬克思之为人）

(3)假設从句

要是你不想工作，你就别妨碍别人。（病后；从句在前。等立(5)类"順承句"的第一分句，可能改实叙为虛拟的，只用上个"假設連詞"，就成这种从句。）

这兒有爱格柏的工作，如果你要做的話。（最幸福的人）（从句在后。）

(4)条件从句 再分三种（都是等立（5）类"承接"的第一分句加上"条件連詞"所成。）

(A)积極条件句

表依存：
- 只要他有工夫，他就从事学問的研究。（馬克思之为人）
- "只要"列宁在，同学們就不怕教师考問。（列宁在学校里）

表經由：
- 既然我年紀比你大，你就別跟我爭啦。（劳动日）
- 既然你不回答，只好我来說了。（保尔·柯察金）

表惟独：
- 只有他来，这会才能开好。
- 惟有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才能得到保障。

(B)消極条件句

剔出式：
- 除了他們三个人不願意去，剩下的人全沒有意見。
- 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余者任憑你們采取去取利。（探春理家）

排除式：
- 除非你把大箱碰碎，我都白給修理。（駱駝祥子；）（从句在前。）
- 他怎么能得到新的寒衣呢？他沒法得到，除非自己給他做。（孟姜女）；（从句在后。）

(C)無条件句

不管她信不信，事实总是事实。（田寡妇看瓜）

随你怎样搧扇子，汗老是不得干。（雷雨）

(5)讓步从句，再分兩种：

(A)先讓后轉（从句在前）：

虽然雨下得这么大，可是他还是去了。（参照等立（4）类"相反句"的"讓步式"。）

尽管（哪怕）雨大，他还是去。

縱然（就使）下雨，他也要去。（兼假設）

(B)补提讓步（从句在后）：

她还沒到坟上去告辞，虽然他是想去的。（辽尼亞和他的祖母）

他还是参加了这次的游行，虽說他的身体很不好。

(6)比較从句——由于"比較連詞"大都就是"动詞"或"形述"，所以都可作为"單句"看待，其中主句作为"主語子句"，从句就是"足語子句"了。再分兩种：

平比句：
- 远处树木同建筑物的黑影动也不动，象怪物摆着陣势。（夜）
- 杜夫达跳了起来，好象什么东西咬了他一样。（病后）

差比句：
- 他的書法很老到，胜过宋朝的米元章。（后句謂語承前省。）
- 能輸血救活一个战士，胜过打死十个敌人。（截肢和輸血；主語都泛指省。）
- 先生出来的眉毛只这么長，不如后生的鬍鬚長得多。

（接26頁）

我所根据的主要标准是这些复合詞的構詞成分的詞义結合程度，因为这个标准比較客观。像"地位、方法、骨干、核心、观点、路綫"之类的名詞，往往要跟一定的修飾成分結合，才能共同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

这样結合起来的复合詞在語言环境里常常和另外的动詞（有时是介詞）組成动宾結構（或介宾結構）。例如：

許多同志，不注意和不善于团結积極分子組成領导核心，不注意和不善于使領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結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領导变成脫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領导。（毛澤东选集，922頁）

总起来說，我認为动詞作定語一定要帶"的"，但也不否認动詞不帶"的"就能加到名詞前边修飾名詞的事实，因为后者是構詞法的問題，不能拿来証明动詞作定語可以不帶"的"字。

关于动詞作定語帶"的"字的問題

温 永 祿

1956年10月号《語文学習》胡新同志提出了动詞作定語用不用"的"的問題。这个問題提得很好，因为它关涉到詞的組合和詞的構成的問題。当然，首先我們得分清楚，动詞的及物和不及物跟名詞的結合，中間加"的"不加"的"有很大关系。像飞、休息、失敗、进步等不及物动詞和名詞結合时，跟形容詞修飾名詞一样，加不加"的"是非常自由的，如飞鳥、失敗經驗、休息时間、进步力量等。但是及物动詞就正如胡新同志所指出的有兩种情况：有一些及物动詞非加"的"不可，如"吃的东西"、"写的文章"、"看見的人"等；有一些及物动詞則加不加"的"都可以，如"支配地位"、"处置方法"。就拿"地位"、"方法"这类詞来說，在它的前面还可以用其他的动詞来修飾它，如"斗爭方法、管理方法、經营方法、学習方法"，"領导地位，統治地位"等。中間都不一定加"的"。和这相类似的并不限于这兩个詞，还有像：

研究　宣傳　教育　恢复　勘探　檢查 }
鼓动　組織　建設　視察　管理　調查 } 工作

侵略　分配 }
利用　扩張 } 政策
限制　贖买 }

运輸　教育 }
生产　宣傳 } 工具
斗爭　侵略 }

改良　解放 }
革新 } 运动

监督　凝結 }
領导　推动 } 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像出租汽車、統治权力、收購价格、侵略陰謀、建設規模、侵略行为、武裝部队、学習态度…，中間都可以不加"的"。这是什么道理呢？正如胡新同志所提出的，为什么同是动詞作定語（严格說来是及物动詞作定語），有的非用"的"不可，有的可用可不用呢？它們之間的規律是怎样的呢？如果我們仔細地分析一下，就会發現，这种动詞作定語可分为兩种类型。比方拿"工作"为例，教育工作、鼓动工作、勘探工作是一类，而恢复工作、檢查工作又是一类。我們不难發現前一类是不能發生动宾关系的。因为工作是不能教育的，工作也不能鼓动，工作也不能勘探的。因此这个詞組里的动詞就决不能和名詞發生动宾关系，而只能發生修飾关系。这样就和一般的主从詞組沒有区別了。大家都不会否認，現代汉語里的主从詞組用不用"的"是非常自由的，像社会改革、重大步驟、思想問題、中心任务等都是。第二类則不同，"工作"可以和前面修飾的动詞發生动宾关系，因为工作是可以恢复，也可以檢查的。所以第二类的詞組就具有修飾和动宾兩种結構关系。問題在于为什么第二类型的詞組具有兩重性而可以不加"的"呢？在这里，我們必須从考察作定語用的动詞着手。就拿"研究、恢复、檢查"为例子，我們同样可以發現，这种动詞在詞組里和在句子里都是具有兩重性的。这种动詞在句子里一方面可以作謂語用，如"我們研究問題"，"我們恢复了經济"，另一方面又可以作主語宾語用，比如"科学研究是值得鼓励的"，"国民經济的恢复为实現有計划的經济建設鋪平了道路"。但是，作定語用必須加"的"的另一些动詞就不具有这种兩重性，如"看見、吃、穿"，当然可以作謂語，但不能作主語和宾語，决不能說，这种吃是…，也不能說这种看見是…。所以我們可以說，因为这种动詞在詞組里具有兩重性，它在句子里也具有兩重性。但是，我們不能反过来說，因为句子里具有兩重性（可以作主語宾語或謂語），在詞組里也具有兩重性。这种反論証是不够确切的。因为有一部分动詞虽然在句子里有兩重性，比如，"侵犯"，可以作宾語和謂語，如"他就不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但是它不能作定語用，所以在詞組里就不具有兩重性，因而也就不存在加"的"或不加"的"的問題。从这里說明句子的結構規律和詞組的構造規律有其共同性，但也有其分歧性。而它們之間的共同性是主要的，这就是句法应該包括詞組的道理；分歧性是次要的，这也表明句子結構和詞組結構不是一个东西，不能混为一談。

我們从另一方面来考察也可以看出，凡是作主語的詞都是表达事物概念的（包括抽象的和具体的），同时从詞法的角度来看，作主語的絕大部分是名詞和代詞或者是名詞性的詞組。我認为动詞和形容詞作主語都具有名詞性，都是表达事物的某一概念，同时在句法上具有名詞的功能。既然如此，这类动詞和名詞一样来作定語用就不奇怪了（当然也不能說，已經轉化为名詞，这是另一个問題）。

上面談的都是四个音节的詞組。兩个音节的或者三个音节的詞組是不是也具有上面所說的那些規律呢，那就不一定了。我們可以这样說，凡是三个音节或兩个音节的詞組都必須加"的"，这里有几种情形：

1）双音动詞作定語修飾單音名詞：同情的人，支持的人。2)單音动詞作定語修飾双音名詞：穿的衣裳，吃的稀飯。3)單音动詞作定語修飾單音名詞：做的事，拿的水。

在这里还应該談到詞和詞組的区別。因为可能有人拿"辯护人、指揮員"等三音节的詞来反对我們。其实，这些都是由詞組变来的詞。所以，也就不存在加不加"的"的問題（关于由詞組变为詞的問題，張世祿先生談的很好，請参考《語文知識》1956年2月号16頁）。我們可以說"辯护人、指揮員"都是經过凝結作用和縮减作用而来的。

辯护人：替他辯护的人→辯护的人→辯护人

指揮員：指揮的人員→指揮人員→指揮員

当然我們不能說，詞組的凝結和縮减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像这一类的詞还是很多的，如"解放日、招待会、收割机、偵察兵、参观团、研究班、宣傳部"等都是。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們对于动詞作定語时加不加"的"的現象归納成以下几条規律：

1）四个音节的詞組里，作定語的动詞和名詞結合时，不發生动宾关系，而只能發生修飾关系，可以不加"的"，如侵略战爭、建設計划等。

2）在四个音节的詞組里，作定語的动詞和名詞結合时，能發生动宾关系和修飾关系的，在句子里一定具有兩重性（即可以作主語宾語或作謂語），这种詞組也可以不加"的"，比如学習經驗、研究工作等。

3）三个音节或二个音节的詞組里，动詞作定語时一定要加"的"。

以上談到的只是我的膚淺的認識，其中一定有錯誤，請讀者和專家們指正。

动詞作定語要帶“的”字

邢福义

胡新同志曾在《語文学習》1956年10月号上發表《动詞作定語，用不用“的”？》一文，其中举出下列兩例来說明动詞做定語不一定要用“的”：

取得支配地位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随着起变化。（毛澤东选集311頁）

对于錢的处置方法，他可不敢冒兒咕咚就跟着她的主意走。（老舍：駱駝祥子）

胡新同志認为：“这兩句中的‘支配’和‘处置’都是动詞，分別作名詞‘地位’和‘方法’的定語，可是后头却沒有‘的’。我們念下来也决不会把‘地位’和‘方法’当成宾語。”

我認为动詞作定語一定要用“的”，动詞要是不帶“的”而直接加到名詞前边，那就不是定語，而是修飾关系，它只能是一个复合詞中的構詞成分；換句話說，凡是“动詞（不帶“的”以及其他成分）＋名詞”而沒有形成动宾关系的，都是修飾关系的复合詞，具体些說，是修飾关系的复合名詞。

但是，这并不等于說凡“动詞（不帶‘的’以及其他成分）＋名詞”的复合名詞都是修飾关系的，如“屏風、司令、司机、枕头、主席、裹腿”就不是。它們是动宾关系的复合名詞。至于动宾关系的复合动詞，象“动員”，数量更多。那末，为什么“动詞＋名詞”的复合詞有修飾关系的也有动宾关系的呢？“动詞＋名詞”产生动宾关系，道理淺显，这里不談。我們所要談的是“动詞＋名詞”也能产生修飾关系的原因。現在讓我們把所找到的語言材料加以分类，逐类观察，找出規律，并且辨別一下“动詞＋名詞”的結構到底是詞組还是詞。

第一类：（a）流水、飞鳥（机）、睡獅（眼）、逃兵、活人、死尸（狗、老虎、路）、漏洞、旋風、游泳池、不倒翁、外来詞、劳动人民、覚悟程度，等等。（b）臥車、算盤、渡船、冲鋒槍，等等。

很明显，这些詞中的动詞都是自动詞。曹伯韓先生說过：“当詞序是‘动＋名’的时候，如果动詞是及动物詞（按即他动詞），它后边的名詞就会是它的宾語，如‘吃飯’、‘讀書’之类；如果动詞是不及动物詞（按即自动詞），它和它后面的名詞就会形成修飾語和被修飾語的关系，象‘飞鳥’、‘来人’之类。”①曹先生这段話的前半段可以商榷，因为他动詞（即曹先生的及物动詞）＋名詞不一定形成动宾关系；但后半段却說得很确切，自动詞＋名詞有时也因有特殊的情形而沒有形成修飾关系的。这一点曹伯韓先生也講得很明白。他接着上面那段話說：“后一种也有特殊的情形，如‘凳子可以坐人’，‘今日公共体育場跑馬’，‘不及物动詞＋名詞’并沒有形成修飾被修飾的关系，而形成了动宾关系。这仍然是有規律的，因为在这里，不及物动詞轉成了使成式的及物动詞了，‘坐人’等于‘供人坐’，‘跑馬’等于‘使馬跑’。”②

从用途上看，这些动詞不是表示后头名詞的性質，如（a）；就是表示后头名詞的用途，如（b）。

再来看看第一类的語言成分到底是不是“詞”。它們有兩个音节的，也有三个音节的，也有四个音节的。不必說，兩个音节的是詞，这是大家肯定了的。張志公先生說：“动詞修飾名詞时，往往含有‘了的’或‘着的’的意思，如‘活人’意思相当于‘活着的人’，‘死狗’意思相当于‘死了的狗’。这些虽然是一个詞修飾另一个詞，但兩个詞結合得很紧，性質上屬于复詞。”③三个音节的，是詞，也是大家肯定了的。如陆宗达、俞敏先生就这样說过：“主从式的复合名詞是这么造的：先拿一个名詞来当主要成分，再望前头加一个別的詞，縮小他的意义范圍。比方‘槍’可以包括步槍，…也包括馬槍，卡宾槍，冲鋒槍…”④，“游泳池、不倒翁、外来詞”等都和“冲鋒槍”一样，由主要成分“池、翁、詞”等造出来，表示一件事物的，所以它們都是复合名詞，無可非議。根据这一說法，四个音节的“劳动人民、覚悟程度”等也是詞，無可非議。因为它們都和“冲鋒槍、游泳池”等一样，用同样的方式構成的，而且在作用上也是表示一种事物的。如果否定它們是詞，也得否定“冲鋒槍”等是詞。因此，我們可以做出这样的結論，凡能表示后头名詞的性質和用途的自动詞，可以直接和后头的名詞相結合，成为修飾关系的复合名詞，不产生动宾关系。

第二类：（a）爱人、开水、牧童、插圖、敗將…。（b）斗爭会、訪問团、介紹信、收割机、計算尺、研究院、負責人、領导人、解放軍…。（c）支配地位、处置方法、領导骨干、領导核心、供給問題、調查綱目、考試題目、指导工作、發展路綫…。

（a）項的“牧童”是修飾关系，因为“牧”不能支配“童”，跟动宾关系的“牧羊”不同。（b）項的“斗爭会”是修飾关系，因为“斗爭”不能支配“会”，不能同“斗爭地主”一样看待。“發展”也一样，“發展农業生产”是动宾关系，“發展路綫”都是修飾关系，因为“發展”不能支配“路綫”。諸如此类，一句話归总：凡他动詞和名詞構成的复合詞，成因都是如此。

那末，第二类列举的語言成分到底是不是詞呢？我看兩个音节的，不消說是詞。三个音节的，我想也不会有人否認它們是詞。前面引証过的陆宗达、俞敏先生的一段話，既然証明了“冲鋒槍”“游泳池”等是复合詞；那末，“斗爭会、研究院、負責人”等等，除了其中的动詞是他动詞之外，和“冲鋒槍、游泳池”等沒有絲毫差异，所以也得承認是复合詞。

四个音节的（包括第一类中的“劳动人民、覚悟程度”等）跟三音节的構成方式一样，作用也一样，既承認三音节的是詞，也要承認四音节的是詞，否則兩者都不能承認。有些人往往因为音节多了，就宁可自相矛盾而不敢承認它們是复合詞，这是錯誤的。只要兩个成分結合得很紧，共同表达一种事物、一个概念，就可以算是复合詞。当然我也不想光憑音节多少这一标准来說明“覚悟程度、支配地位”之类是复合詞。

（下轉24頁）

①② 曹伯韓：《汉語的詞类分別問題》，見《汉語的詞类問題》，125頁。

③ 張志公：《汉語語法常識》，27頁。

④ 陆宗达、俞敏《現代汉語語法》上册，66頁。

赣榆方言的人称代詞

蔣希文

赣榆在江苏省东北角，方言和山东省膠东一帶相近。赣榆話語法和北京話差不多，但是也有些現象和北京話不尽相同。这里只談談赣榆話的人称代詞，凡是同北京話出入不太大的我們就說得簡單些。

赣榆方言人称代詞共有六个：

“我”說話音是[ᶜuo]上声，調值 214。讀書音是[ᶜɤ]。

“你”[ᶜni]。

“他”[꜀t‘a]，陰平，調值 55。

“俺”[ᶜan]。

“□”[ᶜn̩]。

“他們”[꜀t‘am]不讀[t‘a mən]。

以下分别来說。

(一) 我、你、他

“我”表示單数第一身。“你”表示單数第二身。“他”表示單数第三身。

“我”、“你”、“他”可以用作主語、宾語，不必举例。“我”、“你”、“他”表示領有关系，有兩种情况，看后头的成分而定。

甲、代詞后头的成分不是亲屬称謂的，一定要用“的”字。例如：

我的書

你的朋友

他的衣裳

乙、代詞后头的成分是亲屬称謂的，平常不用“的”字。例如：

我哥哥①

你大兄弟

他嫂子

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用“的”字。例如，在死了人的时候可以这样的哭：

我的媽媽呀！

在疑問句里：

他是你的哥哥嗎？

在加重語气里：

是他的老婆，不是他的姐姐。

(二) 俺

俺也表示第一身單数，不过意思和“我”不同。平鋪直叙用“我”，“俺”帶有一种感情成分。比方說：

一、你打俺俺也不还手，你駡俺俺也不張口。

二、你打我我也不还手，你駡我我也不張口。

三、昨天敎俺白跑了一天，今天又敎俺白跑一天，

四、昨天敎我白跑了一天，今天又敎我白跑一天。

在赣榆方言里，例句一、三和例句二、四是有区别的。例句二、四用我，只是一般的叙述句。一、三用俺，除了叙述某种事实外，还帶有一种感情成分——在这里是表示委屈。

“俺”作主語、宾語的时候，要在后头加上“这些人”才能表示多数。例如：

俺这些人都是他請来的。

他畀（相当于北京話的“把”）俺这些人看成是些什么人。

“俺”用来表示領有关系，后头是亲屬称謂的，中間不用“的”字。例如：

俺三叔說的。

俺哥哥給你的。

俺侄买的。

在这里沒有單数多数的区别。“俺三叔”可以是“我的三叔”。也可以是“我們的三叔”，除了知識分子，一般人只說“俺三叔”等，不說“我三叔”等。

“俺”后头的成分不屬于亲屬称謂的，表示單数时常常有一种感情成分，表示复数时可不一定帶这种感情成分了。例如：

这是俺的家。

这是俺的东西。

这里的“俺的家”可以是“我的家”，語气里表示一种亲密意味。也可以是“我們的家”，这就不一定具有上述的那种亲密的意味了。

(三) ᶜn̩

ᶜn̩ 用来表示單数第二身的敬称，相当于北京話的“您”。例如：

ᶜn̩ 年紀多大啦？

ᶜn̩ 老人家还爽利呀？

ᶜn̩ 也可以用来表第二身的多数，不过表示多数就沒有客气的意味。例如：

ᶜn̩ 都是来做什么的？

ᶜn̩ 都去，我可不去。

ᶜn̩ 表示領有关系的，同“俺”的情形一样，后头的成分如果屬于亲屬称謂的，一般的都不用“的”。例如：

ᶜn̩ 大嫂子說的。

ᶜn̩ 大娘拿来的。

这里的 ᶜn̩ 可以是單数也可以是多数。在純粹的口語里一般都不能用“你”。如果“ᶜn̩”后头的成分不屬于亲

(下轉 19 頁)

---

① “我”、“你”后头帶亲屬称謂的名詞，一般地限于知識分子。純粹口語里用“俺”和 ᶜn̩。詳下文。

关于結構主义的几点意見

M.И.斯鉄布林-卡勉斯基

为了弄清楚結構主义是什么，我認为首先应該摆脫那种过去長期存在于我們語言学中的風气，那就是时常把語言学的派别看作是一个哲学体系。例如，人們常說，結構主义把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割裂开来了”（把断代和历代，把語音和意义，把語音学和音位学，把形态学和句法等，割裂开来了），因此結構主义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而那些攻击結構主义的人却因之（咳，时常只是因为攻击了結構主义这一点！）成了“辯証法家”和“唯物主义者”。显而易見，可以对任何一个語言学家进行这样的攻击，并且更可以对任何一个数学家进行这样的攻击，因为整个数学都是以“脫离”物質为其基础的。

我想，首先应該承認：結構主义是語言学中的一个派别，而不是哲学体系，因而对結構主义的估价必須以这个派别在語言科学發展上所起的作用为依据。即使結構主义的某一个代表从純哲学方面發表意見，这也不能規定該派别在科学發展上的作用，正如沙赫瑪托夫或别施柯夫斯基（Пешковский）的哲学观点及声名狼藉的“唯心主义”并不能規定这些科学家在研究俄罗斯和苏維埃科学中的句法問題上所起的作用一样。

同时，为了弄清楚这个学术派别的本質，我認为必須力求找出那种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該派别的所有支派以及它的所有代表所特有的东西。不应該像直到如今所常做出的事那样，胡乱摘引某一派别的一个代表的話或某一派别的一种表現，并把它們当作整个派别的本質。例如，显然不能認为叶尔姆斯列夫〔現代的語言学理論家之中的一个極端派〕的一些說法就是結構主义的本質，同时也不能把那种濫用术語的傾向認为是結構主义的本質——这种濫用术語的傾向是任何科学在摸索方法阶段的通病，这种傾向在术語这样未加整理的語言科学中显得更为自然。

根据以上所說的可以看出：結構主义絕不是一个完整無缺的观点系統。其实如果試着把自命为結構主义者的語言学家的观念中所固有的那些基本的东西分立出来，那么很清楚地可以看到，結構主义是語言学領域中近三十年来的一些初步的方法学的探索，并且所有这些方法学的探索都是从同一些非常一般的和基本的原則出發的，这些原則就是：第一，語言是一个系統，应該作为一个系統来研究；第二，語言系統的研究在語言存在的一定时期內不应以語言历史的研究替代；第三，語言研究的对象必須是語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在我們今天，未必能找到这样一位語言学家，他眞的可以辯駁这些原則之中的某一个。过去几十年里，在我們苏联不止一次地出現过一些論文，它們的标題上就肯定了語言是一个系統。“系統”这个詞时常在我們語言学家的著作中几乎变成为一个沒有詞彙意义的詞，这不是偶然的。“在俄語中”，“在德語的名詞中”等一类型的說法几乎成了不可能的（太直綫的）說法，“在俄語的系統中”（或者为了多样化說成“在俄語的結構中”）和“在德語的名詞系統中”等一类的說法成了必須要用的說法。当然，我国的語言学家誰也不再反駁，語言史和語言的断代描写——这是兩回事兒。我們这里出現了一些原則上屬于純描写性的語法，并且甚至提出了这类語法編写方法的問題，这不是偶然的。誰也不再反駁，語言学的对象必須是語言。要知道向馬尔主义的遺产进行斗爭，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确認必須把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所謂“內部規律”）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对象。

但是承認这些基本原則还不是結構主义。結構主义起源于那些地方，即在这些地方，这些原則不是宣言式的，而是成为方法学探索的基础，并且从这些原則中可以做出一些結論。由此可見，为了給結構主义作一个詳尽的描述，应該把近三十年来語言学領域中所出現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学探索描述一下。在杂志的文章中做这样一项工作当然是不可能的。要知道，結構主义——既是布拉格学派的音位学，又是索緒耳的許多直接学生的作品，既是叶尔姆斯列夫的語言單位論（глоссематика），又是那种具有許多支派的美国的描写語言学。

如众所知，上述的基本原則，以及某些和它們联系着的或由它們产生出来的原則，例如語言（язык）和言語（речь）的对立，索緒耳就已極其机智地在其«普通語言学教程»一書中提出来过。正是由于索緒耳的說法，这些基本原則才成为語言学中一切新的方法学探索的必要的基础。因此，可以毫不夸大地說，从索緒耳对語言学發展的影响上看，恐怕語言学史上沒有一个学者可以和他相比。很遺憾，至今我們这里还有些人与其說是对索緒耳在語言研究方法的發展上所起的作用感兴趣，倒不如說对他把什么和什么“割裂”开来了（例如把語言和言語，把历代和断代等割裂开来了；到了1950年，我們这里又有人說，索緒耳把語言的上層建筑和它的物質基础“割裂开来了”），对他是一个“形而上学者”和“唯心主义者”感兴趣。

新方法探索的理論基础在語言的語音方面最为明显。全部現代的音位学極显著地以音位系統的概念或

以音位是系統中的成分的概念为其出發点。布拉格学派活动的时期是音位学史上的最光輝的一頁。布拉格結構主义者——特魯別茨可伊及其同事（关于他們的活动，我們这里已經很久沒提了）的功績在于：由于他們的工作，音位系統的概念及音位是系統中的成分的概念才流行于世界科学中，并为千百个科学家利用在全世界各种語言的語音方面的具体研究上。正是在音位学的領域中，那种完全脫离結構主义原則的分析从实質上講已經是根本不可能的了。然而下面这一点，是十分自然的，尽管特魯別茨可伊在其«音位学原理»一書中提供了一种經过深思熟虑的有关分析語音方面的方法論，但不論是他或是整个的布拉格音位学，都沒有在这方面得到最后結論。音位学中的很多問題（其中包括音位学分析的标准本身）仍然是爭論的对象，当代的音位学理論家之間存在着很多重大的分歧意見。

索緒耳把历代性和断代性对立起来，这無疑地对音位学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一点，世界各种語言的音位系統的純断代研究才成为現实的。然而，人們时常忘記，結構主义的运动从它一开始發生起就对索緒耳的自相矛盾作了重要的修正。索緒耳否定历代变化的系統性并只在断代性中去找系統，可是結構主义者在他們的第一个宣言（这是他們1928年在海牙召开的第一屆国际語言学会議上發表的宣言）中即已指出必須承認历代变化的系統性。結構主义对索緒耳的这种修正实質上只是从索緒耳本人認为語言是一个系統的那种观念中得到的結論。他所以沒有得出这样的結論，有其历史原因：索緒耳时所进行的那种历代研究（我指的是新兴語法学家的那些历史的語音研究，这些研究的特点是把語音变化分散为無数互不相联系的行为）曾是对历代变化的系統性的一种眞正直接的和完全的否定。結構主义历史語音学的原則，或“历代音位学”的原則，是后来在雅柯勃逊（R. Jakobson）、馬尔提納（A. Martinet）、奥德利庫尔（A. Haudricourt）及其他一些語言学家的著作中制定出来的，并曾应用在一系列的具体著作中。①或許可以說，新的研究方法在其他任何一个語言学領域中都沒有像在“历代音位学”中这样富有成效。

“历代音位学”的基本原理（即承認历代变化的系統性）后来也在我国的科学中出現了。②然而，遺憾的是，几乎在具体的研究中沒有人敢于应用这条結構主义的原則，加上老式的历史語音学显然过了时，因此，語音变化的研究在我們这里成了一个最不受人欢迎的、最落后的語言学部門。例如，据我所知，最近十年来日尔曼語方面答辯过的一百篇学位論文当中只有一篇是講語音变化的。③

必須把那些不是語言（即不是系統）的东西从語言学中排除出去——这种信念無疑地也在音位学發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要知道，結構主义者所特有的那种把音位学（作为音位系統的科学）和語音学（作为語音的科学）分开的要求，正是由这种信念規定的。但是，这种要求同时的确也是那种使音位学居于語音学之上的要求，因此，它不能不导致那种地步，語音学被音位学吞并或者是溶化在它里面，并且事实上仍然成不了兩門科学。

結構主义那些語音分析方法的有效制定促进了一門新学問，即形态音位学（морфонология）的产生，在这門新学問里，音位学的材料是用来作形态学分析；这一点可以說明为什么有人曾企圖把音位学的方法用在形态学中。如果語言的語音方面可以归納为一个具有不多的成分、或多或少是比較整齐的系統，并正因为如此可加以精确的分析，那么能不能認为在語言內容方面，特别是在語法意义方面也有与此类似的結構呢？曾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例如，在結構主义哥本哈根学派的領导人叶尔姆斯列夫的那些既非常抽象又术語艰深的著作中，主要內容或許也是这个基本原理：語言“表現”的結構与語言“內容”的結構是平行的，这兩种結構中都有那个形成为一个系統的形式标志方面，这一形式标志方面也应該作为語言学的对象。

但是，很有意味的是：叶尔姆斯列夫只限于作出一些很巧妙的、但純臆测性的公式，沒有企圖把自己的理論应用在具体的研究上（如果不算上他那关于格的范疇的著作，关于这一点，見下面）；至于叶尔姆斯列夫的繼承人所作的那些不多的具体研究的試驗，那除了术語的玩弄以外，很难在这些著作中找到什么方法論上的新东西。④因此，所以反駁叶尔姆斯列夫的理論，不是因为这个理論把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割裂开来了”，而是因为它对具体研究沒有帮助。

---

① 見 Jakobson «历史音位学原理» (Prinzipien der historischen Phonologie)，«布拉格語言学派学报»，1931年第4期，247頁；A. Martinet «对比关系在历代音位学中的作用»，«布拉格語言学派学报»，1939年第8期，273頁；A. G. Haudricourt «历史音位学中的几項原則» (Quelques principes de phonologie historique)，«布拉格語言学派学报»，1939年第8期，270頁；A. G. Juilland «历代音位学的書目» (A bibliography of diachronic phonemics)，«Word» 杂志，1953年9卷2期，198頁；A. Martinet «語音变化的經济» (Economie des changements phonétique)，Berne，1955年。

② 例如見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古英語»，1955年莫斯科出版，第5頁及以下几頁。（这里虽然把那种与索緒耳的辯論說成了与結構主义的辯論，但实际上是从結構主义的立場来进行辯論的。）

③ 見 Я. Б. Крупаткин «西日尔曼支語言中 ai, au 兩个二合音的紧縮»（副博士論文），1955年印。

④ 例如見 L. Flydal, «En Språklig analyse av norske boktitler», Bergen, 1954年。

在語法方面，对語言結構的这种理解引起人們去探寻語法形式的"一般"意义的系統。①但是，尽管某些探索是很机智的，整个来說，它們的特点是：多少有些武断地把事实塞进先天的公式中。在語法意义方面显然得不出类似音位系統的那种系統。語言內容的結構在一切情况下都比語言表現的結構复杂，甚至复杂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只可以用强力胜于事实这一点来証明这兩种結構之間的平行現象。

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把数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在語法学中的問題。如果語法構造是一个系統，又如果数学是研究系統理論的，那么自然可以假設：数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在語法中适用，并且自然对于把語法变成一种依靠数学計算或精密科学的学問的那种作法只可以表示欢迎。但是一切問題在于：数学所研究的系統是不是語言(特別是它的語法構造)这样的系統，数学是否适用于語言这样的系統？总之，想在語法中应用数学方法的企圖通常伴随着这样一些附加条件或修正，如什么东西不受数学控制，又如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結論：旣然原則上可以在語法中使用数学方法，那么，目前实踐上还沒提供什么东西，这只是暫时的。②

徹底划淸历代和断代的界限問題对于結構主义的語法来說，始終是一个重要的問題。这个問題几乎成了美国結構主义或所謂"描写語言学"的一个中心問題。"描写語言学"是在研究了大量美洲語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語言只易于作断代描写(因为这些語言过去的發展阶段沒有文献記載)，不好用旧方法描写。描写派力求摆脫旧方法，建立新的、足以保証更徹底和完整地描写語言的方法。描写派所以这样做，有这样一个原因：在上述的方法中时常有某种历代观点的回响。例如，当人們講到"某一个形式由某一个原始形式通过某一过程得来"的时候，这似乎意味着一种由原始物向派生物的發展。

为了避免这一点，描写派建議，把英語 took (按傳統的描写是：动詞 take 的过去时，通过內部屈折構成的)这一形式分析为詞素 take 的变体＋詞素-ed 的零变体，或詞素-ed 的变体＋詞素 take 的零变体，或詞素 take 的遮断变体＋詞素-ed 的中綴变体，或为詞素 take 及詞素-ed 的联合表現，等等。③当然可以对上述每一种分析方法提出一些反駁(例如，可以指出，在 took 这一形式中显然沒有兩个連貫的、有意义的成分，或可以指出，意义的成分在它里面显然沒有綫式地分开，等等)。但是，这里列举这些分析法不是为了駁斥它們。問題在于，描写派所制定的这些方法絕沒有組成一个完整的和完善的东西。提出很多解决問題的办法正是結構主义者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可以由上面列举的分析法中得到証明。描写派制定的那些方法之中，什么东西可以在具体研究中証明自己有效呢？目前还不明确。但是，下面一点是無可辯駁地可以肯定的：在制定这些新方法的过程中，旧的断代描写法的不徹底性和局限性越来越变得明显。

要求把一切不是語言的东西(由于語言是一个系統，因此或者可以說，把一切不包括在語言这个系統之內的东西)从語法中排除出去，这一点在結構主义語法学中曾起过而且繼續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从基本精神上講完全合理的要求首先扩展到了广义的意义上。要知道，正是借助于詞或語法形式的意义，意識的全部內容及反映在意識中的現象才判明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包括在語言中，并从而使語言学应該研究的那个对象的界綫变得非常模糊。

要求把意义从語法分析中排除出去，这是美国描写-分配派人士 (дескриптивист-дистрибуционалист) 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們主張把語言的語法成分的描写归結于描写这些語法成分如何在言語中分配。通常人們把这种要求(这种要求也曾出現在布龙菲尔德的著作中④)看作是行为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反映，并且从这个角度上对它加以批判。但是，我認为，这个要求具有非常深的、索緒耳派的根源。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叶尔姆斯列夫也提出了类似的原理⑤，而另一方面，美国現代的描写派正是批判布龙菲尔德的行为主义。⑥但是，对于語言学来說，重要的問題当然不在于这种要求的理論根源是什么，而在于人們能否在自己具体的研究中眞的使这种要求得到满足。分配派人士著作中那种排除意义的企圖是虚幻的：虽然他們

---

① 例如見 L. Hjelmslev «格的范疇»(La catégorie des cas)，«普通語法的研究» (Étude de grammaire générale) «Acta jutlandica»，1935 年 7 卷 1 期和 1937 年 9 卷 2 期；R. Jakobson «談談一般的格的研究» (Beitrag zur allgemeinen Kasuslehre)，«俄語格的全部意义»，«布拉格語言学派学报»，1935 年第 6 期，240 頁；V. Brøndal «前置詞的理論» (Præpositionernes teori)；«純理語义学入門»，(Indledning til en rationel betydningslære)，哥本哈根，1940 年。

② 例如見 Z. S. Harris 的論文«从音位到詞素»(From phoneme to morpheme)，«Language» 杂志 31 卷 2 期，1955 年。在这篇文章中原則上提出了分析詞素的数学方法，这个方法的根据是：詞素之間的界綫通常与該位置上的可能音位的最大量相符合。

③ 見 Ch. Hockett «兩个語法描写的模型» (Two models of grammatical description)，«Word» 杂志，10 卷 2—3 期，1954 年。

④ 例如見 L. Bloomfield «語言或意念»，«Language» 杂志，12 卷 2 期，1936 年。

⑤ 例如見 L. Hjelmslev «語言理論导論»，(Omkring sprogteoriens grundlæggelse)，哥本哈根，1943 年，71 頁。

⑥ 見 R. Wells «意义和用法»，«Word» 杂志，10 卷 2—3 期，1954 年。

沒有公开地利用意义的标准，但經常以隐蔽的形式应用着这种标准。①

由此可見，最近三十年語言研究的新方法的探索并沒有导致产生某种完善的、众所公認的观点系統。在語言的某些方面的分析上，首先在語言的語音方面的分析上，他們提供了無可爭辯的肯定的結果；在語言的其他方面的分析上，看来这样的結果还沒有得到。但是，甚至在这些探索沒有得到無可爭辯的肯定的結果时，对于語言学發展来說，这些探索也有它們的意义：它們迫使人們批判地重新审定那些旧的教条，促使人們意識到語言研究的旧方法不是完善的。因此，如果《語言学問題》杂志开展的这个关于結構主义問題的討論將致使結構主义之中的一派或与結構主义的一定关系被宣布为教条，那將是極可悲的事。教条主义很長时間以来是阻碍我国語言学向前發展的主要原因，教条主义在1950年的語言学討論之后更加猖獗了，这时在理論方面，闡明或举例說明某一教条的著作成了基本的風格，同时并形成了理論著作的一种特殊的風格，即"任务"的風格，这种風格的著作是这样的：按照主管机关的通告次序对某一些問題加以好意地鼓励，并对另一些問題作一些無根据的譴責，然后提出一个学生用的推荐題目表。显然，我們需要的不是讓这种教条主义的猖獗再复活。我們需要創造性地研究語言分析法。

（刘湧泉譯自《語言学問題》1957年第1期）

---

① 見 H. Frei 的論文《区分的标准》(Critères de délimitation)，《Word》杂志，10卷2—3期，1954年。这篇文章用这种观点对分配派人士进行了尖銳的批判。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派出工作組了解各省市方言普查工作

从1957年3月到7月，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先后派出三个工作組，了解各省、市方言普查工作情况。

第一組二人，3月23日出發，到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八省一市，6月8日回所。詳情請看本刊6月号《华北华东华中十省方言普查工作現况》。

第二組二人，6月16日出發，到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7月6日回所。这三省的方言普查工作今年可以完成。

第三組二人，6月16日出發，到陝西、甘肃、四川三省，7月20日回所。这三省的教育厅都調用了不在高等学校工作的普通話語音研究班畢業学員，支援高等学校的方言普查工作。陝西調用6人，甘肃、四川各調用4人。这三省的方言普查工作今年也可以如期完成。（吳芬）

湖北省方言普查工作近况

湖北省教育厅于1957年5月16日召开了第三次方言調查指导組会議。出席会議的有武汉大学、华中师院、武汉师專等校有关專業的教师和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的工作人員。

会上，各校反映了些情况，討論了有关的具体問題，最后通过了几項决議。决議的要点是：1)方言調查組改变成四个：武汉大学調查組、华中师院調查組、武汉师專調查組、北京普通話語音研究班学員組（包括湖北师專兩位教师及普通話推广处五位同志）。2)在原有基础上重新分配調查点：武大組担任20点；华中师院組担任12点；武汉师專組担任8点；学員組担任20点（余下14点由暑期研究班学員分担）。3)本年暑假由教育厅开办湖北省普通話語音研究班，調派部分县区教师参加学習，使能担任方言調查和推广普通話的工作。学習时間45天。学習科目有語音学、方言調查方法、北京語音。4)各校重新拟訂計划，提出具体作法及步驟，以便定期檢查工作。5)訂本年9月、11月由各校向教育厅彙报工作并总結全年工作。

这次会議对湖北省的方言普查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預計本省的普查任务年內可以全部完成。（李仲英）

陝西省方言普查工作近况

陝西省汉語方言調查指导組最近召开了第四次会議，檢查了有关單位的方言普查工作进展情况。

陝西省的方言普查工作由省教育厅、西北大学、陝西师院和西安师院四个單位負責。省教育厅負責西安、城固、銅川等十二个点，西北大学負責渭南、汉中、志丹等三十八个点，西安师院負責宝鷄、安康、榆林等四十个点，陝西师院負責咸陽、丹凰、藍田等十个点。目前，省教育厅已完成了西安、临潼、延安等七个点的調查工作。陝西师院已在部分点开始記音工作，西北大学計划暑假前完成汉中市等五个点的調查工作。全省方言調查工作將于本年底完成。

为了更好地完成本省汉語方言普查工作，西北大学本学期增設了"汉語方言"一門新課。講授內容主要为北京語音、語音学、汉語音韵、方言調查方法等。西安师院中文系成立了"方言調查研究班"，摘要講授有关方言調查的基本知識，帮助教师掌握实际調查与整理材料的方法。陝西师院汉語教研組也組織教师研究了有关方言調查的知識，这些都为全面开展方言調查工作打好了基础。（李平、陈鈞）

反义詞及其在構詞上和修辞上的作用

張拱貴

一　什么叫做反义詞

語言中含有对立意义的詞叫做反义詞。例如:

1) 虛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我們应当記住这个眞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詞》）

2) ……自由民与奴隶，貴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行东与帮工，簡言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終是处于互相对抗的地位，进行着不断的，有时是隐藏，有时是公开的斗爭。（《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10月上海版，32—33頁）

3) 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疇是：存在和意識、物質、运动、空間、时間、質和量、一般和特殊、本質和現象、內容和形式、內部的东西和外部的东西、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現实、原因和結果、相互作用、矛盾、現象和法則，以及辯証邏輯、辯証唯物主义認識論的其他許多范疇。（《唯物論辯証法的范疇和对这些范疇的研究》，見《学習譯叢》1954年11月号，113頁）

上面句子里加黑点的都是反义詞。現实中存在着概念的对立、矛盾、对比現象，語言里的反义詞正是代表現实中这些对立現象的。所謂反义詞，从邏輯来看，就是兩个概念之間存在着一种不調和的关系。例如"热爱和平，反对战爭"。"不能等待和平，必須去爭取和平"。"热爱"和"反对"，"和平"和"战爭"，"等待"和"爭取"，兩个概念互不相容，这一个概念排斥另一个概念。

处在不調和关系中的，有矛盾关系和对立关系，这是兩种不同的关系。例如"好"和"不好"是矛盾关系，"好"和"坏"是对立关系。因为"不好"除了否定"好"以外并沒有肯定什么；"坏"除否定"好"以外，还肯定了"坏"。

有人認为只有对立关系才能組成反义詞。例如布拉霍夫斯基說："人們理解的反义詞不是可以用否定的附加詞来表示的簡單的对立(例如'白的'：'不白的'；'說'：'不說'；'平靜的'：'不平靜的'等等)，而是用不同的詞根表示的意义的对比(例如'穷'：'富'；'干'：'湿'；'陈旧'：'新鮮'……"(轉引自高名凱《普通語言学》下册，66頁)。最新版《苏联大百科全書》中也指明："反义詞是詞根絕对不同的詞"(轉引自《俄語同义詞、反义詞及同音异义詞研究》，20頁，时代出版社，1955年4月北京版)。

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說法，認为矛盾关系也可以組成反义詞(如A. A. 基列耶夫的《談反义詞》，轉引自《俄語同义詞、反义詞及同音异义詞研究》)。事实上，对于下列各句中加小圈的这些概念的对立性是不容怀疑的。

4) 滿意与不滿意，喜悅与悲哀，爱好与憎恨，战斗的兴奋与畏惧，激动与平靜——这一切都是形形色色的感情或情緒的实例。（捷普洛夫《心理学》，136頁）

5) 道德是判断人們行为中好坏、是非、正义或非正义、罪恶或荣誉的标准。（《道德是有阶級性的》，見1955年4月7日《解放日报》第三版）

6) 它們(按指新八股、新教条)不是生动活潑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反对党八股》，見《毛澤东选集》第三卷，853頁）

这些概念的对立性是借助于否定形式組成的(例6是拿單詞和詞組对比)。

虽然邏輯上的对立关系和矛盾关系是兩种不同的关系，不得相混，不过在語言里不能机械地用邏輯形式来衡量。例如我們常常拿"不坏"代表"好"，拿"不少"代表"多"。(語言里，否定的說法总比肯定的說法分量輕些，所以"不坏"并不完全等于"好"，往往等于說"不够好"。又如"不錯"并不就是"对"的否定，往往等于說"还好"。)但是"不好"又往往等于"坏"，"不对"又往往等于"錯"。可見語言中帶"不"的詞和跟它相对立的那个詞并不全是屬于矛盾关系，有时就是一种对立关系，因此广泛地理解反义詞，不把反义詞局限于邏輯上的对立关系，同时包括矛盾关系，是符合語言的情况的，不过由于矛盾关系所表現的只是兩个概念間的一种簡單的对立，因此它不能作为組成反义詞的主要关系，这一点也是肯定的。比方要是我們把"明晰的对面是晦澀，确切的对面是含糊，簡煉的对面是冗贅"(張瓌一《修辞概要》，45頁)說成"明晰的对面是不明晰，确切的对面是不确切，簡煉的对面是不簡煉"，那豈不就是語言無味，毫無表現力了嗎?

不是任何一个詞都有它的反义詞。反义詞是以意义的对立性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只有那些表示有另外的概念与之对立的概念才能有反义詞。因此，語言中的反义詞比同义詞要少得多。

反义詞以形容詞为最多。因为形容詞是表示事物的性質的，性質总不是絕对的，而是相对的比較的。其次是动詞，名詞里面較少。有些副詞和介詞也能有反义詞。例如"他們都来了"和"只来了一个人"，"从群众

中来”和“到群众中去”。

因为詞有多义性，所以同一个詞可能有几个反义詞。比方我們有时候說“热爱和平，反对战爭”，有时候也說“保衛和平，反对战爭”，有时候也說“拥护和平，反对战爭”。又如“和平拥护者”的反义詞有“战爭挑撥者”，“战爭煽动者”，“战爭鼓吹者”等。

看見“歌頌”这个詞，它使我們想起“誹謗”这个詞；可是下面的例子却用了“暴露”、“刻划”和“憎恶”来同它对比。

7）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見«毛澤东选集»第三卷，893 頁）

8）歌頌資产阶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划資产阶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产阶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划無产阶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嗎？（同上，489 頁）

9）人民是充滿爱国心的。他們歌頌捍衛祖国的民族英雄，而憎恶背叛祖国的民族敗类。（周揚«改革和發展民族戏曲艺术»，文艺报 1954 年 24 号）

注意下面各句中的反义詞，例如和“个人”对比的有“党”“国家”“社会”等，和“暫时”或“眼前”对比的有“長远”“远大”“將来”等。

10）馬克思主义的原則，是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部分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暫时的利益服从長远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服从世界的利益。（刘少奇«論共产党員的修养»，人民出版社，1951 年，上海版，41 頁）

11）人人都应当使眼前的利益服从于長运的利益，使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体的利益，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国家的利益。（1953 年 10 月 3 日«人民日报»社論«为了建設祖国，提倡艰苦奋斗和服从計划的精神»）

12）用算細賬的方法使他們从眼前利益看到远大利益，看到眼前利益必須服从远大利益。（1953 年 11 月 15 日«人民日报»社論«帮助农民算三笔賬»）

13）一切只顧个人不顧社会、只顧局部不顧全体、只顧眼前不顧將来、只顧权利不顧义务、只顧消費不顧生产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必須反对的。（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1954 年 10 月，上海版，22 頁）

綜合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把反义詞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特征相对立的反义詞，例如“好”和“坏”，“聰明”和“愚笨”；第二类是帶“不”字的反义詞，例如“好”和“不好”，“聰明”和“不聰明”；第三类是在一定的上下文中用对比、互相对照的手法構成的反义詞，例如“贊成”和“反对”是第一类的反义詞，“贊成”和“不贊成”是第二类的反义詞，“拥护”“保衛”和“反对”是第三类的反义詞。

反义詞和“对对子”相同而不尽相同。

对对子只要求意思对称，不一定要求意思相反。比方說，“紅花”可以对“綠叶”，“花紅”可以对“柳綠”，“花好”可以对“月圓”，“天涯”可以对“海角”，“好吃”可以对“懶做”。而屬于反义詞的兩个詞，不但意思不同，而且要恰恰相反，兩个概念必須处于相对立的兩極端。

对对子不但要單音节对單音节，双音节对双音节，并且講究声調，平声要用仄声来对，仄声要用平声来对。反义詞虽然一般也采取整齐的形式，要求音节相当，但反义詞重在意思的对立，不仅不受声調的限制，有时候也可以拿个別的詞来和詞組对比。下面有單音节对單音节的，有双音节对双音节的，也有音节不相当的。

14）將丰富的感覚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眞、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实踐論»，見«毛澤东选集»第一卷，290 頁）

15）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斗爭是生死斗爭。（«新民主主义論»，同上第二卷，669 頁）

16）战爭中的攻守，进退，胜敗，都是矛盾着的現象。（«矛盾論»，同上第二卷，772 頁）

17）在这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結，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領导全国人民与蔣介石国民党的反动趋势作斗爭。（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52 頁）

18）这工作將創造一切的奇迹：但正如波列伏依同志所說，对于苏联人，所有的奇迹是“日常的东西”，对于我們中国人民也將要一天一天成为“日常的东西”的。（馮雪峰«从“伏尔加——頓河运河”的通航想到中国的今天、明天与后天»，見«高中語文課本»第四册）

19）整个自然界，由其最小部分到最大物体，由沙粒到太陽，由“原生生物”（原始的活細胞）到人，都是处在永恒的产生和消灭过程中……。（«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7 年，上海版，139頁）

上例最后的兩句，“奇迹”和“日常的东西”，“原生生物”和“人”，都是用个別的詞来和詞組对比。（例 6、22，23 也有詞和詞組对比的例子。）

20）对于他們，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見«毛澤东选集»第三卷，884 頁）

21）現在是“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統一的問題，是提高和普及統一的問題。（同上，886 頁）

22）他們喜爱那些大公無私、見义勇为的人物，憎恶那些胆小自私、見利忘义的卑鄙小人。（周揚«改革和發展民族戏曲艺术»，文艺报 1954 第 24 号）

注意反义詞的練習，可以丰富我們的詞彙，發展我們的思惟。

反义詞代表兩个互相对立的比較的概念。因此我們看到“光明”就很容易想起“黑暗”；看到“容易”就很容易想起“困难”。它如“熟練—生疏”、“驕傲—謙虛”、“文明—野蛮”、“聰明—愚笨”、“有趣—乏味”、“一般—特殊”等等，都可以对照着来学。用这种方法来学習詞彙，使我們可能把那些互相紧密联系着而又彼此对立

的詞归类，这样就不只能把所学的詞記得很牢，并且能够帮助我們回想起已經学过的熟詞来，对于記忆和巩固我們的詞彙有很大的帮助。

借助反义詞可以帮助我們深入地了解詞的意义，弄清楚詞的多义性，提高閱讀的自覚性和用詞的精确性，养成正确使用这些詞的熟練技巧。比方“和平”和“平和”是同义詞，意义不大容易分得清楚。如果把这兩个詞的反义詞找出来：“和平”的反面是“战爭”或“武力”，“平和”的反面是“猛烈”或“急躁”，那就不难懂得这兩个詞的确切的意义了。再比方，知道了“决心”的反面是“犹豫”，“相信”的反面是“怀疑”，那么对于“决心”和“相信”、“犹豫”和“怀疑”这四个詞的意义和用法也就容易掌握了。这样看来，反义詞的学習和同义詞的学習又是密切相关的。

反义詞也和同义詞一样，除了它的基本意义之外，还能有一系列的次要意义。这些次要意义，也各有它的反义詞。比方說，“老”的基本意义是年紀大，它的反面是“少”或“幼”；引申起来，“老”又有陈旧或經历長、有經驗的意思，例如“老書、老房、老朋友、老毛病、老幹部、老主顧、老手”，它的反面是“新”；“老”又是“嫩”的反面，例如“老筍、菠菜老了、鷄蛋煮老了”。可見利用反义詞是揭明与它們相对立的詞的意义的好方法。借助这种方法不仅能帮助我們辨別詞在意义上的細微区別和色彩，并且能使我們明白，詞的意义很多，只有从上下文才能看出一个詞在一种具体情况下表示的是什么意义。

研究反义詞或同义詞都可以形成各式各样的关于詞义的联想。这种联想对于准确了解詞义和巩固我們的詞彙、丰富我們的詞彙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由此可知同义詞和反义詞的学習，在語言詞彙的学習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

善于使用反义詞，能把我們的思想更准确地表达出来，同时文章也就富于表現力。关于这一点，留到第三节里再討論。

二 反义詞在構詞上的作用

反义詞在汉語里有它的特殊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別的語言所少有的，值得特別提出来談一談。

汉語里有不少的双音合成詞是由兩个意义相反或相对襯的單音詞組合成功的。例如：

兄弟 姊妹 日夜 矛盾 首尾 规矩 因果 东西 天地 （以上由兩个名詞組成） 呼吸 动靜(兒)举止 行止 生死 起伏 去留 进退 出納 支付 借貸 买卖 开关 鋪蓋 消息 兴亡 盛衰 俯仰 呼应 吞吐 伸縮 升降 抑揚 盈亏 胜敗 損益 賞罰 （以上由兩个动詞組成） 死活 横竪 横直 反正 高低 好歹 好坏 左右 始終 里外 黑白 長短 大小 多少 上下 高低 先后 寒暑 冷热 甘苦 曲直 虛实 标本 利害 雌雄 男女 老小 老少 長幼 貧富 貴賤 美丑 吉凶 善惡 眞假 难易 快慢 明暗 粗細 异同 强弱 本末 古今 （以上由兩个形容詞組成）

这些由反义詞組成的合成詞，它們本由詞組凝定而成，有些还保留詞組的性質，不一定就算复合詞，也有同一个詞，有时以合成詞的形态出現，有时又以詞組的形态出現。它們有好些特点，这里提出三点来談一談。

（1）兩个單音詞的意思都很具体，組成合成詞后，一般說，意思較抽象，有概括性。其中有些仍保留兩个对立單音詞的本义，有的产生了新义，單音詞的原义已經改变或丧失。例如“兄弟”“姊妹”等于“同胞”。“日夜”等于“整天”。又如“呼吸”就是“气息”，等于北方話的“喘气兒”。“动靜”“举止”“行止”等于“行为”或“情况”。“开关”的学名叫做“开閉器”。“消息”等于“音信”“新聞”。“鋪蓋”等于“行李”。“买卖”等于“生意”。又如“寒暑”等于“周年”。“長短”等于“長度”。“大小”等于“体积”或“面积”。“多少”等于“若干”“几”。还有像“东西”跟“东边”和“西边”無关，指的是“物件”。“利害”跟“利益”和“害处”無关，而是“狠”的意思。

（2）借原来相反的意义来表示“無論如何”的意思。比方說“横竪我是要去的”，意思是：这样(横)我也要去，那样(竪)我也要去，在任何情况之下我都要去；等于說：無論如何我是要去的。屬于这一类的詞有“横竪、反正、左右、好歹、長短、里外、好坏”等。这些詞除了表示“無論如何”的意思之外，有些还有別的意思。例如“左右”还表示大概的数目，等于“上下”；也指跟从的人。“長短”“好歹”还指意外的变故，等于“不幸的事”。

（3）另外一些詞形式上是由反义詞組成的，而实际上只有單方面的意义，另一方只作为陪襯或反襯，这叫做“偏义”。比方說，“兄弟”并不指“兄”和“弟”，也不替代“同胞”，而是“弟弟”的意思。《紅楼夢》里只有“兄弟”沒有“弟弟”；現在北方話还是如此。“好歹”通常只用它的偏义：“不識好歹”，就是“不識好”；“万一他有个好歹，可眞要命”，就單指“歹”的一方面了。“老小”通常代替“家屬”，如說“一家老小”。無錫方言把小孩子叫“老小”，那就是用它的偏义。

合成詞用反义詞来組成，这是汉語構詞法中一种相当有趣的事实。此外，汉語里还有一大批的成語是利用反义詞造成的。这些成語多半是很簡煉而富有形象性的。下面也来举一些例子：

奔暗投明 深入淺出 头重脚輕 有名無实 顧此失彼
貪小失大 陽奉陰違 亲痛仇快 口是心非 貌合神离
出生入死 外强中干 东張西望 异口同声 上行下效
少見多怪 眼高手低 爭先恐後 水落石出 無中生有
朝不保夕 得不償失 左右逢源 坐立不安 新陈代謝

有一种諱飾詞，也常利用反义詞来造成，附在这里談一下。

說出来不好听，或者世俗人情認为不祥的名称，往往就故意不說而改用一个同那名称意义相反的詞来代替。比方不說“垃圾箱”，而說“清潔箱”；不說“失火”，而說“走水”；不說“受伤”，而說“挂彩”。又如把死人穿的衣服叫做“寿衣”。因为“舌”和“折”或“蝕”同音，而“折”和“蝕”都是亏損的意思，于是有些方言就把“猪舌头”叫做“猪賺头”（湖北方言）或“猪利”（广州方言，方言字作“脷”。又北方話管“猪舌头”叫“口条”，也是由于諱飾的作用，但不是用的反义詞）。因为“肝”和“干”同音，而“干”是沒有錢的象征，于是广州方言就把“猪肝”叫做“猪潤”或“猪湿”，把“蘿蔔干”叫做“蘿蔔潤”。因为广州方言“空”和“凶”同音，所以把“空屋出租”說成“吉屋出租”。詞彙上的这种变化，主要是修辞上的講究。

三　反义詞在修辞上的作用

捷普洛夫在他的《心理学》中論到言語的修养，曾指出：“一个人写作时，要自觉地和有意識地構造自己的言語，探求适当的詞，寻找优美的句子底構造，而且选擇詞底順序等等。所謂写作就是說在思想底詞的表現力上下工夫。”（人民教育出版社版，131—132頁）什么是語言的表現力呢？捷普洛夫說：“不論任何一种言語，不仅傳达一定的內容，而且还表現着說話者或写作者对于这种內容的态度。換句話說，它不只是要傳达思想，而且还要表現感情。言語底这方面，叫做言語底表現力。一种失去了表現力的言語，無論它傳达的內容如何丰富，它只能使人發生一种死沉沉的無生气的印象。”（同上，130頁）

反义詞的特点在于它的对立性。兩个概念的內涵不仅不同，而且相反；不仅有差別，而且差別很大，像是配置在一条鎖鍊兩端的兩个环节。說話人需要把不同的現象明显地对立起来或对某一个現象的矛盾性予以特別揭明的时候，就用得着反义詞。善于利用反义詞，不仅可以使意思明确，重点突出，还可以使語言的形式整齐，音調諧和，是增强語言的說服力和表現力的一种有效办法。比方說，“热爱和平，反对战爭”，这种鮮明的对比，就揭示了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和我們斗爭的目标：帝国主义陣营害怕和平，一心挑撥战爭；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們都在尽最大的努力来拥护和平，制止战爭。“热爱和平，反对战爭”这兩句話，就不仅傳达了我們的基本意思，而且也表示了我們对于事物的态度。

語言中运用反义詞的范圍相当广泛。各种文体，包括民間口头創作如諺語、謎語等，都广泛地利用反义詞。修辞上有好些表現手段都和利用反义詞有关。下面挑几种重要的談一談。

（1）把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兩个概念放一起，可以突出所要說的事物，使所要說的一方面分外鮮明；或者使兩方面交相映發，相得益彰。这种修辞手段叫做“映襯”，也叫“对比”。前面举的例子大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又如：

23）在談判桌上：这边是正义，那边是野蛮無耻；这边是和平战士，那边是战爭販子。（田間《板門店紀事》6頁）

24）这是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之間，是金元与良心之間，是原子彈和眞正的人道主义之間，是捆墓人的鋤头与园丁的鋤头之間的分裂。（爱倫堡《保衛和平保衛文化》）

25）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別人痛苦的基础上，是一切剝削者的共同特点。（刘少奇《人的阶級性》）

26）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宝貝，那么，它們的敌人，当然是我們的朋友了。（魯迅《我們不再受騙了》，見《高中語文課本》第一册）

（2）有一种句子，表面上看来像是自相矛盾，可是仔細一想，却含有極深刻的道理。惟其表面上有些矛盾，才使讀者感到惊奇、非用心想一想不可，因而觉得意味深長，得到的印象也特別深刻。这叫做“警句”（警句的一种）。这种警句就是利用反义詞造成的。例如：

27）这是偉大毛澤东时代的平凡。这平凡里孕着一种極偉大的东西。（曹靖华《平凡的偉大》，《人民文学》1954年10月号）

28）《恐惧与無畏》里的潘菲洛夫对于“时間”曾說过这样一段話：“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久而又短，最易被人忽視而又最易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間。”（凱萊《不爱惜时間的人》，《文艺学習》1954年5月号，15頁）

29）年青时讀子期《思旧賦》，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剛开头却又煞了尾。（魯迅《为了忘却的紀念》，見《高中語文課本》第六册）

有些熟語如“相反相成”“溫故而知新”“損不足补有余”“机械而自然”，也都屬于这一类。

（3）有时候我們嘴里說的話和內心的意思恰恰相反，这叫做“反話”，也叫“倒反”。“反話”也是利用反义詞的一种修辞手段。比如抗战前几年，报紙上常常出現“友邦”“中日亲善”这些話，它的眞实意思却是“敌邦”“中日交惡”。这在写的人和看的人，大家都心里明白。又如旧小說里的“寃家”并不是“仇人”，而是指似恨而实爱的人或“情人”。

反話有幽默感，有的还帶有諷刺的意味。例如：

30）有一次，需要赶紧試驗一种新飞机，就有些“聪明人”提議把飞机运到离工厂很远的地方去試驗，理由是担任試驗飞机的駕駛員正在那里。（《偉大而質朴的人物》，見《初中語文課本》第六册）

31）杜勒斯所謂的“防御”“安全”和“抵御共产党侵略”等等，無非是学希特勒的办法来掩飾他們的战爭政策，这还不清楚嗎？（1954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論《中国

人民不解放台灣决不罢休!》)

32）胡風是馬克思主义的"实踐者"呢，还是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楊耳《一篇文章的題目》，見1955年3月17日《人民日报》)

上面这些加黑点的詞，用的是它的相反的意义。但写作的人并不从正面去批評它或否定它，却用了一个字面上同眞正的意义相反的詞来表示。这样的說法，不但經济，而且有力，能引起讀者的特別注意。这种不取其通常意义的詞，一般用引号来表示，有时在它們的前面加上"所謂"二字。

（4）当甲乙兩項事物連說时，把原来适用于甲項事物的詞趁便移来表示乙項事物，这种修辞手段叫做"拈連"。例如："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襲袁世凱的老路，追求專制的統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內战，結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縮上了峨嵋山。"(《論联合政府》，見《毛澤东选集》第二卷，1095頁)第二个"打"字就是順着第一个"打"字趁便来借用一下的。应用这种修辞手段，有时候需要利用反义詞。例如：

33）国民党軍队…一天一天腐敗墮落，除了"內战內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論联合政府》，見《毛澤东选集》第三卷，1097頁)

34）連長，你記性不好，忘性倒不錯啊!(田川等《修堤》，見《高中語文課本》第六册)

35）將后国家建設起来，慢慢富强起来，上級一定能有一个布置。咱們都是大老粗，好好学習，变他个老細。(西虹《家》，見《高中語文課本》第四册)

36）就是沒有功劳吧，也还有一点苦劳，你說对不对?(同上)

"內行"和"外行"，"記性"和"忘性"，語言里是有这些詞的。"老粗""功劳"成詞；"老細""苦劳"不成詞，它們如果不紧連在那些成詞的詞的后面就無法理解。应用这种修辞手段，也富于幽默感，有时也帶有諷刺的意味。

（5）前面說过，反义詞和对对子相同，虽然不尽相同。利用反义詞可以造成"对偶"(对偶也可以用同义詞造成)。用反义詞造成的对偶，就內容来說，往往就是映襯。再举几个例子：

37）生的偉大，死的光荣。(毛主席給刘胡蘭墓上題的字)

38）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將鬼变成人。《白毛女》

39）今天，日內瓦湖与紅河，成为全世界人民所注視的地方。印度支那的前途，是和平还是战爭?是人民的自由还是殖民主义者的謀杀?从这里对全世界將揭开燦爛的陽光还是遮起沉重的陰霾?这一連串的問題，正在考驗着人們。(刘白羽《自由的呼声》，《文艺报》1954年第10号)

文章里用了这些反义詞，把对立的思想或形象进行对照时，就特別显得精确有力，好讀易懂，富于說服力和表現力，并且能强烈地影响人的想象力，使人們从对立和对比中得到鮮明动人的印象。

对《苗語的社会方言》一文的意見

竹　亭

本刊1957年5月号《苗語的社会方言》一文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现在提出我的意見供爱卿同志参考。

苗語西部方言里，在四川古芩县箭竹乡一帶有一种社会方言。会說能懂这种社会方言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人，有妇女，也有男人。有些妇女不懂，还有些男人会說也能懂。

但是，爱卿同志却說："…除了妇女会說能懂外，别的人甚至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也一句不懂。"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在四川古芩县調查苗語的时候，文教科的韓同志是个男人，他就是懂得这种話的一个；在路过箭竹坪的时候，只請来了三个会說这种話的妇女發音，而这三个人中的其中一个的丈夫(是我們在古芩調查时的發音合作人)虽不懂，可是我們决不能說除了妇女外，別的人就不懂。因为这种社会方言是少数苗族男女共有的，不是少数妇女共有的。

这种社会方言的特点是在原有的詞彙和語法構造上，在一个音綴中以簡單的元音、輔音(声調与原来音綴相同)和音綴的增加来玩弄花样。方式有兩种。

第一种方式是把一个音綴分成兩个音綴，在原来音綴的声母后面加[y]，韵母前面加[s]。如把 la˩(田)說成 ly˩ sa˩，把 ko˥(我)說成 ky˥ so˥。爱卿同志对这一点的認識是正确的。第二种方式是在被分开的音綴中間加一个沒有任何意义的音綴[tɕa˩]，变成了三个音綴。如把 la˩ 說成 ly˩ tɕa˩ sa˩，把 ko˥ 說成 ky˥ tɕa˩ so˥。这种方式是怕用第一种方式說別人听得懂才增加音綴的。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別人不懂。

但是，爱卿同志却把第二种方式弄錯了。他把增加的音綴[tɕa˩]說成 tɕau˧(叫)，如 ky˥ tɕau˧ so˥。

关于中国民族語文工作中的某些問題

中国科学院語言学顧問　謝尔久琴柯

一

近几年来，中国的少数民族語言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多次指示，为了实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議，在創造和改革中国为数很多的民族文字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在1956—57年，經过詳細的語言調查之后，已經为中国这样的少数民族，如：卡瓦、拉祜、傈僳、哈尼、納西、景頗、載佤、彝（諸苏）、苗、僮、布依、黎、达呼尔、柯尔克兹、傣（德宏和西双版納）創制了完善的文字方案；决定了徹底改革蒙古、錫伯、維吾尔、哈薩克、烏孜別克和塔塔尔等族的文字。不久，还將为这样的蒙古部族，如：土族、东乡、保安，僮傣語族的侗、水家、毛难，云南和貴州的彝族創造文字。

在創造新文字和改革旧文字当中，曾不止一次地产生了一些要求以最严肃的态度来考虑的問題，在考虑这些問題时，不仅要估計到純語言学的見解，同样也要考虑到社会政治因素。

这些問題中，最重要的是：(1) 关于选擇被創造文字及标准語的方言基础；(2) 关于确定統一的标准音；(3) 关于給名为統一的少数民族創造几种文字的問題；(4) 关于字母表的統一，以及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字母表中补充字母的形式。

在將近三年的时間里，我一直参加着帮助中国少数民族創造文字的工作。有鑒于苏联創造文字和改革文字的經驗，这里我想談談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是怎样解决这些問題的。

二

每一种語言通常都分为一系列的方言和土語。創造文字是和建立統一的、团結全民族的标准語直接地緊密相关的。全民标准語通常是在一种地方方言基础上發展，这种方言能最全面和最鮮明地反映出語言發展的一般趋向和全民語的特点。

我們且举一个可以表征一切的例子。在汉語組成中，由于汉民族生活的历史条件，到目前为止，还保存了相当稳定的、数目很多并且是各种各样的地方方言和土語。像这样的一些方言，北方話（“官話”）、广东話、江浙話、福建話、湖南話及其他，它們彼此之間有很大的差別。一种方言中的各地区方言和土語彼此也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江浙話的上海土語和杭州土語）。但是，在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分布最广和具有全国意义的是北方話，其典型代表为北京土語。

使用分布在中国領土大部地区的北方話的人，約占汉族人口的70%。另外还有一点也賦予了北方話以全国性的威望，即在北方話系統中还有中国首都的土語——在中国历史上，在国家事务和文化上起了特殊作用的北京土語。因此，北方話成了这样的基础、这样的基础方言，在它的上面，現在正形成着和發展着統一的汉民族标准語，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考虑到汉族和汉語的历史，可以完全負責地証明：正是在汉語的北方話里，最完整和最鮮明地反映出了偉大汉民族的語言，对全汉族来說是共同的統一語。

在創造和改革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时，首要的基本任务，也就是为新創的或改进的文字及标准語选擇方言基础。实現这一任务并不總是很容易的，因为远不是在所有的少数民族的历史上都能明显地区別出某一方言的主导作用，如像汉語的北部方言（北方話）所曾發生过的那样。

为維吾尔文和标准語确定方言基础曾是比較容易的。在維語諸方言中（中心方言、和闐方言、罗布泊方言及其他），分布最广和最有威望的是中心方言，这一点是無可爭辯的。在这一方言組成中，包括維族历史上著名的、作为文化和商業經济中心的北部土語（伊犁、吐魯番）和南部土語（喀什、莎車及其他）。中心方言是大家公認的現代維吾尔标准語和維文的方言基础。

僮語分为兩种差別很大的方言：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操第一种方言的占僮族人口的絕大多数（約4,500,000人，总人口为6,500,000人），在这一方言区內有鉄路，正建設着对僮族自治区說是有發展前途的工業企業；这里还有着虽然年輕，但对培养僮族幹部和知識分子已經起了一定作用的文化中心——武鳴城。所有这些，也就确定了选北部方言作为目前正創制中的僮文及其标准語的基础。

拉祜納方言已被認作是少数民族拉祜（在云南）的文字和标准語的方言基础，操該种方言的約为中国拉祜居民总人口的3/4。第二种方言拉祜熙，是少数人的方言，它自然应該把主导作用讓給多数人的方言。但是，在选擇拉祜标准語和文字的方言基础时，也唯有依靠說明某种方言在居民中傳布面大小的人口数字。因为，在这里沒有任何特殊的旁的因素，可以决定选拉祜納方言作为拉祜文字和标准語基础。

在为凉山彝族（諸苏）創造文字时，首先也是从数字材料出發来选擇它的标准語的。操諸苏北部方言的約为950,000人，操南部方言的則有250,000—260,000

人。和北部方言相比，南部方言沒有任何优越之处；就从使用人数上看，它也比北部方言的使用人少得多。因此，諾苏的北部方言被認为是新文字的基础方言。

但是，数字标志也并不总是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进行改革老蒙文的准备工作时，長时間地考虑了这个問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蒙古标准語应該沿着哪条道路进一步發展。在中国的五种蒙語方言——东部方言，巴尔虎-布利亞特方言，中部方言，西部方言和新疆（衛拉特）方言中，說东部方言的人最多。

采用东部方言为蒙古标准語基础似乎应該是最正确的。但是，如果沿着这条路走的話，那就意味着跟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存在的、以喀尔喀方言为基础的蒙語标准語同时，还得以另一种方言为基础再建立一种标准語，而事实上，以喀尔喀方言为基础的現代蒙古标准語，也是中国广大的蒙族知識分子和工作幹部所熟知的。用这种語言已創作出相当多的、各种各样的作品——社会政治的、文艺的、教育的，等等。这些作品在中国的內蒙古，同时也在新疆維吾尔自治区、青海、黑龙江及其他住有蒙族的省份都广泛地被利用着。

在內蒙通用的蒙古中部方言，尤其是它的錫林浩特-烏蘭察布土語，跟喀尔喀方言很接近。可見，喀尔喀方言对中国的蒙族来說，并不是陌生的。

1956年5月在呼和浩特举行的蒙古語文会議，通过了今后發展一种蒙古标准語的决議，并要依靠和喀尔喀方言最近的中国蒙語的中部方言来扩大这一标准語的方言基础。对中国的蒙族說，这一决議的好处是：它給蒙族提出了广泛利用蒙古人民共和国用新蒙文出版的、用作科学教育及社会教育的著作的可能性。

創制統一的，全民形式的文字和标准語，对团結人民，使他們意識到自己民族文化的統一是極其重要的。一个民族，如果沒有必需的根据，而采用数量过多的文字，就只能削弱这一团結和統一，使人民在發展他們的民族文化的事業中力量分散，有时，甚至会造成使用不同文字的各居民集体之間的不友好的关系。

傈僳族（約310,000人）的文字問題便曾是这种情况。傈僳語中并沒有强烈的方言分歧現象。可以容易地用一种文字把主要是居住在云南的傈僳人团結起来。但是，虽然如此，直到最近，他們的文字并不是一种，而是三种；由于这个原故，使用不同体系文字的傈僳居民之間的交际便曾受到很大限制，在他們之間一般是禁止通婚的。

納西族（約160,000人）在語言上分为兩种方言：西部和东部。看来，为納西西部方言（約130,000人）很早就已創造了兩种文字：一种是大量使用象形字（圖画）的东巴文和另一种音节的哥巴文。

除此以外，納西的瑪丽瑪沙人（只有一百多家），在日常生活中是使用圖画和音节的混合文字。

1957年3月在昆明举行的云南語文科学討論会对傈僳和納西的統一的新文字方案表示了同意。这無疑是正确的，并將促进每个这样的部族进而团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但是，中国还有这样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語言沒有方言分歧現象。它們有共同的詞彙和語法，只是在語音組成上，在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各居民集体的發音上，可以观察到某些特点。这些少数民族語言只有土語之分，这样一来，在这些語言面前便不存在选擇作为标准語的詞彙和語法基础的方言的問題。屬于这类語言的有东乡語和錫伯語等。这些少数民族語言是相当一致的。在解决为他們首次創造文字的問題时（东乡），或改革文字时（錫伯），只需确定标准音，指定一种土語（这种土語的讀音应該被認为是全民的、标准的）作为說該种語言的人的發音規范。

三

当我們談到选擇标准語的方言基础时，首先，我們是指語言的詞彙和語法而言；也就是指語言的主要結構成分而言。沒有确定詞彙和語法的規范，就不可能發展全民統一标准語。但是，在現代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就是只确定划一的正确标准讀音也能起重大作用。

标准音是标准語的必要成分之一。在确定标准語的基础方言时，通常是以分布地区相当广，在人民間享有威望，能反映出語言發展的一般趋向的方言为准的，这种方言，常是某一政治或文化中心的方言。然而，每种方言在自己的組成中，一般都有几种土語，这些土語正是以自己的讀音、語音而互相区別。因此，在解决标准音問題时，就已經不能以方言为准，而是要以某种分布不太广的、有威望的土語为准。

無容置疑，在作为汉語标准語基础方言的北方話中，北京土語，对确定标准音来說，是最有威望的。在北方話中，北京土語是最典型的，而且好像是最中立的，它沒有数量上很多的跟北方話其他土語相区別的特殊的、独特的語音特点。

作为标准音，当然应該选擇严格确定的土語的語音，因为，甚至在汉語的北方話系統中，在它的各个土語里，也能听到像这样的詞，如："中国"[tʂuŋ kuo, tsuŋ kuo, tsuŋ kuei] 的不同的讀音。

还想提醒一点，就如俄語标准語，它的方言基础是俄罗斯中部方言，而它的标准音規范則是建立在分布地区較有限制的莫斯科土語上。

在創立少数民族的文字和建立标准語上，正确地选擇語音基础是非常重要的。維吾尔語的伊犁（西北部）土語，在最近25年以来——在新疆的民族民主运动發展时期，在向蔣介石腐化分子斗爭时期，获得了特殊的威信，在新疆維族中已成为普遍为人所知的土語。伊犁曾是这一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在这里，發展了民

族民主的印刷事業，培养了进步知識分子幹部，举行过重要的会議；自从新疆的中心迁到烏魯木齐之后，广播仍是系統地用伊犁語音进行。正是因此，就在現在，維語的标准音也还是以伊犁音为基础。

僮語的武鳴音已成为僮語标准音的語音基础。这一土語是僮族文化中心的土語。在僮族中，它是最典型和最中立的土語，在僮語北部方言系統中，它是和南部方言諸土語最接近的一种土語。它只有極少的武鳴独有的語音特点，这些特点，一般說来，在任何土語里(甚至在汉語的北京土語里)都有。这些不多的、只是武鳴才有的語音特点，也像北京土語独有的語音特点一样，不認为是标准音的規范。

凉山彝語(諸苏)分为三种土語——聖乍，义諾和田壩，这三种土語又分为几种次土語。操聖乍土語的約600,000人，也就是几乎占全諸苏人的50%。在这种土語中，最典型的是喜德县的語音。喜德县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中心，和西昌及正鋪設的鉄路支綫相近，它离富有地下蘊藏及在工業方面有發展前途的地方不远。喜德县的諸苏人是聚居的，它的文化政治發展似乎比諸苏人居住的其他地区要高一些。喜德居民的語言是大家都懂得的，并認为是"优美的"，其他地方的居民都学習这种語言。从上述各点出發，正是喜德的典型語音被承認是凉山全彝族(諸苏)的标准音。

在給海南島的黎族創造文字时，在黎族中分布最广和最有代表性的侾方言被認作是新建标准語的方言基础。标准音基础則是該方言的保定土語。在保定土語中，反映着侾方言諸土語最典型的語音特点。保定土語是最中立的，狹隘性的、保定独有的語音特点很少。所有这些，也就說明了黎語的保定土語語音的标准音作用。

作为新蒙文語音基础的是烏蘭巴托語音，它不仅在喀尔喀方言各代表語中是最有威望的，就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蒙語的其他方言代表中也是最有威望的。烏蘭巴托音和中国蒙語的錫林浩特-烏蘭察布語音(中部方言体系中的土語)相符。烏蘭巴托語音現在也就是全蒙标准語的規范。

正确地規定方言基础和語音基础，是为少数民族創立文字和标准語的問題順利解决的保証。

四

可是，在中国还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时需要給名为統一的少数民族創造几种文字。屬于这类少数民族的有苗、彝、哈尼、景頗、土族。

在談到彝族时，应該考虑到，在这一少数民族的个別部分，不論是早期的封建制度关系，或是奴隶制关系，甚至原始氏族关系，都还沒有根除，因此，彝族似乎还不能說是具有統一的語言、文化、風俗習慣、并且聚居而紧密团結的民族。

"彝族"这一名称的本身也是來自汉語，它并不是全族公認的自称。仅凉山彝族(約1,200,000人，总人口为3,250,000人)就有他們公認的自称"諸苏"或"聶苏"，这說明他們已意識到自己的統一，意識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种集体。其余正式名为"彝族"的，主要是居住在云南，部分居住在貴州。它們并不認为自己是"諸苏"，而是分为数目相当多的小的人种集体，各有自己的自称。而且，云南和貴州的大部分彝族，在語言和文化方面，跟凉山彝族也有根本差別。云南和凉山的本地彝族居民彼此不通話。而且就在云南彝族的个別部分間，也由于首先是詞彙、語音、声調，有时甚至是語法上的显著分歧，他們之間的交际，或者是有困难，或者是根本不可能。

据彝語調查队的材料，云南彝語最少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方言或方言区。但按其性質，却可以不說是方言，而是彝語的語言，因为它們之間的差別太大了。

正因为如此，还是在1951年，就为凉山的彝族(諸苏)創造了一种文字，1956年底又对它做了很多改进。关于要为云南及貴州的彝族創造文字的数目及方言基础問題，現在还沒有解决。

假如全彝族在住区上是統一的，并經过共同的历史發展道路，那么，即使是經过封建制度的阶段，他們也会更紧密地团結为一个民族，在文化方面就更能一致，他們的方言也就更能相接近而逐漸在統一的全民語中消磨掉。但是，这种情况在彝族的历史上并沒有發生过。所以，为他們只創造一种文字，一种标准語是不可能的，这种企圖只能导致彝族各方言区居民相互关系的尖銳化。就現有事实考虑，即如仅仅是为云南、貴州的彝族就要准备創造好几种文字。

苗族也和彝族一样，在居民的文化、日常生活和語言方面，分为几个彼此有显著区别的部分。就从住区上看，苗族是散居在長江南岸辽闊的地区上的。对苗語調查研究的結果，确定了苗語至少可以分为四种方言或方言区：东部、中部、西部和滇东北。貴州省中南部也住有苗族，他們的語言还沒有經过足够的調查。可能这里也將發現特殊的(第五种)苗語方言。

1956年11月在苗族語文科学討論会上(貴陽)，通过了暫时为苗族創立四种文字，以适应經过研究的差別很大的四种方言。

哈尼族在語言上屬于彝次語族，是居住在云南南部的少数民族，現在也决定創造兩种文字。这兩种哈尼文是以哈雅和碧卡方言为基础的。操哈雅方言的占哈尼族人口的大多数(約300,000人)，說哈雅方言的居民和說碧卡方言(約120,000人)的居民互相不能通話。

哈尼語的第三种方言——豪白方言也很特殊，它不論是和哈雅方言还是和碧卡方言，差別都很大。这种方言还沒有經过足够的研究。但是，豪白方言中的某些土語看起来和哈雅相近，而另一些則和碧卡相近。

現在，豪白方言的文字問題还沒有解决。在熟悉了以哈雅方言和碧卡方言为基础的文字之后，說豪白方言的居民自已將能鑒別出哪一种文字对他們更合适。很可能說豪白方言的某些土語的人將采用哈雅文，而另一些將采用碧卡文。

景頗族(克欽)在語言上分为兩部分——景頗和載佤，它早就有兩种文字。在緬甸，甚至連載佤人也有兩种文字，都是傳教士所創造的。目前，对中国的景頗和載佤文的字母表已經作了些改进和統一，但是在字母組成和字母数目上，仍然不尽相同。在景頗和載佤語里，不論是語音、詞彙、还是局部的語法，都不一样。所以，不論在中国或是緬甸，这些語言的代表人物都不同意使用一种完全統一的文字和發展一种标准語。

中国的土族只是近年来(1955—56)才开始被詳細地和全面地研究。土族的基本居民（約50,000人)在語言上分为兩部分——互助和民和。完全可以用一种文字把这些土族人团結起来。現在已經准备以互助方言为基础，用哈拉子溝土語的語音为标准音給他們創造文字。可是，居住在青海省銅仁县的不多的一組土族人(約3,000人)，却完全不懂其他土族人的話;这部分土族人的詞彙受藏語影响很深，他們的語音和語法則和居住在甘肃省的保安族很近似。

显然，銅仁县的土族不可能和其他的土族共同使用一种文字。看来，他們的語言服务工具的問題得用特殊的方法解决。

总之，应該指出，目前中国所采用的民族划分，并不經常和現实存在于这些民族之間和民族內部的語言关系相符合。为了証明这一点，还可以指出下面的事实。居住在海南島上，名为苗族的一种少数民族，在語言方面完全不屬于苗族，而是广西省瑤族的一种土語。同时，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划分中，通常認为是統一的瑤族，在語言方面却至少可以分为四組。在这个少数民族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說独立的瑤語;三分之二是說苗、侗和僮語。

五

四种苗文，兩种哈尼文，景頗和載佤文，还有將为云南和貴州的彝族創造的文字，当然都应該取得統一。同一語族不同語言中發音方法和音响性質相同的或近似的語音(音位)，用同样的字母表示是自然而合理的。

不能把实用的字母和准确的音标混同起来。准确的音标要求用各种不同的符号来标記音位，尽管这些音位在物理音响方面彼此差別并不大。但对实用字母表来說，这种微小的差別完全不必标記。在不同語言的实用字母表里，不仅同样的音位，就連近似的音位，也可以用同样的字母表示。

用不同的方式来标記如僮、布依和黎語中的一些彼此相同的，或非常近似的語音，是我們所不希望的。当然，要想使不同語言体系的字母表，甚至如僮和諸苏、僮和苗、僮和載佤的字母表之間完全統一，那都是很困难的事。虽然，所有这些語言都屬于汉藏語系，但是它們在自己的語音組成上，彼此却有根本的区別。

同一語族以外的字母表的統一是完全不可能和不必要的。苏联創造少数民族文字的經驗也証明了这一点。但看来，同一語族的，如：僮傣語族、苗瑤語族、彝、景頗等內部的各拉丁化字母表的統一，却是完全可能的。至于有極大差別的語言的字母表，即使是局部的、有限的統一，也就可以满意了。

亲屬語言字母表的合理的統一，能使这一民族的居民易于研究另一民族居民的語言、文字和著作，同时还能使那些新創文字的少数民族的印刷服务工具簡單化而减低印刷成本。

在进行統一各字母表的工作时，我們还必須考虑到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所制定的汉語拼音方案。这对与汉語亲屬关系很近的那些語言来說（其中僮傣語族也屬这一类)，固然特别显得合理和必需；但是，我認为也不能机械地解决这个問題，而不注意少数民族語言的語音特点。有时，字母表的过分統一，会使得各少数民族新創的文字过于笨重。例如，汉語拼音方案草案里，修正第一式准备采用 ch、sh、zh 这样的双字母，但在彝語支和苗瑤語族語言中，用汉語拼音方案的 ch, zh 所表达的語音可能是鼻化音。这时，考虑到这些語言中語音的特点，就需要用三个或四个字母来表达了，如：nch(i)，nzh(i)。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希望有的。

在为少数民族創造文字时，应該仔細考虑到，每一个补充到拉丁字母表里去的字母，在形式上都是簡單的，能容易地从其他字母中区別出只是某一字母才有的某种特征，使眼睛易于辨認，对初次学習的孩子們說，在書写上沒有特殊困难。在确定字母的印刷体和手写体时，經常要考虑到初入学兒童的心理狀态及現实可能；在这一工作上，首先要从教育家的立場出發来鑒定字母表中的字母符号，估計到兒童的年龄。

最后我認为，如果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員会，或是在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里成立一个專門委員会来进行关于字母表基础問題、新創文字中字母的手写体和印刷体的形式問題等的諮詢工作，那將是很理想的。这样的字母問題委員会应該是有威信的，它应該包括科学研究的和实踐工作的工作人員——教育学家、心理学家、語言学家、書法家和印刷業專家。这个委員会一定能对兒童和成年人的書法学習作出指示，能确定新文字中字母印刷体和手写体的規格和最大限度的字母数目，确定印刷厂排字盤的規格，打字机和打字排鑄机的鍵盤等。因此，任何預定实际使用的字母表，在提交中央領导机关最后通过时，最好經过專門的字母問題委員会的特別加工和审查。(1957. 6. 18. 青島)

(吳乐 譯)

语文短评

284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缺乏养猪的积極性，不能积極地节約粮食，用作飼料，并广泛地采集青飼料，补充飼料的不足，因而影响了生猪的减产。（人民日报1957年3月1日1版）

如果把这句話末了的“减产”换成“增产”，意思还是一样，可見这里有問題。“影响了生猪的减产”是把“影响”当“使”講，“影响了生猪的增产”是把“影响”当“妨害”講。这兩种用法的“影响”现在都常見，但是严格說都是不足为訓的。作动詞用，“影响”的正确意义是“使…受影响”。虽然这个影响多半是不良的影响，但是动詞“影响”的宾語只应該是一个中性的字眼。上面这句話的正确說法是：“因而影响了生猪的生产。（程好問）

285 这就是苏联經驗被称为先进，因而可貴之处。（北京日报1957年3月20日2版）

“因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这里的問題是：还是因为被称为先进所以可貴呢？还是因为可貴所以被称为先进呢？显然后一种說法比前一种說法通顺些。但是还可以再进一步研究。無論采取哪一种說法，“苏联經驗…”在这里都是全称肯定，这还是不够精密的說法。应該說：“这就是苏联先进經驗之所以可貴”（“苏联先进經驗”不等于“苏联經驗”）。（程好問）

286 代表大会着重指出，作为新中国的学生，应該…繼承我国学生优良的革命傳統，清除对資产阶級所謂“民主自由”的影响，为建設祖国刻苦学習。（北京日报1957年3月22日1版）

这又是滥用“对”字的一例。誰对誰的影响？是一部分学生对資产阶級所謂“民主自由”的影响，还是資产阶級所謂“民主自由”对一部分学生的影响？删去这个“对”字就通了。（程好問）

287 我忍不住不把心中最大的激动，告訴給在全国各地的青年…。（最新編解放軍小学語文課本第6册17頁）

1）“忍不住”对于底下的行为来說只起肯定作用，如：“我忍不住把他打了”意思还是“打了他”。这里的“忍不住不把…”中“不把”的“不”对全句起了否定的作用，不能用。如要强調語气可改为：“我不能不把…”。2）“在全国各地的青年”，应去“在”字。（黄德賢）

288 我們說：你們反击得好！在反对社会主义言行的斗爭中，我們已結成亲密的战友。（人民日报1957年6月23日3版）

应該是“在反对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斗爭中…”。这个“反”字很重要，不应該漏掉。（陈雨萌、周恩元）

289 旧社会被称为“店小二”、“跑堂”和“女招待”的旅館、飯店服务員，而今天人們对这个行業的看法完全不同了。（新华日报1957年3月4日4版）

1）前面說“旅館、飯店服务員”，說的是人；后面說“这个行業”，說的是行業。必須統一起来。2）旅館和飯店是兩种行業，不能用“这个”。3）“而”字不但無用，而且把上下隔断。4）“旧社会”应改为“在旧社会里”。全句应改为：“在旧社会里被称为‘店小二’、‘跑堂’和‘女招待’的旅館、飯店服务員，今天人們对他們的看法完全不同了。”（赵宁滁）

290 过去我在上海曾看到过一些定期的叫《新文字》的刊物，但过去主要是在極小部分的学生知識分子中进行的，而且当时也沒有很顺利地推广。（拼音1957年6月号44頁）

1）既然有專名，看来就不是一些刊物而是一种刊物了。2）“进行的”和“推广”的是什么？沒有交代清楚，跟前一分句中的“刊物”連不起来。根据上下文大概指的是新文字，但新文字可以“推广”却不能“进行”。3）“学生知識分子”也叫人难解，可能是“学生和一般知識分子”。全句試改为：“…一种叫做《新文字》的定期刊物，但是这种新文字当时只在…中傳播，沒有大规模地推广”。（伍均仁）

291 工农速成中学畢業生学过的語文課本和普通中学不完全一样，为了照顧这种情况，本大綱所选課文里有八課同时列举兩篇課文，这八篇課文中沒有标上星号“＊”的是普通中学畢業生学过的，标上星号“＊”的是工农速成中学畢業生学过的，考生在复習这八課課文时，可以根据自己学習情况任选一篇进行复習。（195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試大綱封面2）

原意是有八課課文，每課中各列举兩篇，課文合起来共有十六篇，考生可以根据自己学習情况任选其中八篇复習。但在上列一段話中，讀者很难領会这些意思。原因是数量詞配合得不当，如：“这八篇課文中”应該是“这八課課文中”或“这十六篇課文中”。其次是說明含糊，如：最后的“任选一篇进行复習”应該是“在各課列举的兩篇中任选一篇…”或“任选八篇…”。（姜象城）

292 一提起笔，我就好像看見你們的充滿朝气的臉，發光的眼睛和响亮的、快乐的声音。（巴金：《大欢乐的日子》11頁）

“声音”只能听見，不能“看見”。应該在“眼睛”后加逗号，把“和”改做“听見你們的”。（西旁）

293 船槳忽上忽下的拍打着水面，發出紊乱的节奏声。（蜜蜂1957年6月号32頁）

有节奏的声音就不会是紊乱的，如果是紊乱的声音就不会是有节奏的，兩者用在一起有矛盾。（賈双虎）

294 … 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感覚到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覚。（人民日报 1957年5月2日社論）

"感覚到有…的感覚"不妥。"感覚到"三字应删。（孙中盈）

295 从右派分子所暴露的和别人所揭發的材料看来，許多右派分子的錯誤，已經不簡單的是什么思想認識問題…。（学習 1957 年 13 期社論）

1）"簡單"和"單純"的意思不同，前者是不复杂的意思；后者是完全的意思，这里应該用"單純"。2）"錯誤"之后的逗号应删去。（顏如南）

296 我們是一个以發表創作为主的文学刊物…。（萌芽 1957 年 12 期編者的話）

按"我們"指編者，但是編者不会"是"一个刊物。应將"我們"改为"本刊"。（孙建謨）

297 … 这些問題都是农業合作社以前所沒有的。（教师报）1957 年 5 月 3 日 4 版）

表示时間的"以前"、"以后"等詞都只能跟动詞連用，不能跟名詞連用。"农業合作社"应改为"农業合作化"。（叶俊夫）

298 高等学校去年計划招生 17 万人，今年减招 10 万 7 千人…。（文汇报）1957 年 3 月 20 日 3 版）

今年招生数字是 10 万 7 千人，如果用"减招"兩字就只能說是"减招 6 万 3 千人"。应把"招"字改为"为"字。（蔣蔭枬）

299 … 同时使人感到，作者对那些善良而缺点的人們的批判，做得極有分寸感，并不过分。（人民日报 1957 年 7 月 13 日 5 版）

1）"缺点"不能和"善良"并列作形容詞用，应在"而"字后面加上"有"字。2）"分寸感"是人的感覚，是自然产生的，不能是做出来的，这里"感"字应删去。（东川）

300 实际上，答复这問題很簡單，"無罪者的言者無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光明日报 1957 年 6 月 28 日 1 版）

"無罪者的言者無罪"直譯为"無罪的人的說話人無罪"，不成話。很显然，"無罪者"的"者"是贅疣。可改为"無罪的言者無罪，有罪的言者还是有罪的"。（舒市丙）

301 这是詩人的第一本革命詩集，它記录了詩人的新的里程碑。（文学研究 1957 年 2 期 103 頁）

"記录了…里程碑"，不妥，因为里程碑是不能被記录的。应改为："…它是詩人前进中的里程碑。"（孙建謨）

302 听說啦嗎？林則徐这趟差使办的不錯呀！（人民文学 1957 年 5.6 月号 33 頁）。

"啦"（音 la）是"了"和"啊"的合音詞，"啊"和"嗎"不能同时用，这里"啦"应該改为"了"（音 le）。（弘今）

303 这一段經典性的指示，就具体說明了語言的起源是由于人类在集体劳动中，需要互相交际、交流思想、交換生产經驗而創造出来的。（濮之珍：《語言》17 頁）

"語言的起源"是不能被創造出来的，被創造出来的是"語言"。应去掉"的起源"三字。（黄德賢）

304 民盟市委副主任委員陈望道接着發言說：陈望道認为这几天大家对右派人物發表的荒謬言論展开严正的批駁，很有必要…。（解放日报 1957 年 6 月 17 日 1 版）

既然是"陈望道接着發言說"，底下就只能是他的話了，为什么还要来个"陈望道認为"，应去掉。（陈大堯）

305 美国还在加强蔣軍援助（中国青年报 1957 年 6 月 12 日 4 版标題）。

应該是："美国还在加强对蔣軍的援助"。（袁汝临）

306 新的团章，根据当前新的形势和几年来团的建設經驗，比过去的团章作了許多重要的扩充和修改。（中国青年报 1957 年 5 月 25 日社論）

由"比"組成的介詞結構必定作形容詞的狀語，現在作了动詞"作了"的狀語，不妥。"比"字可以改为"对"字。（賈双虎）

307 据估計，开展上項業务后，可以占整个業务20%。（新华日报 1957 年 2 月 24 日 2 版）

"占"字需要主語。应把"开展上項業务后"改为"上項業务开展之后"。（赵宁渌）

本欄啓事

1）报刊上的短評材料，1957 年 1 月 1 日以前的請勿寄来。短評材料的句子必須写全，請勿用省略号省略，以便审閱。
2）出处如果是書籍上的，必須写明原書作者、出版日期和頁数；如果是报刊上的，必須注明版数或頁数。
3）流通不广的报刊上的短評材料，除非它的錯誤有示范性，一般不用。来稿請先留底，本刊用与不用，一律不退。

书刊评介

《汉語詞彙》，孙常叙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一版。32开，493頁，定价2.30元。

解放以来，語言科学方面出版的著作以講語法、語音的較多，全面講論汉語詞彙方面的專書几乎等于空白。现在孙常叙先生以兩年的功夫写出了这部近五百頁的詞彙專書，这个創举应該是我国語言学界所欢迎的。

这本書是作者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語文函授班用的講义，是在教学实踐中經过不断的修改才正式出版的。全書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講"詞"，从詞的性質和結構，談到詞义的性質、發展和轉变，再从造詞的几种基础說到各种造詞方法以及汉語造詞法中的新旧質。第二部分講"詞彙和基本詞彙"，在全書中所占分量最大，除了談到汉語詞彙的一般性質和發展外，用了很多篇幅講汉語的基本詞彙。第三部分講"詞彙音变"，除了談些音变的現象和种类以外，主要是以东北方言和普通話的詞例对比来講些"造詞音变"和"說話音变"。把这方面的現象提到詞彙里来談，的确如作者在"叙言"所說，"这还是一个尝試"。

作为一部教学講义来看，这部書确有許多長处：首先是作者以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說为指导思想，在对詞和詞彙的性質以及詞彙發展規律等等的看法上，介紹了許多先进的語言学理論。其次是在談汉語古今詞彙的發展历史上，相当广泛地运用了我国語言学遺产中若干有力的論証，特别是在文字、音韵、訓詁方面兼收并蓄，显得材料十分丰富。此外，材料安排条理清楚，叙述明白易懂；更結合着語文教学中在詞彙方面經常遇到的一些問題，如同义詞的分析、錯别字产生的原因、有音無字、語义色彩，等等，都从理論上、实例上予以闡述。应該說，这些都是本書的特色，特别值得向語文教师和一般語文工作者推荐。

当然，如果作为"汉語詞彙学"来看，無論在全書体例上、在引証材料上，以及在个别問題的看法上，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誠如作者在"叙言"中所說，"汉語詞彙学的建立是我国既有語言研究的恢复和光大，也是我人民中国語言科学中的一个創举"；"汉語詞彙研究在我国語言科学中是最老的一个，也是最年輕的一个"。正因为这样，作者很謙虛地以"小学生"自居，甚至把自己的这"初步研究"說是向語言学家、語文工作者"問学的'贄礼'和發言提綱"。作者这种治学态度和虚怀若谷精神，确是年青的語言科学工作者应該学習的。

詞彙学本是普通語言学中一个部門，它的范圍相当广，講詞彙不能不牽涉到語源学、語义学、語音学等等方面。在需要以汉藏語系的研究为基础来建立我国的普通語言学的今天，要講汉語的詞彙学确是相当困难，因为这方面有許多根本問題现在还沒有很好地解决，比如詞的界說、汉語的基本詞彙、詞根、形态和構詞法，等等，目前都还需要深入的研究。本書在这些方面所講的只是作者自己的看法和研究的成果罢了。

现在仅就全書体例上說，有些地方似乎超过了汉語詞彙学的范圍，而是在講汉語史，如第二部分的第十三章里以很多篇幅講汉民族和民族語的形成問題。講詞彙發展和結構固然离不开語音，可是作者在第三部分全面地来談音变問題并大談方音和普通話的对应关系，这就显得有畸輕畸重的毛病；尤其是把屬于語調的"說話音变"也列入專章。因为与其費这么多篇幅来談語音学基础知識，就不如另設專章来好好談一談"复合詞"和"合成詞"，不必要等以后再补充。

作者写这部書，确实想要把"字"和"詞"、"字根"和"詞根"区别开，并强調說兩者不应混淆；可是实际講起来，在許多例証方面令人觉得还是有混淆的地方；而且談这問題，过多地依靠了文字学、訓詁学。整理并别出前人所著文字、音韵、訓詁專書中某些有关語言的詞彙材料，从而找出汉語詞彙發展的綫索以奠定汉語詞彙学的基础，这是当前必要的工作；但是必須摆脱汉字的蒙蔽和文字訓詁的羈絆，才能很好地談詞和詞彙。比如在講"詞的結構"一章，作者說，"一个詞的詞素划分就不能完全依靠古汉語構詞法基本特点的音节和汉字来作标准；相反的，应該用依以成詞的構詞素材的語音性質来定"。这話是对的，可是作者把"六書"里字的演变同詞的演变混起来談，說"'謎'是从'迷'派生出来的"，"迷"是"謎"的詞根，却又說"米"是"迷、眯、醚……"的詞根（25頁），这就把"詞根"的意义弄得很玄。另外，在378—394頁中談基本詞部分，也是把"字"和"詞"弄混了。又如，举"草、艸""射、䠶""葡萄、蒲桃"等例（187頁），既然說是同一詞的不同写法，却又說前者是现代汉語詞，后者是古汉語詞。同时，作者在第二部分里，在看待汉語發展上，通篇都表现出似乎忽略了历时的語言学观点，割裂古汉語与现代汉語的历史繼承性。不区别什么是古汉語的詞、什么是现代汉語的詞，固然不对，可是也决不可能判然划开，有誰能够因为"天、大夫、暴露"等等是古代已有的詞，就說它不是现代汉語的詞呢！

这里对如此广博的一部書，不可能詳細来談，只能"尝一臠而知鼎味"地說說。此外，作者在运用术語方面很不够細致，也足引起讀者混乱。如"詞素、詞身、詞干""詞尾、后綴"等等，怎样区别，都說得不够清楚。（劳君方）

《普通話語音基本知識》，吳朗編写。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第一版。32开，97頁，定价0.22元。

本書是講解普通話語音知識的通俗讀物，有下面几个优点：

一、对某些問題的解释說明能以通俗明确的語言、淺近确切的比喻，把一些叫人常感困惑的道理說得淺显易懂。如本書講發音方法时，把三类复母音的發音，概括为"头重脚輕"、"头輕脚重"、"兩头尖尖肚子大"，这就能使初学的人易于掌握。又如講口腔制造母音要开动三部机器，第一部是舌头，第二部是嘴唇，第三部是下顎。这种講法通俗易懂，使人感到新鮮有趣。

二、書中收集了許多指导發音的具体方法，也有些是編者自己的經驗。例如学習北京四声的問題，本書提出学習的五

个步驟(75－77頁),就是非常具体切实的。其次,本書又能举一些能令人信服的道理，帮助讀者克服学習中的思想障碍。例如有些人錯誤地認为他“根本不能發这个音”，但編者巧妙地拿口技来說明人类發音器官的灵巧,指出并不是不“能”發,只是現在还不“会”發而已。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編者“后記”中說的“通俗、有趣”这兩个目标，是大体达到了的。但是这本書也有不少缺点和錯誤，而且有些是錯得相当严重的。

第一,知識的錯誤

本書列举的5条区别母音子音的标准中,第一条是“声帶顫动的,也就是能唱的,叫做母音;声帶不顫动,也就是不能唱的,叫做子音”(13頁)。这里包含兩点錯誤:首先,声帶顫动不顫动,与能唱不能唱是兩回事,不是一回事。声帶顫动的并不都能唱,子音中濁塞音是声帶顫动的，但不能唱。其次,声帶顫动而且能唱的也不全是母音，濁擦音和鼻音也有能唱的性質。

本書講iu、ui兩个韵母省去中間的o、e时說: i跟ou相拼不等于iou相拼,而等于iu相拼; u跟ei相拼，不等于uei相拼,而等于ui相拼(21—22頁)。其实这兩个韵母發音时,并不是任何时候都省去中間的o、e,省与不省，决定于声母和声調。拼音方案所規定的写法,不过为了整齐划一罢了。本書講到介音i、u、y跟鼻韵母en、eng的拼音时,說它們相拼要省略掉当中的e，并解釋为“为了标記語音的眞实情况”(37頁)。其实，in、ing、yn、yng四个复合音，根本不是从“i＋en”等等来的,本来就沒有e在里面,談不上什么省略;而un、ung則同iu、ui一样,其中的过渡音e有省有不省。二者不能同等看待，作者在这地方把拼音方案同注音字母的拼写法混为一談了。当然,有些过于瑣細的变化,也許不宜于在这样一本通俗性讀物中講述，但編者把拼音方案規定的形式一概当作眞实的語音的标記,这也未免太簡單化了些,就不可能指导讀者正确地發音。附帶說一点,本書用的字母是“完全遵照”(內容提要)修正案第一式的，而修正案第一式正是把iou、uei、uen、ueng作为“基本式”，不知本書为什么却沒有給它們以合法地位。

第二、講述方面的矛盾和錯誤

本書把j、w当作子音看待,把j、w开头的音节划在零声母之外,以求“形式上的統一”(51頁);这也未始不可以。但本書在处理这个問題上却出了不少漏洞。在拼音表中，j、w开头的音节既然不算零声母,似乎就应列入开口呼。但本書开口呼拼音表(55頁)中只列入了jo jai兩个已經“無声無息地死亡了”的音节。至于ja、wa等常用的音节,却仍然分别列在齐齿呼、合口呼兩表里。与一般書上不同的只是它們的声母不是“零”,而是j、w，这显然有了矛盾。按照这表来拼，j同ia相拼是“呀”,w同ua相拼是“蛙”,豈不奇怪?可是更奇怪的是編者在四个表的后面，还有这样的总說明:“表里的声母同韵母拼起来,就是那个音节的写法,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憂”不能写作jou,要写作ju”(58頁)。这就是明确宣布“呀”应当拼作jia,“蛙”应当拼作wua了。这些地方未免过于粗心了。

本書講声韵拼合問題时說: zh、ch、z、c等音素独立表示一个音节时,要在后面加上i(ㄭ)这个母音，如果后面另有别的母音,就不要再附加这个i(ㄭ)了(30頁)。这种說法显然是錯誤的。“知吃資雌”等正是因为有了i(ㄭ)这个母音才能成为音节的。而zh、ch等与其他韵母拼合时，則根本沒有i这个母音存在。这是發音問題,并不只是書写形式問題。

第三，材料取舍的不一致

如講an、en、ang、eng 4个音时，詳細分析了开头的a、e与單母音的a、e發音不同(35頁);但前面講ei、au时，却根本沒提其中的a、e与單母音的a、e有什么不同(19頁)。講r时說它是“濁音”;但講m、n、ng、l时却沒提到它們是濁音。

第四，用語上的混乱

在术語的运用上，本書簡直沒有什么标准。有的术語很專門,編者却当作普通的詞来用而不加任何解釋。如11頁“这24个字母可以按照音位的道理标記北京語音的32个音素”,这里是第一次出現“音位”这个术語，可是沒有片言只字的解釋(按:这句話本身也有毛病)。其次,也有对同一事物而用的名称不統一。如8頁發音部位圖用的是“齿齦”这个名称,但后面講d、t、zh、ch等子音的發音时却不用”齿齦”而用了“上牙床”(24、28頁)。(按: d、t与zh、ch發音部位是不同的,但本書都說或是舌尖与上牙床。)講到sh的發音时，又用起“齿齦”来(39頁)。同一个詞語前后涵义不同的也有。如講b、p、d、t、g、k一类的發音时,說b、d、g三个音是“爆發”出来的,p、t、k三个音是“噴射”出来的。但最后总結这六个音的發音要領时,却說它們的發音部分作兩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阻塞，第二阶段是爆發，这样p、t、k的發音就与前說發生矛盾了(24、25頁)。同一个詞只隔着几行意思就变了，这叫人怎么捉摸呢?

第五,特别应該指出的是,本書有些指导發音正音的表里有着大量的錯誤，以最后的古入声字四声分配表錯誤最多。这个表大概只是把《国音常用字彙》中标出的入声字抄出，略加删减整理而成(从字的次序上可以看出)，但編者仍然弄出了不胜枚举的錯誤和混乱: 1)字的取舍簡直是完全任意的,好些連《新华字典》都不收的冷僻字也收了(如譽、隲),但許多常用字却沒收进去(哭、殖、卓、結、拍等)，甚至有的整个音节的字被遺漏了,据我初步檢查(不是核对)，仅包含常用字(指3500常用字)的音节就遺漏了14个之多。如陰平的“da搭”,陽平的“huo活”,上声的“suo索”,去声的“gy剧”等。2)有些字字音和字調弄錯了，如列入上声的“kye雀鵲…”等九字,应該是去声;列入陰平的“zhuo拙”应該是陽平，陽平gie音下的“吉…寂”等16字应該是gi音。3)有些一字多音的字,有的收讀音，有的收語音，有的收又讀。音不同意义也因之不同的多音字,虽然兩音兼收也不加注明(这样讀者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該念什么音)。有的甚至收个别情形下的讀音而不收通常的讀音。4)注音全依《国音常用字彙》，未用較新的材料(如《新华字典》《常用汉字拼音表》等)加以校正。如“撮”《字彙》作去声,而《新华字典》和《拼音字表》皆作陰平，等等。还有些拼写上的疏忽(ia应作ja,zo应作ze等)和排印上的錯誤。不難設想,如果讀者拿它作为正音的依据(作者的用意正是这样),那是会吃大亏的。(王士襄)

《广州話淺說》,王力著。方言知識叢書,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3月第一版。32开,108頁,定价0.42元。

像《江浙人怎样学習国語》(現在改名为《江浙人怎样学習普通話》)一样，王力先生的《广州話淺說》也是一本开創的著作。前者(連同他的《广东人怎样学習普通話》)成了以后許許

多多的«××人怎样学習普通話»的小册子的先驅。这些小册子在推广普通話的运动中起着一定的积極作用。«广州話淺說»的用途剛剛相反,是給不懂广州話的人介紹广州話的通俗小册子。这种学習汉語方言的手册,至少有兩种人需要:一种是外地来的幹部,他們到了某方言区,为了工作的需要,迫切要求学習当地方言,而苦于沒有适当的手册。另一种是語文工作者,他們或者是为了調查方言,或者是为一般地研究汉語(包括汉語史),都希望获得各地方言的材料。关于方言材料,过去除正規的方言調查报告以外(其数目寥寥無几),就得算外国人編的手册和詞典以及地方出版的韵書之类。外国人編的手册和詞典的优点是标音(虽然还很不够),但是缺点是很多的:不科学,有許多錯誤,內容陈旧不适用(很多是跟資本主义商業或宗教有关的),往往沒有汉字,等等。一般人也受文字和价格的限制,买不起,看不懂;而且难找。当地出版的韵書和字彙之类,旣沒有标音,也沒有解說,只适合已懂該方言的人閱讀,对外省人和一般語文工作者用处也不大。

«广州話淺說»就是基本上克服了上述缺点并保存上述优点的書,虽然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作者說,本書的用处有四点:外省人可以通过它学習广州話,广州人也可以通过它学習普通話,对于方言調查有参考价值,小册子所用的拼音字母可以作为將来拟訂方言拼音方案的参考(作者認为为了輔助普通話的推行,方言的拼音方案还是用得着的)。

我們希望有許多的«××話淺說»、«××方言淺說»一类書陸續出版。光是在汉語的研究上,就会給我們增加許多宝貴的材料。从这一点来說,王力先生的«广州話淺說»也可能成为同样內容的許多小册子的先驅。

关于本書的內容,这里不想多作介紹。跟外国人編的手册不同,本書从汉人已經掌握的知識(汉字、語音对应規律等)出發,从北京音推出广州音,它的原理跟«××人怎样学習普通話»是一样的。除了对应規律之外,还說明了广州音的一些特点和各地方言区的人学習广州音时的不同注意点。此外,还有許多練習題。汉語研究者也可以在这里發現一些特殊的材料,比方广州話的名詞变調(32—37頁),也許就是構詞的一項形式标志。

本書也还有一些缺点。首先是語音的比重太大(占80%),語法和詞彙的比重太小(20%)。现在一般流行的看法是方言的差异主要在語音,而語法詞彙差别不大。这种看法不管正确到什么程度,可是应用它来編写«××話淺說»总是不妥当的。«××話淺說»主要是教人怎样說××話,听懂××話的。能够把一个个汉字念出广州音,并不等于会說会听广州話。在詞彙方面,当然不能一对一地把普通話詞彙改用广州音唸出来就算广州話。哪些詞可以改唸,哪些不能照改,而需要用特殊的方言詞,这是不能类推的。需要有專門的篇幅介紹,那怕是最主要的特殊方言詞。缺少这些基本的詞,眞是寸步难移,造句也会發生困难。比方"动"只能說成 juk[7],說 dung[6] 就难于使人明了甚至不懂。本書虽然在語音部分附帶举了一些方言詞,在文章举例中也解釋了不少的方言詞,但是总嫌不够系統。至于語法方面,情况也是一样。在文章举例中作了一些語法的說明,也还不能給人一个語法的輪廓,因为讀者还需要从文章和各个注解中去归納語法条例,而这項工作只有作者才能做得好。因此,語法部分应該有独立的一章,那怕是很扼要的。

此外,全書的注音工作做得不徹底。練習和文章举例中許多汉字沒有注过音,文末又沒有注音檢字表,叫外省人怎样念得出来呢?文章举例中沒有詞儿分写,外省人也很难看汉字就正确地分出詞来。这样一来,本書似乎更适合于做課本(有人教)而不是自修讀本了。

关于声調方面,缺少五度声調音标。这种音标現在已經相当通行,由于它形象化,也許比一堆文字說明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更解决問題。为了簡易起見,三个入声的号碼(7、8、9)很可以用1、5、6代替,而兩个变調的号碼(10、11)可以合并为一,因为在發音的感覺上,1=7,5=8,6=9,10=11,后面的声調都是入声,調位可以在入声收尾中表現出来。这样一来,可以把11个調簡化为7个調,对学習者是有好处的。

当然,因为本書是开創的工作,我們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只希望在不断的补充中而臻于完备。(力山)

«汉字改革講話»,余心乐編写。江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第一版。32开,40頁,定价0.13元。

«汉字改革»,郑林曦著。新知識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32开,58頁,定价0.18元。

«汉字和汉字改革»,周鉄錚編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32开,48頁,定价0.16元。

«汉字改革的理論和实踐»,張世祿著。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32开,66頁,定价0.28元。

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刊物和报紙上刊載过一些反对文字改革的言論。反对者有的是高級知識分子或文字学專家,反对的意見中有些看来是有理由的(虽然这些理由并不充分),但是不中肯的居多,甚至有些是錯誤的(不包括右派分子借反对文字改革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这种情况一方面說明了文字改革这樁大事情不仅还有許多群众不了解,就是許多知識分子甚至文字学專家也还陌生;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关于文字改革还得多方面进行宣傳工作,还得进行深入的研究、討論。因此,我們認为上面这四本談汉字改革的小册子的出版,無疑地对文字改革的宣傳工作將起到一定的良好作用。这些書是值得欢迎的。

这四本書共同談到的內容大致有以下各項:汉字在历史上的作用、汉字的优点和缺点、汉字为什么必須改革、汉字改革的可能性、汉字的簡化以及汉字改革的方針和步驟等。

下面再分别將各書簡單介紹一下。

«汉字改革講話»,这本書写得比較淺显、通俗,只是在許多重要問題上講得不够透徹。書末附有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簡化表和汉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字母表等。本書旣可使人得到一些汉字改革的常識,又有可供随时查考簡字和拼音字母之用,这对农村小学教师頗有帮助。但是,內容方面有几点要請讀者和作者注意:

1)本書第16頁里說:"英文打字每分鐘最快能打90个字,而汉字每分鐘最快只能打32个字。"这一段話很容易使人發生疑問,所謂英文90个字是指的90个字母呢,还是90个word?或者是90个相当于汉字的音节?这三者之間差别極大,如果說只是90个字母,那就值不得比較;如果是指90个音节或word,就应該說明是怎样計算的。否則讀者無法看出拼音文字好在哪里。

2）第19頁里說：“在汉字改革过程中只有讀書識字的人会暫时感到不方便，但他們掌握了新文字以后还是会感到更方便的。”应該指出的是，宣傳汉字改革的讀物，这样提法不妥当，因为不符合实际。本書最末頁曾引用了吳玉章先生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議上的發言：“…一方面逐步推广拼音文字，另一方面汉字繼續照常使用，这样对于認識汉字的人就不致發生困难。”显然作者对这段話沒有很好領会。其实郭沫若先生也說过：“…必然还有一段相当長的时期，讓汉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平行使用，在新文字的逐漸推广中而讓汉字在大多数人民的日用中逐漸归于退隐。”因此，我們認为知識分子用不着考虑文字改革对自己是否方便，宣傳文字改革者更有必要特別說明这一点。

3）第22頁里說：“我們要知道拼音文字是把一个詞的音节連写在一起的，拼音文字里头的一个字就是一个詞。比如‘艺’‘义’‘誼’‘忆’在口語里一般都不單用了，在拼音文字里要和別的字連写在一起，如‘艺术’‘意义’‘友誼’‘記忆’之类。”（着重点系本文作者加的）这里談到的“字、詞、音节”很含混，比如“一个字就是一个詞”究竟怎样理解？“…和別的字連写在一起”这里的“字”跟前后所說的“詞、音节”有什么关系？

4）第22—23頁說：“…使每一个詞的音节固定下来也就是使每一个詞定型化了，…人們再不会在詞和仂語的界綫上搖摆不定了。”作者認为詞的音节固定了詞就定型化了，因而詞和仂語的界綫也就明确了。事实上問題并不这样簡單。从本書这段話的前后文看，作者所說的音节固定，就是指“連写”。其实拼音文字里的“連写”并不只限于詞，仂語和詞都可作为“連写”單位。連写和划分詞兒虽然密切相关，但畢竟是兩回事。在拼音文字里哪些音节应当連写，哪些可以分写，这类問題正待研究，过早地下斷語不太妥当；而且就这書的性質来講，也可略而不談。

《汉字改革》是新知識出版社出版的《汉語知識講話》第三組文字部分的一个分册（另一分册是傅东华的《汉字》，本刊五月号《書刊評介》有介紹）。这是几本談汉字改革的小册子中写得比較全面的一本，本書不仅从消極方面指出了汉字的缺点，也从积極方面介紹了拼音文字的好处；又分析了人們对汉字改革的思想顧虑；正确地介紹了拼音文字的历史情況和国家对文字改革的方針和步驟，特別是拼音文字推行的步驟。这些叙述是本書比較突出的部分。本書的讀者对象本来是一般中学汉語教师和幹部，我們認为除了这些对象之外，無論是反对或拥护文字改革的人，都可以参考一下。

《汉字和汉字改革》的內容分兩部分，前部分介紹汉字的一般知識。跟別的几本比較起来，本書闡述文字跟語言的关系要詳細些。談现行汉字的各种字体这一章，为別的書所沒有。后一部分談汉字改革比較簡單，这也可說是本書总的缺点。

本書叙述甲骨文發現的年代跟一般記載略有出入。据有关甲骨文的書籍，都是1899年（清光緒25年），本書（13頁）为1900年。不知是否有意化零为整便于讀者記忆，或另有所本？

本書附有勘誤表，但仍有較显著的錯誤，如36頁第7行的“lù”实应为“lỳ”。

《汉字改革的理論和实踐》，本書談到文字和語言的关系，列举了十大理由說明汉字必須改革；强調汉字本身不能發展为拼音文字，主張必須采用国际化的拉丁字母来实現我国文字的拼音化。总的說，內容还充实，論点也很正确。只是本書从《引言》一直到最后的章节，都貫穿了批評唐蘭先生对文字改革的主張，这种处理方式似值得考虑：因为从《引言》所要求的內容看来，这些議論很难适合一般讀者要求；而且唐蘭先生的論点最近已有补充和修改。我們認为在介紹文字改革知識的小册子里是不宜采取着重批判个別專家的个別論点的方式来論証問題的。（張朝炳）

《汉語語法》，郎峻章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55年2月第一版。32开，定价0.70元。

作为一本教科書，这本《汉語語法》（东北师范大学函授講义）有它一定的优点。它着重在語法規律的說明，內容比較精簡，句法和詞法的比重比較适当，章节的安排也較有条理。因此在近年来缺乏語法教科書的情況下，它受到了讀者的欢迎，在語法教学和学習中起了一些作用。

但是本書在体系和解說方面很有一些不恰当的地方。我們除了同意《語文学習》去年4月号上雍庸等八位同志的批評以外，提出下面几点补充的意見。

一、作者講复音詞的構成时說：“弟弟、餑餑、紛紛”之类是“把一个詞重迭起来說”；“韮菜、松树、鯉魚”之类是“在表示小类名的詞后面加一个表示大类名的詞”；“庆祝、水土、动靜”之类是把兩个詞合在一起；“白菜、盲从、动員、注意”之类是用一个詞修飾或者支配另一个詞（頁9）。姑且不論这种大詞包括小詞的說法是否同“詞是最小的独立运用的單位”这个定义（頁7）相抵触，單就作者所举复音詞的例子来說，它們的構成部分（一般認为詞素而作者認为詞的）就有好些是不能独立运用的。

二、作者說：主語是一句話的主体，謂語是說明主語的动作、性狀或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的；主語說的是“什么事物”，謂語說的是那个事物“怎么样”；說了什么事物，又說了那个事物怎么样，我們就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思想（頁22）。又說：謂語如果是由及物动詞充当的，那就必須有一个接受它的动作的詞（宾語），听的人才能滿足。宾語也是句子的基本成分（頁23—24）。又說：如果謂語是由“是、为”这类动詞充当的，那它就需要有一个表語来完成它的意思。表語也是句子的基本成分（頁24）。这些說法有几个地方發生問題。1）有些句子既然要有宾語才能使听的人滿足，或者要有表語才能完成它的意思，可見單說主語和謂語不一定能够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2）謂語是由及物动詞充当的句子，不是非有一个接受它的动作的詞不可（省略句）；在这种句子里面，一个接受它的动作的詞也不一定是宾語（被动句）。3）在“今天星期六”里，“星期六”是謂語；在“今天是星期六”里，“是”是謂語，“星期六”是表語。究屬是“星期六”說明主語，还是“是”說明主語？4）作者認为宾語和表語（与《馬氏文通》以来一般語法書中的表詞或表語范圍不同）是句子的基本成分，这不是从句子的結構着眼，而是从“完成句子的意思，使听的人滿足”着眼。这样，“形容詞性的附加語”和“副詞性的附加語”在一定情况之下也应該看作句子的基本成分。

三、作者說“他們男人都走了”里的“他們男人”是以“他們”为主詞、以“男人”为从詞而組成的主从短語；而主从短語里的詞，地位是不平等的（頁15—16）。下文提出同位語的名

称，說“指相同事物的兩个或者更多的詞和短語重迭起来使用”，其中做句子成分的叫本位語，說明本位語的叫同位語（頁55）。如果采取前一种說法，就不須要同位語这个名称（如張志公《汉語語法常識》認为“男人”是“他們”的补語）；如果采取后一种說法，就不应該把同位关系看作主从关系。

四、作者講“語序的变换”时說：“每一个民族語言都有自己的結構次序”，而变换語序“主要是为了修辞上的目的”（頁47）。作者沒有說清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語序在語言中起着語法形式或修辞手段这兩种不同性質的作用，同时它們的主次之分在不同的語言中往往也是不同的。汉語基本上是孤立語，汉語結構中詞与詞的語法关系主要以語序表达。語序主要的是語法形式，其次才是修辞手段；所以变换次序往往就导致語法結構的变化。如作者所举的例子“我們在教室里学習”換成“在教室里学習我們”，“我們”就由主語变为宾語。而俄語固然一般的說“我們学習在教室里”（Мы учимся в классе），但也可說成“在教室里学習我們”（В классе учимся мы）。所以对于俄語和其他屈折語来說，語序主要的是修辞手段，其次是語法形式（如 Хорошая погода 和 Погода хорошая，хорошая 在前是定語，在后是謂語）。

五、作者說：复句是由兩个或兩个以上的單句拼合而成的，我們管每一个这样的單句叫做分句（頁 66—67）。語言交际的單位是句子；句子，按其結構可以分为單句和复句兩种。一个复句跟一个單句一样，只是一个句子，因此它就不可能同时又包含几个句子。复句是一个句子，一个整体。它的各个組成部分（分句）在外形上虽然有点像單句，但它不是單句，因为它沒有作为独立句子的标志（完整的語調）和作用（語言交际的單位）。而且有关联詞語的兩个分句，有时是不能作为單句独立运用的，如“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們的党，但是党驅逐了暗害分子”（頁 74），因此它們只能是复句的組成部分。“人家怎么說，他怎么說”也不是兩个單句的合并，因为它不具备兩个疑問句的标志和作用。把复句看作一个整体有很大的意义，这样会使我們更加注意复句中各分句在結構上、意义上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从而揭示复句的实質和組合規律。但本書对“分句間的关系”（頁 67）的說明是非常貧乏的。

六、作者在講并列复句中分句間的平行关系时加了一个注解，說：“有的語法家管这种关系叫等价关系（黎錦熙：《新著国語文法》），有的管它叫并行关系（呂叔湘：《語法修辞講話》第一講），有的管它叫意合法（中国語文 12 期 27 頁）”（頁69）。所謂“意合法”（我們不批評关于它的理論是否正确），不是指分句之間的意念关系，而是指分句和分句結合时的手段——即不用关联詞語。因此用意合法結合的复句不限于平行句一小类，并列复句和偏正复句都可以有意合法。即如《中国語文》12 期 27 頁上出現“意合法”的地方有三处，其中的一处就是解釋“明天不下雨，我一定来”这个偏正复句的。而且关联詞語除連詞以外还包括某些副詞和別的詞語，因此“風息了，雨也住了”这个复句一般也不認为是用意合法結合的。在这里作者把关系和手段兩个概念混淆起来了。

七、正因为作者把意合法局限于平行句这一小类，所以其他关系的意合法就算作連接詞的省略，放在“成分的省略”里講。这也是不妥当的。首先，連接詞不是句子成分；其次，不用連接詞也談不上省略；最后，沒有关联詞語的复句，在不同的語言环境中有时还可以有不止一种的补法。（徐远）

編者的話

陈夢家發表了一系列的对文字改革問題的意見，計有：（1）2月4日在光明日报發表的《略論文字学》，（2）5月17日在文匯报發表（5月1日写）的《愼重一点“改革”汉字》，（3）5月19日在光明日报文字改革双周刊82期發表（3月22日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講演）的《关于汉字的前途》。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召开的文字改革問題座談会上，陈夢家也有發言，見《拼音》月刊1957年7月号。

現在陈夢家的右派面目已經暴露出来了，我們可以看清楚他發表这些文章的眞正意圖和所起的作用：（1）右派头子章伯鈞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統战部关于整風的座談会上發言曾經說：“陈夢家在文匯报上的意見，我部分地同意”。这該是指《愼重一点“改革”汉字》。右派分子为了反对党的領导，利用某些知識分子对文字改革的牴触情緒，不惜对社会主义建設和工农大众有利的文字改革工作进行恶毒歪曲，陈夢家的意見对章伯鈞起了支持作用。本期已有章駿同志的文章加以揭發駁斥。（2）《略論文字学》發表以后，有讀者关錫来信，由光明日报轉給陈夢家，陈夢家托人轉交本刊，我們把关、陈原信在六月号信箱里發表了。关錫信里的錯誤，我們有意識地暫时不加以批判，現在本期的《評关錫和陈夢家对文字改革問題的态度》和《反对歪曲和污蔑文字改革》的文章是广西和武汉的兩位讀者寄来的，已經对关錫加以駁斥了。（3）《关于汉字的前途》，文字改革双周刊84期以来已經有溫应时、梁东汉、高名凱、刘正琰、麦永乾許多同志跟陈夢家辯駁。当陈夢家講演沒有發表的期間，4月27日魏建功同志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做过一次百家爭鳴精神的講演，对一些反对文字改革的言論进行了辯駁，文中就有大部分屬于陈夢家的言論，現在商得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方面同意把魏建功同志的講演詞由本刊發表。文字改革問題可以展开討論，可以說理，但是党的領导和文字改革的方向，不应加以否定。我們覺得这是大家討論文字改革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信箱

对《海南島通訊》的意見

編者按：本刊1957年4月号發表了柏葦同志的《海南島通訊》以后，先后收到广东省教育厅普通話推广科和海南島崖县第二初級中学对这篇通訊提出意見的来信，本刊把来信送柏葦同志看过，請他作必要的解釋。这里摘要發表了广东省教育厅的来信和柏葦同志的答复。

編輯同志：

我們看了《中国語文》1957年4月号署名柏葦所写的《海南島通訊》，首先体会到柏葦同志希望推广普通話的工作能很快地在祖国各地大力开展起来，同样也在海南島大力开展起来。这种希望是和我們一致的。但是我們对《通訊》也有不同的意見。

1．我們認为柏葦同志所說的“我發現这里并沒有很好的开展过推广普通話的工作”是不全面的。据我們了解，海南島一年多来，曾經作了不少工作，尤其是在学校方面（以学校为重点）并不比我省其他地区（包括广州市）差，甚至做的多了些。比如自1956年上半年开始，海南行署文教处曾举办了中、小学北京語音講师訓練班各一期，各200多人，以后的每个寒暑假各县都先后举办过小学教师訓練班，有的县市如文昌、海口、定安等县市，90%以上的小学教师都受过訓練。中学、师范学校，大多数都組織了業余学習。至于在社会上各方面的工作，做的比較少，也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推广普通話，在各县、市并沒有專人管理，只是由教育科抽出一些时間照顧一下。教育科的同志少，任务多，不可能把其他工作放下来，在各方面大力推广普通話。因此，我們仅能要求在学校重点推广，再逐步普及。另一方面，要教育科的同志来說服領导同志講普通話也不可能，要他們来推动其他單位也不一定有作用。

海南島做了不少工作，为什么成績不显著呢？普通話还沒有市場呢？比广州差这样远呢？我們認为广州市的基础較海南島要好得多，而且广州人学習普通話比起海南人也要容易得多。因此，我們認为不能要求在一年多的时間，要海南島赶上广州市。

2．柏葦同志还說：“在学校里沒有一位老师是用普通話来向学生講課的”。这也不全面。据我們了解，尽管教师們有多少困难，也有一部分教师們开始用普通話教学了，只是各县不同，有的县多些，有的县少些。比如，海口市各中学的語文課已全部用普通話教学，其他科的教师也只有少数不能用普通話教学。学生大部分也能用普通話回答問題。小学一年級都教了注音字母，較好的学校已完全用普通話教学。当然这也是南腔北調，不可能都达到标准，但这对教师来講，已經是不知道付出多少心血，克服了多少困难了。琼台师范学校全体教师都已用普通話教学了，教学实習一律用普通話进行。崖县第二初級中学21位教师中有19位能用普通話教学。大多数学生已能听懂，有一半学生已經能說一些普通話了。其他县市虽然沒有这样好，但据我們了解，还沒有一个县不教学普通話的。

3．干部开会做报告不用普通話的問題，我們認为这不能决定于报告人，更重要的是要看大多数的听众是否能听得懂。海南島的干部大多数是海南人，在大多数人还听不懂普通話的时候，过早的用普通話作报告，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总之，我們覺得柏葦同志認为推广普通話已經一年多了，应該取得很大成績，这是主观願望，在实际工作中并不这样容易，尤其是海南这样的方言区。作为一个語言工作者，更应該了解这个道理。另外，推广普通話是長期的工作，也是一項思想工作，尤其在方言区，并不如柏葦同志想象的那样簡單。因此，我們認为一方面要积極地重点推广，逐步扩大影响，逐步普及；另一方面不要一听到方言就大惊小怪。

4．你刊發表这与事实不符的报道沒有什么好处，相反地，把海南区教师的辛勤劳动都一概抹杀了。也許你們的意圖是想通过报道引起他們对推广普通話的重視，但应实事求是，不应夸大或縮小。

敬礼　　　　**广东省教育厅普通話推广科**（1957，5，15）

柏葦对本刊的答复

編輯同志：

送来广东省教育厅的信看过了。

我沒有走遍海南島，只到过几个南部的县城，情況了解得也不够透徹，因此，信中所提“片面”的批評，我是应該接受的。

需要說明的是：在我到过的地方，的确是令人感到普通話的推广工作并沒有很好的开展（空气稀薄，最少也应該說是沒有大張旗鼓的宣傳）。某些地方学校里沒有一位教师用普通話講課，作报告全用海南話，这样的事实是沒有夸大的。当然，这种情形对于从大陆去的人会特别敏感一些。

我沒有一笔抹杀海南島推广普通話工作的意思，我只是就我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提出一点意見罢了。原来这篇东西是作为一篇“杂感”式的短文，用《不能这样“照顧”》的題目写成的；發表时由編者改为《海南島通訊》，就变成一篇报导了。

从《通訊》的要求来看，“不全面”自然应該尽量避免，因此，广东省教育厅的这一批評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也不能因为“不全面”，就說成“与事实不符”。

我想，这篇小文尽管不全面，既能引起广东省教育厅的注意，也就起了它的作用了。我衷心希望广东省教育厅进一步加强推广普通話的工作，使广东省的普通話“市場”越来越广闊。

敬礼　　　　**柏　葦** 1957，6，12

广东省方言試点調查經驗点滴

林运来

广东省教育厅于去年十月間訓練了一批方言調查幹部，今年一月間分别到汕头、韶关、顺德、兴宁、临高（海南島）等几个县进行試点調查。时間約一个来月，今年三月初回到广州进行总結。現在我就下面几个問題談談个人的体会。

一　發音人的选擇和合作

每到一个点进行方言調查，發音人的选擇是非常重要的。發音人是我們調查方言的桥梁。因此發音人必須具有一定的条件：1）方言純正，土生土長，能代表当地大多数人所講的方言。2）有高中畢業的文化程度，最好能懂得一些北京語音的基本知識。3）年龄在20—40岁左右。4）口耳沒有缺陷，沒有傳染病。5）在可能条件下最好选擇学校語文教师。严格执行选擇条件，对方言調查起着保証作用。但掌握条件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能过于呆板。

單重視發音人的选擇工作，而不注意和發音人合作，还不能保証搞好工作。方言調查工作是要兩方面合作的（自己發音自己記音除外），單靠記音人的积極工作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和發音人合作得好。应該多从工作着想，發揮發音人的工作热情和积極性，吸引他一同参加学習。在这方面，我們有几点体会：

1. 教給發音人一定的語音常識，这对記音有一定的帮助，但要講得通俗，少用語音学的术語，內容不要过多过深。比方有一位同志在記音中，偶而把 p' 記成 p，因为發音人懂得了这些符号，馬上就提出来叫他改正。

2. 尊重發音人的意見，向發音人学習。就某一地区的方言而論，当地人比記音人是懂得較多的。他們虽不懂什么調值、調类、塞音、擦音等术語，但他們具有相当丰富的感性知識。

3. 啓發發音人开动腦筋，思考問題。有时有些發音人不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責，認为只是發發音而已，常常照字讀音，很少开动腦筋。如有位發音人把"鱖"念成"厥"，这时記音人就应給他啓發，帮他理解字义，發出正确的音。

和發音人合作是方言調查工作中重要的一环。进行一个点的調查，約莫有一半的时間是和發音人合作进行的，如果这一工作搞得好，对全部工作將起很大的作用。

二　調查的方法和步驟

这次試点調查，一般做法如下：

首先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每到一个点，爭取当地領导重視，說明方言調查工作的意义。交代發音人的条件，通过教育科物色 1—2 位發音人，訂好工作計划，开始工作。

准备工作搞妥之后，先把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出版的《汉語方言調查簡表》中声調、声母，韵母和音系基础字記完，初步整理出当地方音的声韵調系統的基本輪廓（声母多少个、韵母多少个、声調多少个），接着記完單字表和詞匯語法部分，进一步檢查声韵調系統，补充完整。然后把所有單字轉記在卡片上（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出版的《汉語方言調查卡片》，也可自制）。最后利用卡片做好本地同音字表，然后从方音看北京音，（包括声韵調），找寻对应規律。

詞匯和語法可以在記完單字后接着記；也可以在語音部分整理校对完畢后再記。但我認为前一个做法較好。

記單字是全部工作的基础，它是归納音位，編同音字表和找寻对应規律的依据。如果單字記音不够准确，归納出来的音位可能有錯誤，找出来的对应規律也就不很可靠。因此必須細心审辨每个字音，运用严式音标（但归納音位时可用寬式），注意發音人發音器官的活动，特别对于一些容易混淆的音值，如 tsen—tsien，ts—tʃ 等更須要細心分析揣摸，千万不要憑自己的方音，主观地推测。每次記完音后，都必須抽出一定时間檢查一下工作，發現問題，如那些要下次改进；那些要吸取教訓；那些字音有問題須要校对等。須注意离开了發音人，千万不要隨便更改。

寻找对应規律要充分利用卡片。使用这种卡片，有許多好处，可以按声母排列；也可以按韵母或声調排列。（詳見金有景《怎样使用汉語方言調查卡片》，《中国語文》1957年3月号）如左表：

从化	北京
諸…[tsʃy]	[tʂu]
除…[ts'y]	[tʂ'u]
書…[sy]	[ʂu]
居…[ky]	[tɕy]
区…[k'y]	[tɕ'y]
虛…[hy]	[ɕy]

从卡片的排列，可以找出方音与北京音的对应規律：

y → y（以从化声母 k，k'，h 为条件）
y → u（以从化声母 ts，ts'，s 为条件）

寻找对应規律时，还得注意几点：1）不要太复杂的。2）管的字要多些。3）方音中特有的声韵而北京沒有的，如兴宁方音中的"五、吾、吳、漁、魚"等念 [ŋ]，在北京是 [u] 或 [y]。同时最好能綜合各条規律再做一方言声韵与北京音声韵比較总表。

在这次工作中，我們深刻地体会到使用卡片的好处：灵活、方便、易于比較。这样就可以使工作做得快些，省些，多些，好些。

三　調查报告

一切材料都整理好了，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組織材料，編写报告。前一阶段的工作做得好，材料充分，写报告的問題不大。报告內容主要根据《中国語文》1956年11月号李荣先生写的《怎样編写本地人学習普通話手册和方言調查报告》。但根据我們工作的体会，还得注意几个問題：

1）說明要簡單明确，避免繁瑣累贅。2）写对应規律时，可以适当利用表格。因为用文字說明，往往容易流于繁瑣，表格一看就懂。3）例字尽可能多举一些，同时例外字要全部写出来。这样，不但运用起来方便，而且可以避免發生錯誤。

方言調查是一件新的工作。这次我們企圖通过試点調查总結一些經驗和教訓。在我們工作中，由于經驗缺乏，方法生疏，存在不少困难和缺点。上面所談的只是試点的一些做法和个人的点滴体会，希望同志們指教。（1957年4月于广州）

秋季开学供应的教学挂圖

·幼兒园·

帮助幼兒認識环境和發展語言用的幼兒园教学挂圖，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研組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美术家繪圖。秋季开学供应下列 43 幅，以后陆續出版供应。

喂小白兎	少先队員釣魚
挤牛奶	小朋友澆花
喂鷄	城市的大街
山羊和綿羊	我們的城市
我們的幼兒园	节日的禮物
秋天的落叶	节日
秋天（一）	邮局
春天的景色	皮匠叔叔
春游	敬爱的領袖毛主席
工人造房子	

（上列 19 幅，对开，每幅 0.20 元）

馬（一）	老虎	大鴨和小鴨
馬（二）	牛	大鵝和小鵝
熊	燕子	母鷄和小鷄
狠	白兎	洋白菜、大白菜、波菜
猴	猪	核桃、花生、栗子
狐狸	公鷄	苹果、香蕉、生梨
象	母鷄	蘿卜、黃瓜、西紅柿
猫	邮遞員	蚕豆的生長过程

（上列 24 幅，四开，每幅 0.11 元）

家畜和家禽挂圖	（四开 10 幅）	1.60 元
幼兒生活挂圖	（对开 6 幅）	2.00 元

·小　学·

初小語文第一册教学挂圖 （修訂版，附說明書）	3.00 元
初小語文第一册教学挂圖說明書	0.09 元
初小語文第三册教学挂圖 （修訂版，附說明書）	1.70 元
初小語文第三册教学挂圖說明書	0.07 元
初小語文第五册教学挂圖 （附說明書）	1.80 元
初小語文第五册教学挂圖說明書	0.11 元
人体和保健	1.80 元
高小自然第一册教学挂圖（附画册）	1.20 元
高小自然第一册教学挂圖画册	0.08 元
高小自然第三册教学挂圖（附画册）	1.80 元
高小自然第三册教学挂圖画册	0.11 元
小学地理教学圖片（中国部份）	4.10 元
我們的首都——北京	估价1.00 元

·初中·初师·

脊椎动物——魚綱	3.00 元
植物的構造	8.10 元
植物的繁殖	4.00 元
口算表	0.80 元
自然地理挂圖（第一組）	2.80 元
自然地理挂圖（第二組）	2.70 元
自然地理挂圖（第三組）	1.80 元
中国自然地理景象挂圖（第一組）	2.50 元
中国自然地理景象挂圖（第二組）	3.80 元

·高中·师范·

人体解剖生理学教学挂圖（第一輯）	6.00 元
人体前面、背面肌肉的分布狀況	1.20 元
氮在自然界里的循环	0.65 元
元素周期表	1.00 元
短周期中各元素原子結構簡圖	估价0.55 元
金刚石和石墨分子的結構簡圖	估价0.65 元
原子結構	估价1.30 元
煤气厂	0.65 元
地球上生物的發展	4.60 元
米丘林育种法	5.30 元
制圖学挂圖（第一輯）	估价4.80 元
中国近代史参考圖片集（12 开本上集）	估价3.00 元

·語音教学圖册·

汉語拼音字母發音教学示意圖	3.40 元
汉語拼音字母發音示意圖解	0.10 元
俄語語音示意挂圖	11.60 元
英語語音示意挂圖	10.80 元

·学生作業材料·

初小一年級算术实習材料	0.05 元
高中俄語第一册字帖	0.12 元
高中俄語第二册字帖	0.12 元

·名人象片·

我国及世界各国历史上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的名人象片，是根据中学（师范）各科教科書的內容，組織北京、杭州、上海等地著名画家繪制。供各級学校及有关科学文化机关，团体进行教学及布置环境使用。已出版和即將出版的有下列 29 幅对开大小，每幅 0.20 元。以后陆續出版供应。

李时珍	貝多芬	焦　耳	罗蒙諾索夫
僧一行	巴　赫	欧　姆	夸美紐斯
祖冲之	高尔基	欧　文	門捷列夫
張　衡	米丘林	烏申斯基	达尔文
司馬迁	莫扎特	馬卡連柯	盧　梭
魯　迅	普希金	車尔尼雪夫斯基	
聶　耳	楞　次	杜勃罗留波夫	
冼星海	哥白尼	居里夫人	

教育圖片出版社出版——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每册定价人民幣 0.24 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本刊上期 7 月 22 日出版

中國語文

月刊

1957 年 8 月号

总第 62 期

1957 年 8 月 22 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員会　北京海甸中关村

总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45 号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代訂代銷处　全国各地新華書店

預定：三个月 0.72 元，半年 1.44 元，全年 2.88 元；寄費：1.平邮寄費不計，2.挂号邮費由訂戶負担。　1—22,686 册

代号 2—44